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 |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 主办

教育与考试

教育与考试

Jiaoyu yu Kaoshi

教育与考试 (双月刊)

2016年第2期 (2006年创刊, 总第56期)

主管单位: 福建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

主编: 陈明庆

出版单位: 教育与考试杂志社

出版日期: 2016年3月28日

地址: 福州市北环中路59号

邮政编码: 350003

电子邮箱: jyks1984@163.com

联系电话: 0591-86215651

印刷单位: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印中心

邮发代号: 34-87

发行范围: 国内发行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3-7865

国内统一刊号: CN35-1290/G4

定价: 8.00元

[美] 戴沙迪: 科举文学与主体性的制造: 八股文里瞥见的“吾”和“自己”

李雄鹰 孙燕超: 台湾高校入学考试评价体系的变革与特点

冯寅: 光华大学自主招生的特点及其借鉴意义

彭南生 刘建清 胡中波: 追求卓越: 基于信息化的本科教学改革探索和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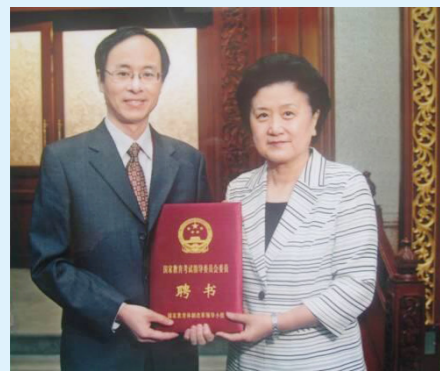


二〇一六
第二期

2016.2

中国考试研究重镇——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简介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于2003年1月，前身是1998年2月成立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考试研究中心。中心下设科举学研究室、招生考试研究室、考试理论研究室等三个研究室，有专职教师8人、兼职教师4人。中心的考试研究着重从高等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测量学、考试学的角度研究高考、自学考试与中国考试史（科举学）问题。与国内一些侧重研究考试技术的同行不同，中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试制度与政策、中国考试史、考试基本理论研究。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被聘为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心的科研成果突出，已出版有关高考改革、科举学、教育考试理论等方面的著作50余部，发表论文80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转摘近20篇，人大复印资料转载100余篇。中心专职研究人员陆续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科举学研究”等在内的50余项考试研究课题，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20余次，其中一等奖10次。

中心教师指导了近80篇有关科举、高考、自学考试研究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科举学研究”“考试研究”已成为厦门大学教育史、高等教育学硕、博士招生中稳定的专业方向，培养模式日趋成熟。已答辩的博士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篇、中国高教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4篇。

中心长期与国家教育考试决策部门保持紧密联系。2003年9月，教育部高校学生司与中心签订合作协议，联合开展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教育部考试中心长期以来以本中心作为考试研究依托基地之一。中心还与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等省级考试专业机构合作，共同研究考试改革问题，对推进包括高考改革在内的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业已成为国内教育考试研究的重镇和决策咨询基地。

中心还组织推动每年一届的国际性或全国性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与福建省教育考试院联合主办公开学术刊物《教育与考试》双月刊，并与国际同行进行频繁的学术交流。

中心教师、毕业生及在学研究生已成中国教育考试和科举学研究领域中一支骨干力量，以中心主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刘海峰为首的团队已成为国家教育考试改革的智库，将进一步办成国内领先、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考试研究机构。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专家团队

《教育与考试》征稿启事

《教育与考试》杂志（双月刊，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3-7865，国内统一刊号：CN35-1290/G4）创办于2007年，由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一、实行栏目主持人负责制

为进一步提升办刊质量，本刊从2016年第一期起由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负责组稿事宜，具体如下：

●“科举学丛谈”栏目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负责组稿编审；

●“高考改革探索”栏目由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若玲教授负责组稿编审；

●“考试理论与实践”栏目由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亚群教授负责组稿编审；

●“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评论”栏目覃红霞副教授、陈兴德副教授负责组稿编审。

其余栏目根据需要设置，并组织专家组稿编审。

二、本刊投稿须知

1. 来稿须未曾在公开刊物发表过，以5000到8000字左右为宜，优秀稿件不受此限。

2. 投稿后40个工作日内未接到录用通知，可自行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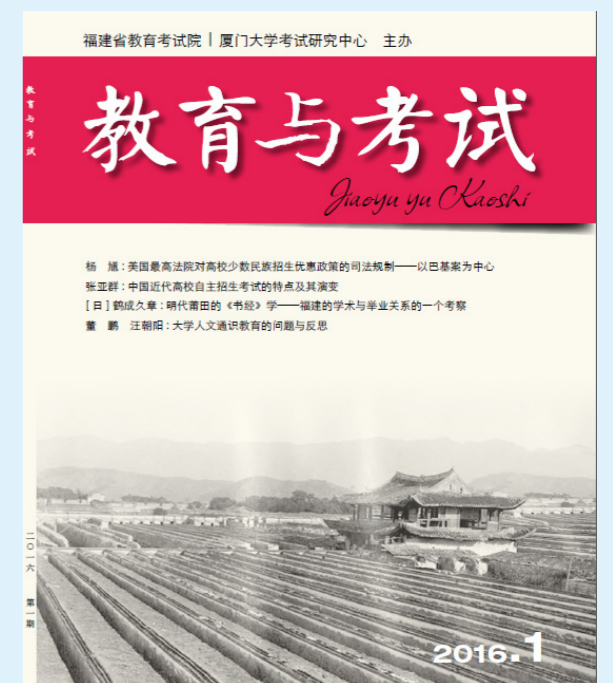
3. 电子文稿中应包含如下信息：摘要（300字左右）、关键词（3-5个）、作者简介（姓名、性别、籍贯、单位及其职务与职称、学历、研究方向，所在省市名及邮政编码、电话、电子邮件地址）。来稿如受基金项目资助，请注明项目名称、类别和批准号。

4. 本刊有权对来稿做文字性删改，有特殊要求者请在来稿时注明。

5. 本刊不收取任何审稿费、版面费。稿件一经刊登，即付稿酬（优稿优酬），并寄送样刊两本。

6. 注释与参考文献规范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要求执行，注释与参考文献采用尾注方式分别标注。

7. 本刊仅接受电子文稿，文稿（.doc模式）请发送至 jyks1984@163.com。



教育与考试杂志

教育与考试

Jiaoyu yu Kaoshi

(双月刊)

编辑委员会

总 顾 问 潘懋元

学术顾问 刘海峰 杨学为

主 任 曾能建

委 员 陈明庆 余剑锋 陈 峰 林健民 丁 毅

郑若玲 张亚群 刘辉雄 王夏州 罗立祝

主 编 陈明庆

副 主 编 刘辉雄 罗立祝

主管 福建省教育厅

主办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

目 录

2016年第2期
(总第56期)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3-7865

国内统一刊号:

CN35-1290/G4

主 编:陈明庆
副 主 编:刘辉雄
罗立祝
责任编辑:王伟宜
郑 芳
英文编辑:王伟宜

2016.2

高考改革与探索 ——栏目主持:郑若玲

- 台湾高校入学考试评价体系的变革与特点
..... 李雄鹰 孙燕超 5
- 日本外国留学生本科招生考试改革及其特点 胡永红 11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及其启示
..... 徐光木 胡天佑 16
- 光复后韩国高校招考制度的演变 凌 磊 22

考试理论与实践 ——栏目主持:张亚群

- 创新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入学考试与招生制度的改革
..... 吴科杰 吴根福 27
- 光华大学自主招生的特点及其借鉴意义 冯 寅 31
- 民国时期私立复旦大学招生考试特点探析 李雪梅 39

科举学从谈 ——栏目主持:刘海峰

- 科举文学与主体性的制造:八股文里瞥见的“吾”和“自己”
..... [美]戴沙迪 44
- 明清小说中的文人游戏与八股文 王玉超 48
- 唐顺之四书文研究 (台)蒲彦光 54
- 吴中博雅传统与吴宽的古文、时文“适相为用”说及其文本实践
..... 李 柯 62

高等教育研究——栏目主持: 覃红霞

追求卓越: 基于信息化的本科教学改革探索和实践

..... 彭南生 刘建清 胡中波 69

构建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 推进地方院校一流本科教育

..... 黄志刚 钟春玲 74

美国高校服务导向型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探析

——以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为例

..... 黎军 张帆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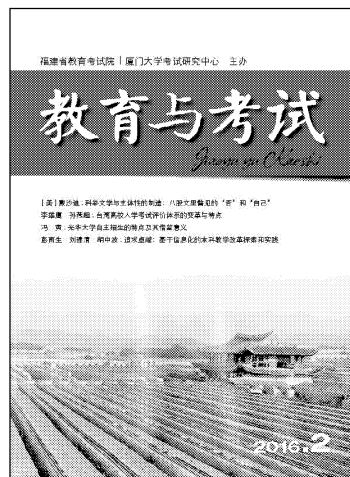
高等教育的“英”“德”模式博弈

——住宿学院制在哈佛大学的发展与变迁 何毅 87

研究评论——栏目主持: 陈兴德

传统与变革的统一: 大学的生存之道

——研读《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 陈丽 92



封面图片: 福州贡院, 1911年摄

编辑出版: 《教育与考试》杂志社

地 址: 福州市北环中路 59 号

邮 编: 350003

电 话: 0591-86215651

传 真: 0591-86215825

E-mail: jyks1984@163.com

声明: 本刊许可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万方数据知识平台和超星数字图书馆在其网站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 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 其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本刊上述声明。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NO.2 MAR 2016 (Serial NO.56)

CONTENTS

1.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aiwa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Li Xiongying Sun Yanchao 5
2. Refor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Japan Hu Yonghong 11
3. Trinidad and Tobago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Reform and Its Enlightenment Xu-Guangmu Hu-Tianyou 16
4. The Evolution of College Entrance System in South Korean After Recovery Ling Lei 22
5.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Enrollment System under Creative Education Wu Kejie Wu Genfu 27
6. Characteristics of Independent Admissions of Kwang Hua University and Its Significance Feng Yin 31
7.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Enrollment System of Private Fudan Universit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 Xuemei 39
8. The Literatur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the Creation of Subjectivity: "I" and "Myself" in Stereotyped Writing (America) Alexander Des Forges 44
9. Literati Games Stereotyped Writing in the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Yuchao 48
11. On Tang Shunzhi's Eight-legged Essay (TaiWan)Pu Yanguang 54
12. Liberal Tradition in Wuzhong and the Mutual Benefits of Wu Kuan's Ancient Chinese Prose and Examination Essays and Its Textual Practice Li Ke 62
13.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eng Nansheng, Liu Jianqing, Hu Zhongbo 69
14. Constructing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 of Government,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Promoting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uang Zhigang, Zhong Chunling 74
15. An Analysis of Service-Oriented University Teacher Development Center in America—the case study of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Li Jun, Zhang Fan 80
16. The Game between "British" and "German" Mode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Accommodation College System in Harvard University He Yi 87
17. Surviving Way of Universities: Unity of Tradition and Reform —book review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n Li 92

● 高考改革与探索

台湾高校入学考试评价体系的变革与特点*

李雄鹰 孙燕超

摘要:台湾高校的入学考试制度历经多次变革,形成了现如今多元综合的招生考试评价体系。由于传统文化上的根源性关系,海峡两岸高校的招考制度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同台湾一样,大陆高校招生制度也在不断变革之中,国家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以此为起点,大陆的高考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期,探索招考分离,多元化的考试方式成为必然。对台湾高校入学考试体系进行介绍和梳理分析,以期对大陆的高考改革与发展方向有所借鉴。

关键词:台湾高校;入学考试评价体系;综合评价

一、台湾高校入学考试评价体系的演变

从1954年至今,台湾高校的入学考试制度经历了大专联合招生的创立、大专联合招生的发展演变以及大学多元入学评价制度的形成与改革三个边界相对清晰发展阶段。

(一)大专联合招生时期的考试评价

1949年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后,继续沿用各大学单独招生的办法。为了减轻学生考试负担,消除各校重复录取考生的乱象,促进考试公平,1954年,台湾大学、省立师范学院、省立台中农学院、省立台南工学院组成“大专联招会”,实施联合招生,大专联招制度开始在台湾运行。

该时期大学招生以统一考试为主,由大专联招会统一规定报名资格与条件。大专联考包括共同考试科目和分组考试科目两部分,共同考试科目有国文、英文和三民主义。分组考试科目有数学、历史、地理等,分甲、乙、丙三组分别选考,科目

均为三科。1958年考试科目不分共同科与分组科,考试科目包括三民主义、国文、英文、数学、本国史地、理化6科^[1]。

总体上,这一时期的考试科目较为稳定,变化较小。创立时期的大专联招遵循统一招生、统一录取、统一分发原则,主要根据总分录取入学。^[2]

(二)大学联合招生发展演变期的招考制度

1972年起,台湾的大学联考进入发展与调整期,负责联考的机构、考试科目与内容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1972年,大学联考与专科联考开始分开实施。1976年,台湾成立了“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下设大学入学考试考务委员会和考试研究委员会,由大学入学考试考务委员会负责联考事宜。^[3]这一时期大学联考的主要变化包括题型的变革、“高中学生能力评价与辅导”的实施、联招新制的推行等内容。

1. 试题的变革。1972至1983年,台湾高校继续实施统一考试的办法,但这一时期的试题形式发生变

作者简介:李雄鹰,男,甘肃宁县人,兰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与考试研究(兰州 730000);孙燕超,女,河南滑县人,兰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大学心理学方向研究(兰州 730000)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基于公平的高校自主招生考试评价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5XGL023)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6LZUJBWYJ020)之研究成果。

化。1954年联招考试的题型多样,如填充、问答、解释、演算、翻译等。为了增加阅卷的公平性,采用阅读机进行阅卷,因此,从1973年开始,除作文题外,大学联考其他科目题型均改为客观题形式。此后,客观测验题在考试中开始广泛应用。

2.“高中学生能力评价与辅导”的实施。1973年,台湾公布了《高级中学学生评量与辅导工作实施要点》,指出高中学生评价的目标是“运用客观评量方法,鉴定学生各种能力与特质,进而明智的选择升学与就业方向,以利于大学及专科学校新生入学考试之实施”⁽⁴⁾。这一举措有利于学生从高中开始了解自己的特质和能力,提前为大学选择做准备。1976年,台湾全部高中都已实施中学升学与就业辅导。

3.联招新制的推行。台湾于1984年开始实施“先考试、后填志愿、再统一分发”的联招新制,成为台湾高校招考的重要转折。联招新制仍采用统一考试的形式,在力求公平、客观的同时,注重学生的综合分析 with 思考,说明与归纳等能力。“联招新制”依照校系学科性质等方面的差异,将考试科目分为文、法、商、理甲、理乙等10个类别⁽⁵⁾,考试科目则划分为四大类组,具体如表1所示。“联招新制”一方面增加了考生的自由选择度,扩大进入高校的机会;另一方面,该考试制度使大学增加了自主选择权,有较多机会招收到适合本学校教育目标要求的学生。

表1 联招新制考试科目表

	共同科目	单独科目	加考科目
第一类组		文、法、商	社会组数学、中外历史、中外地理
第二类组	三民主义	理甲、工甲	自然组数学、物理、化学
第三类组	英文	理乙、工乙、农乙、医	自然组数学、生物、物理、化学;
第四类组	国文	农甲	自然组数学、生物、化学

(三)台湾高校多元入学评价制度的实施

1989年,台湾成立了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大考中心不仅负责大学的考试、录取等工作,还负责进行高校入学制度改革研究。因此,“大考中心”不仅作为办事机构,更是一个研究机构,开启了台湾高校多元入学制度发展的序幕,为台湾多元入学评价制度的

诞生奠定了基础。

台湾高校招生从过去联招的一元到多元,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多元入学扩大了大学的招生自主权,激发了招生积极性,不仅参与招生,而且着手研究招生,成为使招生科学化、合理化的推进力量。但是,多元入学仍然招致不少担忧与指责,如考试次数增加加大了考生的应考负担;多元入学所倡导的推荐、申请制度在理论架构上很好,但许多人仍质疑很可能产生人情游说、走后门、开假证明等现象,因此,大学多元入学比起联考制度,其公平性让人怀疑。为此,2002年以后,台湾在坚持简单、多元、公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对多元入学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

二、台湾高校多元综合评价体系的确立

截至2011年,台湾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历经改革,从“联考”到“多元”,终于改变了“一试定终身”的局面,形成了多元化招生、综合性评价学生的招生方式;考招分离,扩大了大学的招生自主权,促进了学生与大学之间的多项选择。台湾高校多元综合评价体系最终确立。

(一)台湾高校的招生方式

负责台湾高校招生的机构是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JBCRC),大学招生委员会是各高校(含独立学院)为协商协调招生事宜而组织的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制定相关的招生政策,并协调各个大学之间每年的招生方案,以及其他招生事项。⁽⁶⁾该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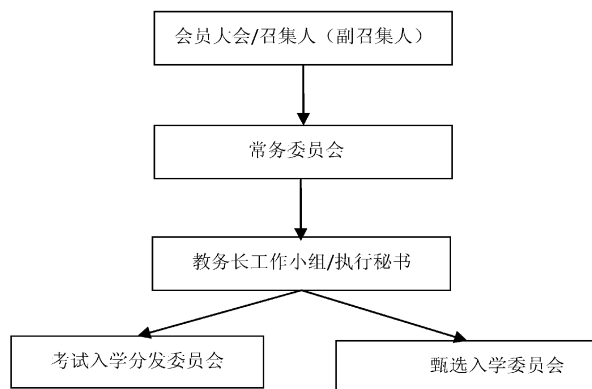


图1 大学招生委员会组织架构图

资料来源: <http://www.jbcrc.edu.tw/left-21.htm>

通过该会的组织架构,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负责高校招生的具体机构有两个,即“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和“甄选入学委员会”,相对应的招生方式也有两种,即“考试分发入学”和“甄选入学”。

1. 考试分发入学。“考试分发入学”由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负责,本招生采用先审核登记资格,后登记分发制,主要依据为学生的基本数据、学科能力测验成绩以及指定科目考试成绩^[7]。考试入学的招生范围是公立和私立高中(职)的毕业生,以及具有同等学力的相关人员;招生方式则是参加当年的指靠、术科考试等各项考试类型,依照考试成绩考试入学^[8],每个考生选填的志愿不得超过100个。考试入学较为公平、公正、公开,且省钱、省力、省时。“大学考试入学”招生管道打破传统的类组概念,提供了校系弹性自主的招生空间,考试多元选择及个性发展的机会。但也应该看到,考试分发入学考试在实施过程中与其原本意图发生了一些偏离,例如部分大学无法改变旧的招考思想,仍然选择以考试总分作为招生标准,致使有意报考这些院校的学生学业负担并未得到有效减少。

2. 甄选入学。台湾高校的第二条入学管道为甄选入学,主要由甄选入学委员会负责。甄选入学又分为“繁星推荐”和“个人申请”两种方式。

(1) 繁星推荐入学。繁星计划由台湾清华大学首创,于2007年开始在全台湾推动实施。繁星计划致力于缩小大学入学的城乡差距,使每个高中都能够以“推荐保送”的方式向就近高校输送生源,从而缓解乡村中学由于教育资源不足导致大学入学率远低于城市中学的局面,改变高校的生源格局。繁星计划的“推荐保送”标准是:学生须全程就读于同一高中;高一和高二学年全部课程的平均成绩须居于全校同年级前20%;同一高校在每一高中只能录取一名繁星计划学生。^[9]截止到2011年,参加繁星计划的高校共计25所,涉及学系504个,提供招生名额1742个。实践表明,繁星计划的确有助于弥补城乡学生学业水平的差距,通过繁星计划入学的学生入学后的学业表现与其他学生相比并无差别,繁星计划会降低高校教学质量的疑虑随之消除。鉴于繁星计划在消除城乡差距、保障教育公平方面的极大成

功,台湾将繁星计划改造为“繁星推荐”,沿用以往推荐方式和标准,扩大参加高校和招生规模,参加高校增加到68所,院系1397个,招生名额增加为7649个^[10]。

但是,历经多年实践,繁星计划也逐渐表现出了其局限性。一方面,繁星计划使学生从高一和高二就要开始考虑根据不同大学、系科的甄选条件和成绩要求,有针对性的选择课程,高三时期更要大量搜索大学甄选的信息,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和学业成绩选择参加甄选的大学和系科,这无疑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学生不愿放弃每一次参加甄选的机会,因此高中教师和行政人员必须把大量的工作资源投入到为学生撰写推荐信和整理形制各异的证明文件中,极大加重了他们的工作负担。

(2) 个人申请入学。个人申请入学是在2002年“学校推荐”和“个人申请”两种入学方式的基础上实施的,由“大学甄选入学汇办单位”及大学科系办理。甄选入学的报考资格是学科能力测验、术科考试(包括音乐、体育、美术等组别)成绩通过大学校系检定标准后,可申请符合志趣的大学校系,每个申请者最多选择申请6个校系。学科能力测验、术科考试成绩的检定、采计、参酌方式及标准由各校系规定。甄选入学的实践证明此类学生进入大学后更注重学习兴趣,对未来较有明确目标与自信;学生对科系的认同度较考试分发入学的学生较高;学习成绩较佳,学习表现较优;发展较为全面,其它才艺表现较佳,参加活动的办事能力及特殊才艺的表现较为突出。

(二) 台湾高校的入学考试评价

目前,台湾各高校的考试主要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简称大考中心,英文缩写为CEEC)负责。大考中心成立于1989年,1993年改制为财团法人制。大考中心主要的发展定位与方向包括:发展成为考试专业机构;研究发展各类相关测验;革新考试相关考务作业;强化相关考试咨询服务^[11]。

由此可以看出,大考中心不是单纯的组织考试的部门,而是探索科学测验理论并实践考试与咨询的专业机构,该中心有着清晰的组织架构及职责分工,以保障考务工作科学、高效、严密。

目前台湾各大学的统一考试主要包括四大类,

即学科能力测验,指定科目考试、术科考试和高中英语听力测验。

1.学科能力测验。学科能力测验的测验范围以高一高二各科的必修课纲要为参照,考生要参加全部五科的考试,成绩采取等级分制。考试时间除了国文为120分钟,其他各科均为100分钟,并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现行的学科能力测验考试科目包括国文、英语、数学、社会、自然等。其中社会 and 自然考试又各包含若干内容。除了国文及英语有非选择题之外,其他考试题目以客观题(单选、多选)为主,采用电脑可读的判定方式。

学科能力测验主要考察学生是否具备高中应有的基本学科能力,是否能够结合生活整合不同学科知识,是大学初步筛选学生的门槛。因此该考试紧密结合高中教学纲要,体现了基本技能的考察。

借鉴台湾地区“学科能力测验”的经验,大陆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学业水平考试可作为高校自主招生的重要参考;在计分方式上,可以以百分数(或原始分数)配合等级制呈现,以保证区分度;在分数使用方式上,应赋予高校自主权,设立弹性的招生科目采计机制。^[12]

2.指定科目考试。指定科目考试内容含国文、英文、数学甲、数学乙、历史、地理、公民与社会、物理、化学和生物,主要考察学生是否具备了高校要求的能力,是高校考试入学招生的主要依据。

指定科目考试各科测验范围以高中的必修课以及选修课程纲要为依据,成绩采用百分制。各科考试时间均为80分钟,并依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指定科目考试题型可以有选择题、选填空题及非选择题等,各题型比重依据科目需要设置,作答方式灵活多样,如申论、计算、作图等,可综合考察学生知识的理解与应用以及表达、判断、分析、推理等能力。

根据学校特色和学科设置的不同,各高校可以从十个考试科目中指定若干个,并根据指定科目的考试成绩选拔学生;学生同时参照个人的能力和兴趣,根据报考校系规定的考试科目自由选择。

3.术科考试。术科考试即艺术特长类考试,主要包括音乐、美术、体育三类考试。其中,音乐与美术

两组各分五项分别计分,考生可自由选考。体育只给总分,每个项目都要参加。

4.高中英语听力测验。高中英语听力测验是配

表2 术科考试科目及项目一览表

科目	考试项目
音乐	分为:主修、副修、乐理、听写、视唱五项
美术	分为:素描、彩绘技法、创意表现、水墨书画、美术鉴赏五项
体育	60公尺立姿快跑、20秒反覆测步、1分钟屈膝仰卧起坐、立定连续三次跳、1600公尺跑走

资料来源:<http://www.cape.edu.tw/index.asp?id=C1001>.

合高中的英语课程,对学生进行听力综合测评,注重英语日常的应用沟通,也强调课堂学习的英语能力。听力测验由大考中心分两次组织进行,成绩采取等级制。测验成绩对繁星推荐入学、个人申请入学及、考试入学均适用。

另外,台湾高中的课本采用开放式的编辑方式,版本多样。学测各科的考试以课程纲要的主要概念为原则,并依据各科的测验目标来设计考题,体现“一纲多本”的命题理念。

(三)多元化的考试与多种入学选择

台湾将多元化的考试评价嵌套于统一考试体系,使统一性与多元化有机结合。多元化具体体现在学生可以选择多种入学途径。

1.学科能力测验成绩可以用于繁星计划、个人申请及考试入学三种方式,科技院校四年制申请入学、中央警察大学单独招生、军校入学、大学进修学士班等各招生管道均可采用学测成绩。仅参加学科能力测验的考生,可选择繁星推荐入学和个人申请入学,前者由应届毕业生所在高中推荐,后者则由学生本人向大学申请。^[13]

2.指定科目考试成绩提供考试入学和大学进修学士班采用。只参加指定科目考试,可选考试入学。考生只能选择不需要学科能力测验的大学城系。

3.学科能力测验与指定科目考试均参加的考生,可选择繁星推荐、个人申请及考试入学三种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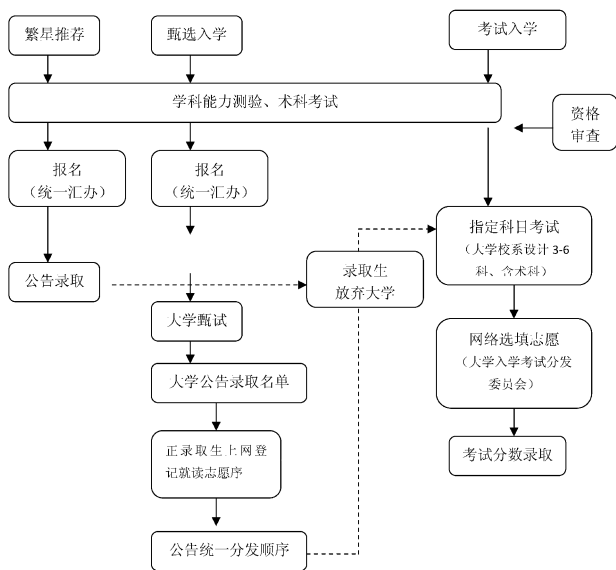


图2 多元入学体系架构图

资料来源 :http://nsdua.moe.edu.tw/index.php?option = com_content&task=view&id.

如图2所示,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和改革,台湾高校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多元化考试和入学管道。多元化考试和入学管道最大限度地拓宽了学生综合能力的考察范围,并为学生提供了更多进入大学的机会,并扩大了高校招生自主权。这无疑是极有意义的。大陆和台湾具有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大陆面临的高考体制改革也与台湾近年来的大学入学考试改革过程极其类似,台湾在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很有可能也会发生在大陆的高考体制改革中(如人情关系)。因此,大陆教育部门、大学和教育研究者应当对台湾的大学入学考试改革给予更多关注。

三、台湾高校招生考试评价体系的特点

(一)统一性与多元化相结合

60多年来,台湾的大学入学考试改革从未间断,但无论是起先的大学联招,还是改革后的多元入学,统一考试都是一根主线,考试机构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统一考试以其高效性、公平性而著称,成为台湾设计大学入学考试评价体系的根基。在统一考试的架构下,台湾将多元化的考试评价嵌套于统一考试体系,使统一性与多元化有机结合。多元化具体体现在:学生可以选择多种入学途径,如繁星

推荐、甄选入学、考试入学;考试内容的多样化与灵活性,评价不仅以考试成绩为依据,还注重考查学生的高中平时成绩、特殊表现及社会责任感等;考试科目设置的灵活性,不同大学与校系有不同的考试科目设置与要求,这一方面为学生创造了多元化选择机会,也有利于大学选拔符合自身培养要求的学生。

(二)教育机会均等与考试评价的公平性

教育机会均等与考试公平是台湾高校入学考试评价的根本设计理念与长期诉求。为了使学生不论家庭、地区、社会地位等差异,都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台湾实行了大学入学“繁星推荐”计划。繁星推荐计划面向台湾偏远地区和特种身分的考生,如马祖、澎湖、离岛、原住民居住地区的学生,如家庭贫困学生,如残疾学生等,可谓是台湾高校入学机会均等的代表之作,其设计理念是“照顾弱势,区域平衡”,其实施目标是“高中均质,区域均衡”,使不同地区、身份的学生享有均等的接受同等教育资源的机会,达到平衡教育资源,实现教育公平正义的意义^[14]。另外,台湾还通过制定严格的考试规则、规范的考试程序力争使大学入学考试做到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避免人情面子、权利因素的介入而危害考试公平的现象发生。

(三)多层面、综合性考查学生的知识与能力

在改革与发展中,台湾构建起了多层面、综合性考察学生知识与能力的考试评价体系。

多层面是指通过多阶段、多环节的考试考察学生,如既有用来初步筛选考生的学科能力测验,也有评价考生是否高校要求的专业知识能力,供各系科作为选取学生依据的指定科目考试,还有各大学系科所组织的单独测试、面试等考察环节与内容,努力做到全方位、多层面、立体化的考察学生。

综合性则在于不单以成绩作为评价与取舍考生的单一标准,而是综合性的考察学生的素质。基于考试的视角,其考察内容包括高中阶段开设的所有课程,学科能力测验不分文理,指定科目考试由大学院系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培养要求与特色设置,考试科目越多就越具选择机会,考试内容体现出基础性与综合性的特点;基于评价的视角,台湾以统一考试为基础,构建了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

从台湾大学入学架构图(图2)可看出,选择不同通道的考生除了要参加学科能力测验、术科考试或指定科目考试,大学系科还需要考生提供社团参与、竞赛成果、学生干部、在校成绩、健康情形、推荐信、自传与读书计划以及能够展现个人人格特质、性向与志趣等的资料,鼓励考生全方位展现自我,方便大学多角度深入了解考生。

参考文献:

[1]杨李娜.台湾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研究[D].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22.

[2]台湾教育年鉴编写委员会.第四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上)[Z].台北:正中书局,1976:734.

[3]台湾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五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上)[Z].台北:正中书局,1985:896-897.

[4]宗亮东.辅导与教育论文集[M].台北:正中书局,1986:628-629.

[5]农莹.大陆与台湾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比较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6]巴图那生.我国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建设研究[D].中央

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7]李溢,卢青.台湾大学多元入学制度对大陆高考制度改革启示[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1(11):50-52.

[8]105学年度学生手册.http://www.jbrc.edu.tw/left-21.htm/.

[9]赵永东,葛菁菁.台湾地区大学入学制度多元化探析——以“繁星计划”为主[J].教育与考试,2012(01):22-26.

[10]刘盾,郑若玲.繁星点点绽放光芒——台湾地区高校招生地域公平改革及启示[J].考试研究,2013(02):3-10.

[11]大学入学考试中心http://www.ceec.edu.tw/.

[12]余晖.台湾地区高校招生中的学科能力测验:特点、功能与启示[J].教育测量与评价(理论版),2015(12):29-33.

[13]刘华强.试析台湾高校招生制度的启示——从大陆高考生源“拐点”谈起[J].闽台文化交流,2010(04):58-62.

[14]黄嘉莉.台湾大学入学制度的历史变革:公平性、机会选择、卓越性之探讨[C].鉴古今的教育史研究:第六届两岸四地教育史论坛论文集,2012:342.

(责任编辑 王伟宜)

日本外国留学生本科招生考试改革及其特点

胡永红

摘要:国际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政策之一,外国留学生招生考试制度是推动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载体,也是研究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不可或缺的部分。日本外国留学生招生考试经历了从尝试到扩张再到直通国际化的演变历程,政府政策的倾斜与留学生奖学金制度的开辟为统一性的留学生考试得以迅速推广并普及提供有益环境,也形成了日本外国留学生招生考试制度的四大特点。根据时势变化不断调整完善的日本外国留学生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对我国不无借鉴价值。

关键词:外国留学生招生考试;国际化;政策;类型;特点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末,日本高等教育依托统考平台,借助私立高校的力量实现了短期内的大规模扩招,顺利推进到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迅速膨胀的高等教育事业催生了日本政府推动日本高等教育融入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的决心。鉴于此,80年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理念备受政府关注并迅速扩展。为在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竞争中博取制胜筹码,为提高各大招收外国留学生的质量与效率,基于本国教育与考试文化特点,统一性的外国留学生招生考试成为日本留学生招生考试改革的基本方向,也因此成为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有效助推器。本文以本科阶段的日本留学生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为研究对象,在分析该考试制度的政策与类型的基础上再深入阐释其特点。

一、日本外国留学生招生考试政策

日本吸收外国留学生赴日研读始于1954年文部省创立的国费外国留学生制度,该制度以奖学金方

式吸引世界各国学生赴日留学。第一期仅有23人,1964年达到200人,1986年达到1800人,从1954~1986年之间,总计招生1.3万名留学生,亚洲学生占了80%。截止1987年5月,在日本大学(含短大)的留学生共2.2人。^[1]

20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确立了日本经济大国地位,谋求政治大国、文化大国的日本开始扩大外国留学生招收数量。1983年中曾根首相时期提出要加快引入留学生,制定了“招收10万外国留学生计划”,拟定21世纪之前实现该目标。2000年,日本外国留学生总数为6.4万,远未达到10万目标。2003年,外国留学生总数终于达到11万人。此后数年虽然外国留学生人数有所上扬,但是,上升速度有限。2008年,外国留学生在校生数达12.4万,但是只占全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总数的3.5%。^[2]根据OECE的调查,2008年全世界的留学生数高达330万,2009年增至370万。日本的外国留学生虽然从2005

作者简介:胡永红,女,福建龙岩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考试理论与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厦门 361005)

年的12万增至2009年的13万,但是,占全世界留学生数的比例却从4.1%降至3.6%。⁽³⁾因此,提高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吸收更多留学生赴日留学成为政府的核心议题之一。

2008年7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就福田康夫首相提出的“30万外国留学生计划”制定了基本政策,延及留学生招生考试、奖学金政策、留学生就业支援等问题。文科省、外务省、法务省、厚生劳动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共同探讨研制了具体方策,其中包括关于留学生招生考试的相应举措:通过活用日本留学考试、TOEFL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即“国际标准英语能力考试”)、日语能力考试等允许留学生在赴日之前获得入学许可并办理相应入学住宿等手续;选定30所知名国公立大学为招收留学生的试点校。2009年,文科省初选了13所知名大学——东北大学、筑波大学、东京大学、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九州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上智大学、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为推行留学生新政策的首批试点校,开始全球化视野下的留学生招生考试改革。2010年《面向21世纪复活日本的21项国家战略》提出扩大日本大学与国外大学的学分互认制度、为留学生在日企就职提供平台等重大举措,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赴日留学。作为配套资金,2010年,文科省投入2.5亿日元用于充实日本留学考试。2011年,法务省投入28.9亿日元用于强化扩大赴日留学生的审查体制,文科省再投入2.7亿日元用于推动日本留学考试。

在文科省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各大学也不断开拓本校面向外国留学生的各级各类奖学金,从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到各民间团体奖学金再到地方公共团体奖学金,无论是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著名大学,还是大阪市立大学等一般性的大学,都在各层面设置了丰富多彩的奖学金制度,以招收更多留学生赴日学习。例示如表1。

二、日本外国留学生招生考试类型

与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统分结合的模式类似,日本外国留学生考试也分为统一考试与高校单独考试两类,统一考试包括“日本留学考试”与“日语

能力考试”两种。日本政府与社会对统考的情有独钟离不开日本由来已久的集权式文化心理结构,还有独特的教育公平、考试公平的教育文化传统。战后经济奇迹带来教育需求的高涨,日本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也随之加速,统考模式无疑也契合了战后日本经济奇迹带来的快速提高外国留学生招生数以扩大日本高等教育的海外影响力的政治需求。

表1:日本各大学设置的丰富多彩的奖学金制度

单位:万日元

大学	名称	对象资格	月付金额
东京大学	自费外国留学生学习奖励费	在籍自费外国留学生,学习成绩与品德兼优且在经济上需要援助者	4.8
	东京大学外国留学生支援基金奖学金	(1) 品德兼优者 (2) 学费需要资助者	5
	民间团体奖学金(含大学推荐与学生自荐两种类型)	日本大学在籍自费外国留学生	不同团体,金额各不相同
大阪市立大学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	在籍自费外国留学生	
	平和中岛财团奖学金	在籍自费外国留学生	
	市川国际奖学财团	来自亚洲地区的在籍自费外国留学生	
早稻田大学	丰田通商留学生奖学金		
	三菱商事留学生奖学金	在籍自费外国留学生	
	山本猛夫纪念奖学基金		
共设有 250 种奖学金,其中除了大学自身设置的各类奖学金之外,还有日本学生支援机构、民间团体、地方公共团体提供的各种奖学金。2014年,共有2万以上早稻田大学的学生获得奖学金,奖学金支付总额以150亿日元位居全国首位。			

注:以上各大学相关信息根据各大学官网:东京大学.応募できる奨学金について知りたい(私費留学生向けの奨学金) http://www.u-tokyo.ac.jp/res/03/i22_j.html; 早稻田大学.奨学金 <http://www.waseda.jp/inst/admission/graduate/scholarships/>; 大阪市立大学.教育学生生活.奨学金 http://www.osaka-cu.ac.jp/ja/education/study_abroad/scholarship中的资料编辑而成。

(一) 日本留学考试

日本留学考试是政府委托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举办,以希望进入日本大学学习的外国人为对象、旨在评价其基础学力的考试。报考资格为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1)在国外接受了12年学校教育或相当于同等学力者;(2)经文部大臣认定接受了高中教育或相当于高中教育者;(3)大学单独入学考试认定与高中毕业生具有同等学力且达到18岁者。通过该考试的留学生,可以不赴日就本国办理入学许可等相关手续。每年6月、11月各考一次,在日本国内15个城市、国外13个国家、16个城市设置了考点。考试科目,文科为日语、综合科目与数学,理科为日语、理科(从物理、化学、生物中选2科)、数学,出题采用日语与英语两种方式,题型以客观选择题为主,但是,日语考试设部分小论述题,一般是二选一答题。评卷采用标准分方式,考试成绩2年内有效,成绩优秀者可获得提前预约奖学金的机会。2009年,共有64所4年制大学、7所短期大学、1所高等专门学校允许通过日本留学考试后的留学生提前办理相关入学事宜;共有557所高校利用了该考试,应考者共7345人,其中245名合格者在本国完成入学手续。截止2016年4月,共有26680人报名该考试,其中日本国内报名的外国留学生21686人,国外报考的留学生4994人。^[4]

(二) 日语能力考试

日语能力考试始于1984年,由国际交流基金与日本国际交流支援协会共同举办,是日本面向留学生举办的最大规模的考试,也是考生自行参加的社会化考试。日语能力考试一年两次,分别在7月与12月,考生既可以在本国报考也可以在国外所设固定考点考试。日本国内有45各都道府县,国外有68个国家与地区的213个城市设置了考点。考试分为1~5这五个层级,最高级为1级,考试题型都是客观选择题,包括语言知识、读解与听解部分。日语能力考试证书有许多益处,包括大学入学资格和毕业资格认定、企业的优厚待遇、社会性资格认定等。如依据日本出入境管理局2012年制定的“高级人才积分制的出入境管理优待制度”,凡是日语能力测试1级合格者均可获加15积分;成绩在70分以上者(总分180

分,90分合格),可享受出入境管理上的优惠政策。部分大学为了节约成本在招生中直接根据留学生的日本能力考试或日本留学考试成绩免除该生的大学单独考试。但是,不少大学还是会采用文理分科模式实施单独考试,文科考试科目一般为日语、小论文、面试+外语,理科为日语、数学、地理、化学、生物+英语。

无论是日本留学考试还是日语能力考试,都是可以在不赴日本就参加的权威性考试。这种为留学生提供当地就考的模式,不仅节约了考生的考试成本,也扩大了宣传范围,这是在世界蛋糕中争夺生源,提高市场占有率的有效手段。1984年,日本第一次举办日本留学考试,当时考生数仅为7000人,而到了2015年12月,共有406206人报名日语能力考试,其中在国外报考者为296530人,在日本国内报考者为109676人。^[5]

三、日本外国留学生招生考试制度的特点

纵观日本外国留学生招生考试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始终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主导力量,各委托机构始终站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高度,基于现实需求与情境的变化,及时并渐进完善考试内容与形式,并在此过程中形构了日本外国留学生招生考试制度的四个显著特点:

(一) 私立大学成为招收外国留学生的主体

1. 大学国际化水平评估指标。日本大学评价体系包括国际化指标,涵盖外国留学生所占比例、国际交流校、英语授课等基本指标,以此评定大学的国际化水平与程度。

表2:2010年日本大学国际化程度的评定指标

单位: %

评定指标		国立	公立	私立	全体
大学国际化数值	外国留学生所占比例	11.4	9.8	22.7	19.8
	国际交流校	7.4	8.5	7.9	7.9
	英语授课	5.0	7.0	9.9	9.0

注:该表根据日本学生支援機構·大学国际化と留学生政策<http://www.jasso.go.jp/eju/index.html>提供的资料制作而成。

2010年,日本全国共有70所4年制大学、短大与高专招收留学生,共72665名,其中国公立的在籍学生数如下:国立10828人、公立1486人、私立60351人,^[6]国公立大学所占比例分别是14.9%、2%、83.1%,私立大学所招收的外国留学生是国公立大学的4倍强,是名副其实的主力军。

表3:2010年日本全国大学中外国留学生数量
中位居前5的大学

单位:人

大学	性质	人数
早稻田大学	私立	3568
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	私立	2921
东京大学	国立	2772
日本经济大学	私立	2388
九州大学	国立	1713

注:该表根据日本学生支援機構·留学生受入れ数の多い大学http://www.jasso.go.jp/statistics/intl_student/ref10_02.html提供的资料制作而成。

从表2、表3我们可以看到,私立大学的各项指标都达到甚至超越了总平均值,以外国留学生所占比例看,国立为11.4%,公立为9.8%,而私立达到了22.7%,远远超过了国公立比例。英文授课的比例也是私立大学最高,为9.9%。而在外国留学生在生数量比较中,位居前5的大学中,3所为私立大学,共有8877名在校生;2所为国立大学,外国留学生共4485名。无论哪一项指标都凸显了私立高校的主体地位。

2.日本高校利用“日本留学考试”的基本情况。

2015年,共有188所国公立高校利用日本留学考试,其中国立大学80所、国立高专51所、公立大学48所、公立短大7所、公立专门学校2所;而私立高校利用日本留学考试的数量达到473所,分别是私立大学289所、私立专门学校110所、私立短大74所。^[7]私立高校利用日本留学考试是机构数量远远高于国公立高校,成为了推动留学生招收的主要载体。

3.日本高校“协定校”关系缔结的情况。所谓

“协定校”是指日本高校与海外高校之间缔结的姐妹校关系,通过学分互认机制促进高校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进程。2008年,与国外大学通过交流校项目制定学分互认制度的大学只有246所,其中国公立大学分别是55、22、169所,私立占了68.7%,可见,私立大学与海外大学缔结“协定校”关系更为活跃主动。

(二)亚洲留学生所占比重庞大

2004年,日本共接收了117302名留学生,其中,中国留学生77713人,占了66%。^[8]2005年,共有121812名外国留学生,其中中国留学生80592人,占总数的66.2%。2010年,外国留学生数增至14.2万人,其中中国留学生最多,高达8.6万人。^[9]以中国、韩国为首的亚洲学生是日本外国留学生的主体,就这点而言,留学生生源的相对单一性稀释了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性质。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源在于,日本留学生招生考试是人口管理型改革,在过程跟进与出口管理中有所缺失,如纯英文课程不足、学分管理过硬、留学生就业环境不佳等,导致留学生招生规模扩大有限。2006年,日本大学中,只有5所大学的6个学部开设了仅凭英语就可以获得学位的课程,这就极大束缚了英语系国家学生赴日留学的热情。

(三)为外国留学生赴日留学提供完备的大学预备教育体系

日本拥有丰富完备的留学生预科教育,一共分为三大渠道,第一、大学下设别科,截止2009年4月,共有59所4年制大学、7所短期大学设置了别科;第二、国立日语教育机构;第三、民间日语教育机构。

为了帮助留学生适应日本考试,文科省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大阪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生支援机构、拓殖大学、东京国际大学等19个教育机构设置了日语教育中心,下设专门的大学入门准备课程,不仅为学生提供日语教育,也为学生的大学报考等提供指导服务。自然还有大量民间教育机构提供相应的入学教育服务。截止2009年3月,通过了财团法人日本教育振兴协会认定的日语教育机构一共有426个,在

学生数42651人。2010年,共有2140外国留学生在大学入学考试准备课程中学习,^[10]各类大学预备教育机构的存在为推动外国留学生赴日留学事业的发展铺垫了基石,是吸引外国留学生的重要政策。此外,2000年开始,文科省将获得认定的日语教育机构纳入了政府奖学金发放体系,作为推动留学生招收计划的辅助政策,每年为部分学生提供一定奖学金,如2010年为700名打算继续升学的留学生发放每月4.8万日元的奖学金。^[11]

(四)紧跟国际国内形势适时调整考试内容

1.日本留学考试改革。日本留学考试是链接日本高等教育与世界高等教育的桥梁,因此,紧跟世界发展步伐的强烈意识推动着日本留学生考试不断自我调整以跟上一些新出的世界性课题与日本问题,避免滞后于世界步伐。伴随日本新版学习指导要领的推行,日本留学考试也修订了相应考试内容,将于2016年6月开始正式实行。其考试内容的增删如下表:

教科	科目	根据学习指导要领的变化而调整增加的考试项目	增加的具体考试子项目
政治 经济 社会	现代社会	社会保障、区域社会变迁、食品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现代经济	消费者、劳动问题	市场经济、价格机制、政府功能与经济政策、贸易、货币兑换、国际收支
	现代政治	议会制民主主义、地方自治、新人权	日本国宪法、基本人权与法律支配、国会、内阁、法院
地理	现代国际社会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日本的国际贡献	种族、民族问题
	现代世界的特点与地理考察	世界生活、文化、宗教、自然环境与自然灾害及其预防	城市、村落、日本的国土资源与环境
历史	近代的成立与世界的-体化		
	20世纪世界与日本	日本战后史	

注:该表根据日本学生支援機構·留学生支援·日本留学試験 基礎学力科目(総合科目)シラバス改訂版の公表http://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eju/about/revision/rev_jaw.html提供的资料制作而成。

2.日语能力考试改革。近年来,日语能力考试的考生呈现多样化特征,从小学生到上班族再到公务员等,生源的多样化已经成为事实,而报考目的除了日语能力考查之外,还活用于各种入学考试、就业、加薪、晋升和资格认定等方面,这意味着能力考试功能有所扩展。鉴于这种现实变化,2010年9月,国际交流基金以6.5万名日语能力考试的考生为对象实施问卷调查。调查针对听说读写四项技能,让考生各回答了约30道题,题目围绕“Can —Do”能力的考查,如“听到车站或商场的广播,基本能理解”等问题。设问分两个层面:①是否经历过该内容(经验);②能够做到多少(自我评价)。①用“有”和“无”来回答;②用“会”“有点难但勉强会”“不太会”“不会”这4个不同的难易度区分来回答。此次变革的根源在于日语教育理念的更新,国际交流基金提出了“Can —Do”的语言教育评价新理念,运用自开考以来长达25年之久的日语教学和考试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及迄今为止积累的测试结果数据,对日语能力考试的内容进行了改版,自2010年以来就实施了新的日语能力考试。新的能力考试改变了传统的以词汇记忆与语法辨析为主,并且侧重基础知识掌握程度的倾向,转向考察学生能否理解纷繁芜杂的实际场景中的日语运用,测试考生是否具有完成课题所需的语言交际能力,是“基于相互理解”理念下的日语教育的评价机制。因此,新版日语能力考试偏重阅读与听解能力的考核,对考生逐级提出相应阅读理解要求,如对报考1级的考生提出要能够阅读论说文,要能够在复杂、抽象的阅读文脉中厘清思路,找到焦点并展开阐释。

参考文献:

[1]岩男寿美子,萩原滋. 日本で学ぶ留学生[M]. 東京:勁草書房,1988:3-8.

(下转第 21 页)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及其启示*

徐光木 胡天佑

摘要:摆脱殖民统治半个世纪以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对大中学招生考试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特殊的历史和地域因素影响下,特多的招生考试,既承接了原宗主国部分招生考试,又参与了加勒比海地区性考试,同时也实行国家自主开发,招生考试种类和科目多样化,应试者具有考试科目的选择权,大学招生高度自主,形成了主体多元,多头管理,统一实施的管理格局。特多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为我国高考制度和学业水平考试制度改革提供了若干经验启示。招生考试组织管理可考虑主体多元化,科目设置灵活化,制度改革应稳健,并继续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

关键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招生考试;制度;改革

独立半个世纪以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加勒比海岛国,迅速发展成为人均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与特多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教育发展和改革,特别是紧密结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适时改革招生考试制度,调整招生考试管理体制机制、考试项目、考试科目有关。但是长期以来,学界通常将加勒比海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以特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成果较少。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特多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历史背景,探究特多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具体路径内容,理性分析特多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成功经验,以期为我国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提供若干有益启示。

一、特多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背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由特立尼达岛与多巴哥岛以及其他21个较小岛组成。特多总人口约有132.5万

人,其中非裔和印裔各占约40%,另外还有少部分混血人、阿拉伯人后裔和华人等。特多在历史上曾先后被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占领,直到1962年才独立,成为英联邦成员国。特多现行教育系统深受殖民统治时期的影响,其教育体系的结构、层次和运作均植根于英国殖民统治时代。围绕英属殖民地的教育建制,特多的招生考试制度承袭于英国,与其一脉相承,如小学生毕业必须参加小学毕业考试(Primary School Leaving Certificate Examination,简写PSLCE),小学升中学必须参加中学入学考试(Secondary Entrance Assessment Examination,简写SEA),中学毕业和接受高等教育必须参加伦敦大学举办的普通教育证书考试(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简称GCE),其中普通教育证书考试(GCE)又分两个层次,一般水平(GCE Ordinary

作者简介:徐光木,男,湖北武汉人,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干部,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和招生考试管理(武汉 430074);胡天佑,男,湖北黄冈人,湖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考试学(黄石 435002)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北省2014年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改革专项课题“湖北省普通高考综合改革方案研究”(项目编号:鄂教政法办[2014]2号)的阶段成果。

Level)和高级水平(GCE Advanced Level),前者作为中学毕业的条件,后者作为向大学申请入学的条件。普通教育证书考试(GCE)的普通水平(O-Level)科目包括:艺术和设计水平,西班牙语,印度语,历史和宗教研究;高级水平(A-Level)科目包括古代史、会计、商业研究、经济学、法语、政府治理、历史、法律、数学、理论数学、高等数学和西班牙语。^[1]

从历史上看,在殖民统治时期,接受教育的权利只向当地的白种人开放,非白种人受教育的机会实际上并不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曾详细阐述本地区殖民统治时代的教育体系对大众教育的普及所产生的极为不利影响。当时的教育培训体系完全是为了适应殖民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目标而制定的,适合于普通大众的基础性教育显然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目的是为种植园主阶层提供大量的循规蹈矩的劳工。^[2]但是,在通过上百年的抗争终获独立后,特多亟待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进行革新,招生考试制度作为塑造意识形态和培养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自然被特多政府作为社会领域改革的先锋,给予了高度重视。

二、特多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

1960年特多获得独立后,随着经济的迅速成长,原有教育制度已经无法满足独立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特多于是相继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教育免费制度、职业教育制度、高等教育制度和国家考试制度。1962年,西印度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简写WUI)在特多设立校区(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at St. Augustine,Trinidad and tobago),特多从此有了第一所大学;1965年,特多成立国家考试委员会,主要负责职业技术部的资格水平认定^[3];1970年,特多建立3年初中制、2年高中制的中等教育制度;1972年,特多职业技术学校开始招生,职业教育体系从此建立;2001年,特多政府独立设置高等教育和技术培训部,该部门和教育部一样作为中央政府的组成部门,专司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管理职能;2002年,为实施“大学入学率3倍增计划”(The Government's Goal of Tripling Post-secondary University Enrollment),特多建立了第一所国立大学——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大学,开设了从学士到博士的课程。为适应新的形势,特多政府还对招生考试制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其主要举措是,1972年发起并加入加勒比海地区考试委员会(CXC),并分别于1972年和1998年用该委员会主办的中等教育证书考试(Caribbean Secondary Education Certification,简写CSEC)和高级水平证书考试(Caribbean Advanced Proficiency Examinations,简写CAPE)替代带有殖民地性质的伦敦大学普通教育证书考试(GCE)的一般水平(O-Level)和高级水平(A-Level),以彻底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但是,地区性考试除具备规模优势,能降低考试组织成本等优点外,也有其弊端,成员国之间的会议需要轮流坐庄也增加了相应的费用,而且为地区考试设置的课程仍做不到使所有的参加者满意^[4]。也正是基于这些考虑,特多也在着手开发带有国家主权性质的招生考试,如针对小学1到4年级学生的国家学业水平测试(The National Test),针对初中毕业生的国家中等教育证书考试(National Certifica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简称NCSE)Level-1等^[5]。

表1 改革前后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招生考试设置对比

学校层次	入学年龄	毕业年龄	学制	改革前的招生考试	改革后的招生考试
小学	5	11	6	小学毕业考试(PSLCE) 中学入学考试(SEA)	国家水平测试(TNT) 小学毕业考试(PSLCE) 中学入学考试(SEA)
初中	11	14	3		国家中等教育证书考试(NCSE)Level-1
高中	14	16	2	普通教育证书考试(GCE) O-Level	加勒比中等教育证书考试(CSEC)
大学预科	16	18	2	普通教育证书考试(GCE) A-Level	加勒比高级水平证书考试(CAPE)

资料来源:①基类网:<http://www.classbase.com/Countries/Trinidad-and-Tobago/Education-System>。

②特多共和国政府网站:<http://www.ttconnect.gov.tt/>。

加勒比海地区性招生考试和特多独立举办的招生考试,与带有殖民性质的宗主国举办的招生考试相比,在考试科目和内容上存在显著差异。就英国举办的招生考试而言,象征宗主国殖民文化的语言、历史、政治类的科目较多,而加勒比海地区性招生考试和特多独立举办的招生考试则更加注重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培养,学生拥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例如特多独立举办的国家中等教育证书考试(NCSE) Level-1涵盖了语文、数学、科学、社会研究、视觉和表演艺术、西班牙语、技术教育、体育等8个科目。专门针对小学生的国家学业水平测试则包括语文、数学、科学社会研究等3个科目,其功能在于检测区际和校际间的教学质量差异,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加勒比海地区中等教育证书考试(CSEC)更是设置了农业科学、工程技术、建筑学、物理、化学、纺织、加勒比史、办公室规范等21个科目供学生选择。加勒比海地区中等教育证书考试(CSEC)成绩以等第形式呈现,学生成绩采用等级报告制,从A到F依次分6个等级,其中A代表优秀,B代表良好,C代表较好,D代表合格,E代表勉强合格,F代表不合格;相当于加勒比海地区“高考”的加勒比高级水平证书考试(CAPE)核心课程包括:加勒比海地区研究、化学、传播学、经济学、环境科学、法语、地理、历史、理论数学、社会学、西班牙语、艺术设计等25门课程^[6],其科目设置有别于毕业性质的加勒比中等教育证书考试(CSEC),体系完备,学术性非常强。虽然加勒比高级水平证书考试(CAPE)仍然以等第的形式呈现成绩,但等第更多,从A到G依次分7个等第,其中A代表突出,B代表非常优秀,C代表优秀,D代表良好,E代表合格,F代表较差,G代表非常差。^[7]

三、特多的招生考试管理体制

在特殊的历史和地域因素影响下,特多的招生考试形成了主体多元,多头管理,统一实施的格局。从管理主体来看,既有宗主国主办的考试,也有加勒比海地区性的联合考试,还有特多本国自主开发的国家考试;从招生考试的组织实施来看,虽然考试的主办主体多元,但在特多国内,招生考试统一由教育

表2 特多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前后
主要考试科目对比

考试名称	考试作用	科目总数	考试科目
普通教育证书考试(GCE) O-Level		5	艺术和设计水平, 西班牙语, 印度语, 历史和宗教研究
加勒比中等教育证书考试(CSEC)	中学毕业	21	农业科学、数学、生物、工程技术、建筑学、音乐、加勒比史、办公室规范、化学、体育、纺织、物理、电子文档管理、会计学原理、英语、宗教、食物和营养、速记、法语、社会研究、地理、西班牙语、家政管理、工程制图、人类和社会学、戏剧、信息技术、文字输入和视觉艺术、综合科学
普通教育证书考试(GCE) A-Level		12	古代史、会计、商业研究、经济学、法语、政府治理、历史、法律、数学、理论数学、高等数学、西班牙语
加勒比高级水平证书考试(CAPE)	高中升学	25	会计, 应用数学, 艺术设计, 生物, 加勒比地区研究, 化学, 传播学, 计算机科学, 数字媒体, 经济学, 电工与电子技术, 环境科学, 食物和营养, 法语, 地理, 几何与机械工程, 历史, 信息技术, 法律, 英语文学, 工商管理, 物理学, 理论数学, 社会学, 西班牙语

资料来源:特多共和国政府网站:<http://www.ttconnect.gov.tt/>.

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特多的这种招生考试管理体制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的小国家招生考试改革的特有困境:既要尽可能地体现和维护国家利益,又不得不顾及国际认可度和考试的组织成本,因此特多不得不遵从一些传统(继续组织宗主国主办的国际性考试)和加入区域性考试组织(加勒比海地区考试委员会),以期达到既体现国家意志又确保考试认可度的目的。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部,并非所有考试都由同一个专门机构来实施,特多根据每项考试的性质和类别,将不同的考试交给不同的机构来

承办。概括来讲,教育部考试司主要承办由英国伦敦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和加勒比海地区考试委员会主办的考试;教育研究与评估司主要承办特多自主开发的国家考试;其他类别的招生考试,如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考试,则由隶属于高等教育和技术培训部国家考试委员会承办。

表3 特多招生考试管理体制

考试主办机构	考试名称	考试承办机构
特多共和国教育部	国家水平测试(TNT)	教育部教育研究与评估司
	国家中等教育证书考试(NCSE)	
	小学毕业考试(PSLCE)	
伦敦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	中学入学考试(SEA)	教育部考试司
	普通教育证书考试(GCE)	
加勒比海地区考试委员会	加勒比中等教育证书考试(CSEC)	国家考试委员会
	加勒比高级水平证书考试(CAPE)	
高等教育和技术培训部	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考试(TVETE)	

资料来源:特多共和国政府网站:<http://www.ttconnect.gov.tt/>.

特多的大学招生主要以考试成绩作为主要依据。1998年以前,特多只有西印度大学(特多校区)一所大学。该校录取学生时主要考察普通教育证书考试(GCE)A-Level的成绩,其对申请入学者的成绩要求是,加勒比中等教育证书考试(CSEC)有5个科目合格,并且普通教育证书考试(GCE)A-Level有2个科目考试等级为A。从1998年开始,加勒比高级水平证书考试(CAPE)逐步取代普通教育证书考试(GCE)A-Level,成为大学录取的主要依据,因此,西印度大学(特多校区)也将申请条件更改为加勒比中等教育证书考试(CSEC)有5个科目合格,并且加勒比高级水平证书考试(CAPE)或者普通教育证书考试(GCE)A-Level有2个科目考试等级为A。2002

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学成立,该大学以为特多国家和加勒比海地区培养高端人才为办学目标。其申请条件和西印度大学保持一致,也是加勒比中等教育证书考试(CSEC)有5个科目合格,并且加勒比高级水平证书考试(CAPE)或者普通教育证书考试(GCE)A-Level有2个科目考试等级为A。^[8]特多大学招生除以相关考试成绩为参考依据外,还充分考虑学生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例如能够证明本人学术成就或职业技能等方面的证书等情况。^{[9][10]}

四、特多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质量,特多各类学校为经济社会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促进了特多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多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不仅值得加勒比海地区其他国家学习,也同样值得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借鉴。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11]随后,国务院又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对改革进行系统安排,明确了改革的任务书、路线图和时间表。当前,我国正在着手进行新一轮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学业水平考试制度改革,各省份也正在制订自己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及其配套办法,其中浙江、上海等省份已经先行试点,无论是在考试顶层制度设计方面,还是在考试科目设置、成绩呈现形式等具体细节上,特多的一些做法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招生考试主体可考虑多元化

特多招生考试制度之所以形成多国、多方主办的格局,有它的特殊历史原因,由于国情不同,因此一味地照抄特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即我国不必大力引进国际考试项目。特多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尽管我们无需大量引进国际考试项

目,但是我们可以大胆放权,放手让经政府认可的社会中介机构主办和承办相应的考试项目,如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等,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都可以交由社会中介组织来承办,并在社会中介机构间形成一定的竞争和相互制约机制,教育行政部门只需加强监管,将学生参加这类考试所取得的成绩为加以承认并利用即可,此举能够大大降低和减轻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考试的风险和负担,从政府部门办考转变为政府部门监督考试组织实施,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二)招生考试科目应灵活设置

特多教育行政部门和加勒比海地区考试委员会所主办的招生考试科目虽然繁多,如加勒比高级水平证书考试(CAPE)的科目多达25个,但学生并不需要全部通过这些科目,学生可以从中选择若干科目参加考试,通过该科目考试后取得的相应证书既能够为就业增加筹码,也可以作为继续求学深造的依据。此举大大减轻了学生的考试负担和成本,并赋予了学生较大的自主选择权。特多及加勒比海地区灵活设置考试科目也给我们以启示,即在高考改革、学业水平考试改革和考试社会化改革进程中,通过在考试项目、考试科目方面给学生更多的自由选择机会,使学生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爱好择其所长,从而更大程度地发掘和发挥每个人的特长,最终促成各类顶尖级人才的培养。

(三)考试招生制度应稳健改革

摆脱殖民统治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多的招生考试制度虽然经历了若干次较大的调整,但这些制度上的调整均是按照既定路线实施的渐进式改革,并没有出现跳跃式改革甚至将某项考试招生制度推倒重来的现象出现,而只是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完善。即便是修订和完善招生考试制度,其频率也非常低,50多年来,该国称得上改革的招生考试制度调整只有两次,因此没有令学校和学生无所适从的情况发生。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事关教育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高频率、否定式的改革非常不可取,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必须稳健、慎重,特多对改革的审慎态度值得我们借鉴。

(四)高校招生自主权可考虑扩大

总体上看,特多实行的是国家统一考试,大学自主招生的考试招生制度。特多招生考试的设立、认可和组织实施责权在教育行政部门,但是考试结果的运用权却在大学和有关单位,由学生依据考试成绩等向大学提出入学申请,大学依据入学门槛作出批准入学与否的决定。特多大学自主招生格局的形成自然有其历史背景和人口较少等方面的影响,和我国不可相提并论,但是,作为全国总人口超过13亿,城乡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差距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不可以完全排斥自主招生,应考虑适当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设立大学入学门槛的方式(类似于现在的高考批次线),诸如规定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相应科目必须取得哪一等次,才能报考某一批次或类型大学,从而对高校自主招生形成一定监督和制约。除入学门槛制约机制外,还须辅之以自主招生公示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让高校自主招生置于媒体和全社会的密切监督之下。在这里,我国有必要纠正一种观点,即认为招生是政府的权力,而实际上,招生权在高校,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其实是还权于高校,而不是向高校赋权。为稳妥起见,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可以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分批、分类、分校、分地区进行试点,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扩大试点,直至全面推行。

总而言之,特多虽然只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小国,但其作为一个教育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其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却是深刻的、全面的,十分值得我国及各省份在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时借鉴参考。

参考文献:

- [1]Student Exams.[EB/OL].[2014-04-20].http://moe.gov.tl/student_exam.html.
- [2]黄凯玫,范国睿.加勒比海地区的教育改革:背景、现状和趋势[J].全球教育展望,2007(5):48-49.
- [3]National Examinations Council(NEC).[EB/OL] [2014-04-10].<http://www.stte.gov.tl/Programmes/NEC/Overview.aspx>.
- [4]马克·贝磊.小国家的考试制度:在国际背景下满足国家需要[J].比较教育研究,2000(6):58-59.
- [5]Examinations.[EB/OL].[2014-02-18].<http://www.ttcon->

nect.gov.tt/gortt/portal/ttconnect/Cit_student.

[6]The Caribbean Advanced Proficiency Examination (CAPE).[EB/OL]. [2014-2-21].<https://www.cxc.org/?q=examinations/exams/cape>.

[7]Grading System in Trinidad and Tobago. [EB/OL]. [2014-2-18].<http://www.classbase.com/Countries/Trinidad-and-Tobago/Grading-System>.

[8]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Trinidad and Tobago[R]. AACRAO Annual Meeting, March 25, 2008:16-19.

[9]How to Apply. [EB/OL]. [2014-4-16].http://u.tt/utt_programme_application_process.php.

[10]Apply to UWI.[EB/OL].[2014-04-16].<http://www.uwi.edu/admissions.asp>.

[11]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M].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3.60.

(责任编辑 王伟宜)

(上接第 15 页)

[2]文科省.「留学生30万人計画」と大学の国際化[R]. 特集平成21年度高等教育行政の展望,2009:9.

[3]中央教育審議会.新たな未来を築くための大学教育の質的転換に向けて～生涯学び続け、主体的に考える力を育成する大学へ～[R]2012:8.

[4]日本学生支援機構.留学生支援.平成28年度日本留学試験(第1回)応募者数[EB/OL]. http://www.jasso.go.jp/ryugaku/study_j/eju/about/data/examinees_no.html.

[5]日本語能力試験過去の試験のデータ[EB/OL].<http://www.jlpt.jp/statistics/archive/201502.html>.

[6][10]日本学生支援機構・平成22年度外国人留学生在籍状況調査結果[EB/OL]. <http://www.jasso.go.jp/statistics/>

intl_student/data10.html.

[7]日本学生支援機構・日本留学試験利用校[EB/OL]. <http://www.jasso.go.jp/eju/use.html>.

[8]沢谷敏行.大学事務職員のための日中留学交流の手引き[M].兵庫:関西学院大学出版会,2005:3.

[9]高等教育局学生支援課[EB/OL]. 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gakuseishien/1269672.htm.

[11]文部科学省・日本留学生制度概況2010[EB/OL].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icsFiles/a_fieldfile/2011/12/14/1286521_6.pdf.

(责任编辑 王伟宜)

光复后韩国高校招考制度的演变

凌 磊

摘 要: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韩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也经历了曲折的变化过程。韩国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几乎每年都有变化和调整。伴随着政权交替和经济形势的风云突变,大学招生考试制度也会因当时的不同政策而随之变化。以教育均衡为发展方向,以教育公平为根本目的,为了每一个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为行动目标,韩国政府根据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不断改革优化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探索韩国光复后高校招考制度发展之演变,对我国高考改革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韩国;高校;招考制;演变

一、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朝鲜作为日本的殖民地,主要向日本提供粮食、原材料,同时也是日本商品销售、资本投资以及强制文化输出的重地。日本在战败后,撤走了大量的技术人员,使得整个朝鲜半岛的产业都处于停产状态,加上南北分裂以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让韩国经济面临崩溃,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也未有好转。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领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半岛国家,在1961年朴正熙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并夺取了国家政权后,从1962年开始,朴正熙政府倡导大力发展经济,制定了以出口为增长动力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规划,并提出了“教育立国”和“科技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韩国经济发展。经济迅速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在“教育立国”口号和相应的教育改革措施的配合下,韩国的教育水平已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前列。根据1960年对73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与高等教育就学率资料显示,韩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与其国民生产总值发展之比是最高的。^①高等教育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个人在社会的综合发展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韩国在实现综合国力快速

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和改革高等教育方针与政策,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韩国政府利用两年的时间研究制定了《长期综合教育计划(1972—1986)》,其中明确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为了加强高等教育在招生制度、学校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制定了《教育发展的课题与展望(1978—1991)》,1985年韩国政府对外发布了教育部门报告书《面向2000年国家长期发展构想》,又在2000年制定了《面向21世纪韩国BK21计划》。这些举措极大地促进了韩国高等教育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韩国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同样经历了曲折多样的变化过程。在“弘益人间”教育理念的指引下,以教育均衡为发展方向,以教育公平为根本目的,为了每一个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为行动目标,韩国政府根据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不断改革大学招生考试制度。

二、光复后韩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演变

(一)各大学单独考试时期(1945年—1953年)

1910年,大韩帝国与日本帝国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韩国正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到1945年8月15日朝鲜半岛光复才彻底摆脱了日本对其长达

作者简介:凌磊,男,吉林延边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厦门 361005)

35年之久的统治。独立后,日本从韩半岛撤回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使得朝鲜半岛的经济一度陷入困境。加之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得整个朝鲜半岛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战争时期,整个朝鲜的工业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然而,在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为了实现“无新增文盲”的教育宗旨,执着于“教育立国”的朝鲜民族并没有放弃本国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大学招生考试工作仍照常进行。

1945年到1953年,韩国实行的是各大学单独考试,大学在招生方针政策的制定、大学的运营和管理有足够的自主权。当时有大学入学考试资格的人员应学习了中学6年全部课程,并且各科考试合格毕业。除此之外,为了让自学者也有同样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文教部还特别设立了公费的“大学入学资格认定考试”,该考试每年举办两次,资格认定考试合格者,同样可参加大学的招生考试。由于战争对基础教育的破坏,高中毕业人数和资格认定考试人数远远满足不了当时大学招生计划人数的要求,所以当时政府决定将没有授予入学资格的五年制中学毕业生也都进入了大学学习。当时的学生分为前期和后期两期入学,入学选拔考试也以笔试为主,考试时间和考试内容由各大学举行校长会议进行商议后,报请文教部再行,考试内容分为必考科目和自选科目,并规定必考科目数量应在四科以上,自选科目至少为一科,总考试科目数量要在五科以上。

从美军政时期到“6.25”动乱,韩国建立了“6—3—3—4”学制,大学建设也如火如荼的进行,从入学机会均等、教育公平等角度确定了新的入学考试制度,而当时高中毕业生人数较少不能满足大学的招生计划要求,由于入学资格考试政策松散不合格者也进入大学学习,部分学生因为服兵役需要休学并保留学习,大学数量的增加,教授数量不足和教学辅助设备硬件设施的差异,导致现实中供求失衡,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导致大学教育质量下降,韩国政府为应对这一系列问题,在国家最高监督机关的监督下,对国家最高学府入学者的相关资格加强大查证力度,决定在1954年开始实施大学入学国家联合考

试和各大学单独考试并行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

(二)大学入学国家联合考试和各大学单独考试并行时期(1954年)

1954年大学入学选拔纲要指出,联合考试由大学入学者选拔考试委员会主管和实施,联合考试合格者才能参加各大学的单独考试,只有女性和军人可以免除联合考试。联合考试和各大学单独考试都为必考项目,之后还有面试和体检,体检合格后方可入学。这一时期的大学招生考试同样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考试为联合考试,联合考试在1953年的12月28日和29日举行,考试地点在各道厅所在地举行,联合考试的成绩为机密,仅向考试合格者颁发合格证书,在填报志愿时向报考院校提交,证书的有效期通常在招生当年的四月截止。

联合考试仅在1953年举行一次,在考试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不公平竞争现象,结果导致这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失败。这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失败,与当时动乱的社会环境和文教部当局不成熟的行政管理体系有关。联合考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入学学生的生源质量,防止不正当的入学现象出现。然而结果正与当初的设想相反。由于文教部的过分干涉,实施联合考试,使得学生的学习负担过重,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学生们的入学机会,侵害了教育均等权和受教育权。女性和在职军人可免除联合考试也影响了教育公平。

(三)大学单独考试和免试并行之转型时期(1955年—1961年)

1955年,韩国文教部颁布了《大学设置基准令》,^[2]此法令的目的是控制新大学频繁设立,防止新大学在数量上无限制地增长,提高大学教育水平。与此同时大学招生考试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文教部发布了《国立、公立大学入学选拔纲要》,规定这一时期的考试主要分为考试(主要为笔试)和免试入学两种方式;招生计划总数的10%用于免试入学;笔试内容和科目也都进行了调整,要求笔试内容要与将来所接受的大学教育相关,确定4个以上的考试科目,其中2个科目每年变更;题目设置难度要适中,并且贴近生活,主要选择能够测试学生智力、情感、分析等能力的题目。选择免试的学校逐年增加(详见表1)。

表1:1958—1960年大学入学考试方式情况表⁽³⁾

项目 年度	首尔市 内大学 总数	免试	笔试	免试、笔 试并用
1958年	20所	1所 (延世大学)	10所 (首尔 大学等)	9所
1959年	26所	1所 (延世大学)	17所 (首尔 大学等)	8所
1960年	23所	5所	8所	10所

免试制度是申请制的活用,它主要以评价为中心,随着免试制度的确立,招生人数远超大学的教学承受力和招生计划的局面重演,免试制度的信度和效度遭到质疑。虽然这一时期大学入学考试与之前相比没有大的变化,但入学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人们开始对大学入学考试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进行反思。

(四)大学入学资格国家考试时期(1962年—1963年)

“5.16”军事政变后,大学入学考试制度迎来了划时代的历史转变,1961年8月12日公布的《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和大学入学相关临时措施法案》(法律第618号)中规定,为了让教育的正常化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和大学入学考试由国家组织命题、实施,变更为全国统一考试,各大学单独考试宣布废止。为避免全国统一考试的选拔作用对职业技术教育造成不良影响,特别规定职业技术高中学生进入大学同专业学习可免除全国统一考试。

这时期大学入学参考国家考试成绩和各大学单独实施的“才能考查”分数进行核算,根据学生分数和大学专业的特点进行招生,男女可同校。全国统一考试合格分数线为150分(含150分),150分以下判定为不合格。合格者按分数高低顺序选择科系。科系内再按各专业的特殊性,例如艺术、体育和二年制师范专业按自己的专业特殊性确定合格者名单。公示合格者国家考试成绩并寄送合格通知书。

该制度解决了当时因免试制度造成的不正当手段入学,学校招生计划和实际人数基本吻合,提高了考试的可信度。但对于所有考生来说,一定程度上侵

害了他们受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对于学科来说,大量不喜欢该专业学生进入专业学习,而对专业感兴趣学生却不能进入该专业学习,由此教学质量不能得到保障;对于大学来说,以成绩为唯一的录取标准使得大学丧失了招生自主权。由于以上三方面原因,全国统一考试仅举行了两年就宣告废止。

(五)各大学单独考试时期(1964年—1968年)

全国统一考试实施两年过程中,大学通常实际招生人数达不到计划人数,侵害了大学的招生自主权,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教育机会均等原则。从1964年考试,重新实施各大学单独考试制度。

1964年颁布的《大学入学考试政策纲要》指出,大学校长负责大学入学考试管理,在确定考核方式和招生计划后,报文教部备案。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考试分为笔试和“才能考查”。大学校长确定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职业技术大学的选考科目必须包含实科性质的科目。

2.“才能考查”按照文教部发布的考查方法和标准实施,所占分数为总分数的67%,即三分之二。

3.艺术和体育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在不增加招生计划的情况下,可免除笔试,与普通考生一起参加“才能考查”。

4.职业技术大学在招生计划的20%以内,可免试入学。

5.考试实行校长裁量制,分为前后两次进行。考试在1月下旬开始,2月中旬结束,具体考试日期需报文教部备案审查。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因其涉及到国家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教育均衡等实际问题。纵观韩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变化和调整。笔者对其进行了概要式的梳理(详见表2)。

三、韩国高校招考制度演变的缘由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从表面上看是高等学校选拔学生的一种方式,但从长远看,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本身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即为社会选拔和培养人才,所以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演变与其外部各方面因素关联。结合韩国光复后社会发展实际,笔者认为韩国高校招考制度演变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表2:光复后(1945—1968)韩国大学入学考试
制度变迁过程**

年度	背景	主要内容	主要问题
1945-1953	摆脱日本独裁 扫盲行动	大学单独考 试制度	不正当入学
1954	不正当入学 教学质量下降	大学入学国 家联合考试 和各大学单 独考试并行 制度	联合考试失 效
1955-1961	联合考试失败 确保大学招生 自主权	各大学单独 考试和免试 并行制度	大学间差距 加大 应试教育弊 端
1962-1963	教育正常化发 展 提高教学质量	大学入学资 格国家考试 制度	成绩不合格 淘汰 大学学科间 差距加大
1964-1968	国家统一考试 失败 确保大学招生 自主权	各大学单独 考试制度	应试教育弊 端

(一)建国初期,基础教育薄弱与经济发展需大量高级人才之间的矛盾

由于日本殖民地奴化教育政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致使韩国基础教育发展十分落后,建国初期,除了国语、历史课程外,其他课程几乎无法开设,不仅如此,当时也只有国语和历史课本是用韩国语编写。韩国于1950年修改颁布了《教育法》,确定了“六三三四”学制,美国从1952年开始到1955年,曾经三次派遣“教育使节团”帮助韩国制定基础教育课程,改善教育教学方法,指导高校招生制度改革,但课程内容仍然沿用美军政初期的设置,没有太大变化,并且受当时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和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强调对学生进行所谓的“道义”思想教育,偏重地方特色,实质上并没有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朝鲜半岛光复,日本从朝鲜半岛撤走了大量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导致韩国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此时虽有美国方面的经济援助,但韩国迫切需要大量培养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而高等教育是仅有的培养途径之一。然而基础教育的落后,高中毕业生的知识水平有限,无法达到大学招生统一考试的基本要求,为

了解决这一难题,韩国取消统一考试,采取各大学单独考试的招生方式,大量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具有五年制中学学习经历的社会人员。

(二)移植欧美教育制度失败

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后,兴起了一股求学和办学热潮,一组数据显示,截止到1950年6月,韩国高校已有42所,其中综合大学4所,单科大学30所,其他大学8所;教职员工总数为2052人,平均每所大学拥有教职员工50人左右。仅四年后在1954年共达66所高校,其中综合大学13所,单科大学31所,二年制专科院校7所,其他专科院校15所。1959年大学数量达到80所。^[4]由于在美军政的控制之下,盲目引进欧美大学制度和迅速扩大大学的规模,结果导致教授、基础设施、办学资金严重不足等问题,出现了轻视教学质量、忽视科学研究等现象。建国初期,韩国政府无力从根源上解决上述问题,只有通过调整招生考试制度的方式,严格控制招生人数来提高生源质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三)韩国民众对于高校招生制度公平性之诉求

公平是人类社会共同和永恒的诉求,之所以发明出考试这把“量才尺”,主要是追求公平的考虑。^[5]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之公平性,一方面受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国情和现实的需要,韩国与中国同处东亚文化圈,“学而优则仕”的学历主义思潮在韩国也普遍存在。社会地位、工资收入等都与学历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韩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引起了教育部门、社会舆论、学生及家长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广大考生及家长要求考试制度要公平,一方面又要求考试制度要确保受高等教育机会均等。而韩国高等教育的传统是私人投资高等教育占绝对优势,一组数据显示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私人投资高等教育占GDP的2.4%左右,而政府公共资金投入仅占GDP的0.4%左右。^[6]加之韩国高校在招生过程中有一定的自主权,在招生过程中的权钱交易不可避免,不正当招生现象屡屡出现。问题出现后,韩国通过出台教育公平相关政策法规,来约束高校招生过程中的自主权,并增加统一考试成绩在学生录取成绩中的比重,来调整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四、结语

韩国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几乎每年都有变化和

调整。伴随着政权交替和经济形式的风云突变,大学招生考试制度也会因当时的不同政策而随之变化。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是国家选拔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所必需的一种人才选拔方式。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韩国的招生考试制度呈现如下特点:

宏观层面来说,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影响着韩国经济繁荣、国家富强,其中更涉及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常常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韩国为了避免大学招生考试管理中出现漏洞,不断调整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法制化进程,立法修约,确保大学入学考试在“阳光”下进行。我国大学招生管理工作中也经常出现一些负面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和我国的高校法制建设相对滞后有关,我们在立法、执法以及监督管理体系上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如果不能加快高校招生管理法制化进程,再公平的招生体制也将陷入“无法可依”的地步,再科学的管理制度也会流于形式。^[7]因此,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明确政府、高校和考生之间的权利和责任,逐步形成高校自主招生、自我约束、地方招办监督服务、国家宏观调控的管理体制。^[8]韩国政府招生考试制度取得成功的另一关键原因在于它较为清楚地意识到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获利性,即受教育个体在接受高等教育后,会获得各种显性或隐性利好,因而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应属于个人投资行为,所以政府认为理所当然应由受教育者个人支付主要成本,并由市场机制来调配资源配置。我国经济也处在市场化程度较高阶段,受教育者要转变认识,不能简单地将高等教育理解为教育的高级阶段,高等教育阶段的目的和任务与义务教育有着明显的不同,不能一味依靠国家的财政投入来改善高等教育。笔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也同样适用于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制定,即从提高高等教育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和政策支持的办法推进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结构调整,扩大高质量有效的高等教育供给,提高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更好地满足广大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需要。

从微观层面来说,为了个体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能在社会占有一席之地,能进入理想大学学习和深造等等,这些都促使韩国执政党不断地改革大学招生考试制度。韩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也并不完

美,它也有着很多有待改进之处,在建立之初就充分考虑了学校的招生自主权,并在不断改革中完善。韩国大学在文教部的监督下,招生时独立行使录取新生的权利,充分享有招生自主权,这使得招生录取工作作风具有活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校之间的有益竞争,调动了高校办学的积极性。当前中国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十分有限,允许高校自主招生能更好地体现高校专业特点对考生要求的切合性,对于个别有专长的考生高校可采取灵活有效措施招生。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20%,高校数量大,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使得高校对自身的声誉更加珍惜,在监督得力的情况下,高校自主招生不一定会带来不公正现象的出现。相反,透明、公开、民主的自主招生制度将促进高校自律,有助于遏制腐败。^[9]

我国自1952年实施统一的高考制度以来,作为刚性的高校招考制度,录取标准较为单一,高校招生自主性不高,应试教育饱受诟病。为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招生自主化和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新目标,应把“口号式”的素质教育落到实处,根据学校特色和专业特点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在确保公平的前提下探索以统一考试为主体,学生评价方式多元化、录取方式多样化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参考文献:

- [1]孙启林、安玉祥.韩国科技与教育发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3.
- [2](韩)大学的现状和对策[N].东亚日报,1955-08-26.
- [3](韩)郑美京.我国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演变之研究[D].梨花女子大学,1981.32.
- [4](韩)金钟喆.韩国教育政策研究[M].韩国教育科学社,1989.176.
- [5]郑若玲.高考公平的忧思与求索[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2):26-27.
- [6](韩)Shin-Bok Kim.韩国教育模式的变革与发展[J].教育发展研究,2005(10):29-34.
- [7]张金元.高校招生制度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18.
- [8][9]刘海峰.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302-303.

(责任编辑 王伟宜)

● 考试理论与实践

创新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入学考试与招生制度的改革

吴科杰 吴根福

摘要: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和招生制度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创新教学背景下,招考改革必须以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为目标。针对不同类型的高校,采用注册入学、按学考总分录取和按高考总分录取等策略;针对不同类型学生,采用按竞赛成绩、按考试成绩、按成果类别择优录取等策略。目的就是引导素质教育的开展,让中学更加重视学生兴趣的培养和实验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协作能力、社会交际能力、思辨能力等创新能力的培养,实施因材施教,使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人格和创新能力得到普遍提高。

关键词:高考改革;创新教育;考试方式;招生制度

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倡导对考试招生制度进行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提出了顶层设计,在此基础上,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要通过深化改革,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为改革指明了方向。但招考改革具体应怎么改?应采取怎样的措施,采用哪一种模式,管理部门和教育专家见仁见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其中最典型的是目前正在试行的“上海模式”和“浙江模式”。从公布的内容来看,两者都是慢步小跑,采用文理不分科和一年两考的模式,并将英语考试社会化,并没有对考试和招生制度进行大幅调整。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高考招生制度应与时俱进,配合国家发展战略,进行系统、综合、全面的改革。自从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

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将创新放在国家发展的核心地位,期望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造就创新驱动的跨越式发展。

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是培养创新型人才;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关键是进行创新型教育。创新型教育是一种多元化的教育,需要在社会、家庭和学校的配合下,为受教育者构建创新思维所需的综合知识网络^①。学校教育在创新教育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作为引领中学教育改革方向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以及作为高校选拔人才风向标的招生制度,其改革必须以有利于创新人才的选拔为首要目标。

一、当前的招考制度不利于创新人才的选拔

创新型人才多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开放的思维架构、出众的实践能力,坚韧的意志品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因此,创新型教育不仅要为受教育者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更要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等综合创新素质^①。

作者简介:吴科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3级本科生(北京 100875);吴根福,男,浙江余姚人,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微生物学和应用微生物学(杭州 310058)

(一)当前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不能反映学生的综合创新素质

当前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以笔试形式对数学、语文、英语及理科综合或文科综合进行全国统一或分省命题考试。虽然能基本反映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但不能有效反映学生的综合创新素质^[2]。

由于缺乏实验操作考试,很难全面反映出学生的观察力、注意力、想象力、信息检索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等创新能力,更反映不出学生的探索精神、求异精神、质疑精神和冒险精神等创新精神。由于一份试卷要测试从985高校到专科学校的所有考生,对优秀学生来说,试卷难度偏低,考试以记忆题为主,推理题较少,虽然数学、物理等考试能基本反映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但因基础题偏多,不能有效反映学生的灵感思维、逆向思维、非定势思维等创新思维。理科综合和文科综合名为综合,实际上只是物理、化学、生物和历史、地理、政治三份试卷的叠加,缺乏真正的学科交叉,不能综合反映学生的想象力、知识迁移能力和发散性思维能力。

(二)当前的招生录取制度不利于选拔创新人才

当前的招生录取制度以统招为主,推荐免试和自主招生为辅,主要根据各科的总分成绩从高到低依志愿录取。这种招生制度虽然公平,但不利于创新人才的选拔^[3]。

首先不利于选拔偏才和怪才,偏才和怪才往往在某些科目分数很高,但因总分偏低,不能被优质高校录取;其次不利于选拔高情商的精英型人才,这些人喜欢把大量时间投入到社会实践中,进行各种人际交流,展示领导才干,而没有足够耐心重复应试练习,考试总分往往不高;再次不利于选拔动手能力突出的探究型人才,敏锐的观察力是发现问题的关键,而问题的提出则是创新的源泉,当前的招生制度缺乏操作考试,不能选拔出动手能力突出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强的学生。

(三)当前的中学教育模式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

当前的中学教育以高升学率为办学宗旨,学生整天沉浸在题海中,这种应试教育模式不利于创新素质的培养^[4]。

为了迎合高考,中学教育采取“考什么,教什么”的策略,有些学校甚至对教学大纲也采取在黑板上

“画”的方式,忽略了对动手能力、观察能力的培养,既不利于形象思维的训练,也不利于创新人格的培养和综合智力网络的构建。

像语文和英语等语言类科目,口头表达本应是重要的训练内容,但因为高考无口语考试,所以学校也把这些能力的训练推给了社会和家庭,致使许多学生的组织能力、思辩能力得不到有效锻炼,不利于领导才能和交际能力的培养。

应试训练是高三阶段的主要任务。对优秀生来说,多数时间重复着本来就会的题目,不但浪费大好年华,更主要的是一年的训练强化了快捷答题的思维定势,而扼杀了发散性思维、逆向思维和灵感思维。另外,中学教育缺乏因材施教的有效措施,学生往往把大量时间花在薄弱课程上,虽然经过训练逐渐培养起对弱项课程的兴趣,但也忽略了他们真正的兴趣所在,不利于灵感思维的培养。

二、高校入学考试制度的改革方向

基于以上高校入学考试制度的弊端分析,根据国务院“分类考试”的总体要求,我们认为,改革中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分类考试

在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的今天,可将部分高职院校转成社区大学,采取注册入学,学分制修业的社会教育手段,实施开放式办学。

学业水平测试(学考)既作为高中毕业的必要条件,也作为二本及以下院校的主要入学依据。学业水平测试严格按教学大纲命制,以基础题为主,难度不宜过高。对学考成绩达到该门课程前列(如前25%)的同学,可申请参加高考。高考以选拔创新型人才为目标,注重题目的综合性与创新性。偏科的学生可单独参加一门或几门课程的高考,如在高考中成绩优异,可申请高校的自主招生名额。

(二)一年多考

学业水平考试主要检验学生的“基础性学力”,以选择题为主,采用试题库进行标准化考试。试题库可按内容和难度分成多个分库,考试时从各分库中随机抽取1~2题,组成一卷。过渡期可通过纸质卷定期测试,条件成熟后采用机考模式。考试严格限定时间,题目做完或时间用完后自动打印出成绩。普通考生可有2次机会,在高三上学期测试完毕,若

成绩排在25%以后,则在高三下学期再有一次学考机会,以利于二本等院校的录取。

高考采用现有模式,但只对优秀学生开放,主要考察学生的“发展性学力”,因此试题应更灵活,更能体现选拔的功效,题型以主观题为主,难度适当提高。命题以高中教学大纲为准绳,但不受大纲约束,允许出现可根据大纲内容推导出的超纲内容。由于高考要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源,应以一年一次为宜。

三、高等教育招生录取制度的改革

基于现行高等教育招生录取制度的弊端分析,根据“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设计,在改革中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多渠道录取

高等院校应安排适当的名额招收各类学科竞赛的优秀选手。学科竞赛应在区县预赛和地市初赛的基础上,组织省级复赛,获奖选手再参加全国决赛。省级或全国比赛须由招生管理部门监督,委托相关高校或专业学会组织实施。决赛获奖选手可获得重点高校相关专业的入学申请资格,省级获奖选手可获得省属高校相关专业的入学申请资格,高校根据选手的竞赛表现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在面试的基础上提前录取。对理论性及实验性学科,可通过书面或实验竞赛获得入学资格,竞赛可参照目前的“奥数”模式。对人文社会类学科,可通过知识竞赛、辩论赛、演讲赛等获得入学资格,比赛可参照“天才知道”、“中国诗词大会”等模式,在寒暑假集中进行。对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可通过公开赛和运动会获得入学资格。对在国家级、省部级刊物上发表文章,申请专利,或在社会上做出特别贡献的学生,经中学推荐,也可获得自主招生入学申请资格。高校可在严格面试的基础上提前录取。

(二)多方式录取

除提前录取方式外,对参加统一考试的考生,以高考或学考成绩为依据,参考各种竞赛成绩和高中三年的表现,择优录取。对单科考分特别优秀的考生,可通过高校的自主招生模式来录取。为尊重高校或专业对生源质量的差异化需求,可对课程设置权重,并在招生文件中明确告示。如理工科学校可提高数学和物理的权重,文史类专业可提高语文和历史的权重,地方性普通高校可降低英语的权重。

四、中学教育的改革

中学阶段是学生世界观逐渐成熟、各种思维定式逐渐形成的时期,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时期,应大力开展创新教育,不断培养创新精神、创新人格和创新能力^[5]。

(一)更加重视兴趣的培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中学教育要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通过举办各种兴趣小组,组织各类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让同学们在快乐中学习。

(二)更加重视实验能力的培养

实验对创新思维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验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有利于兴趣的培养;实验过程中不但动手,而且动脑,有利于形象思维的训练和左右脑的整体开发;实验还能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有利于问题的发现和创新课题的提出。探究性实验常会以失败告终,对失败原因的探寻可强化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失败而不气馁的气氛可锻炼自我控制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三)更加重视口头表达能力、协作能力和社会交际能力的培养

现代社会是分工合作的社会,社会化大生产需要不同人群的分工合作,所以交往能力、沟通能力,协作能力不可或缺。中学阶段的教学应更加开放,组织更多兴趣小组,让学生进行更多社团活动,让他们在快乐中学习,在团队中进步,在交往中培养创新人格和合作精神。

(四)更加重视思辨能力的培养

现代社会是一个混合型社会,要让不同思想的人在大环境中和谐相处,不仅需要超强的管理能力,还需要具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和敏捷的思辨能力。中学阶段应多组织各种讨论会、辩论赛,让学生从辩论中积累经验,从讨论中培养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

(五)更加注重因材施教

社会需要不同类型的人,学校应按学生的兴趣和发展意愿实施因材施教。对优秀学生,应通过全面培养,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鼓励他们参加学科竞赛和综合高考,通过提前录取或统招获得高校录取名额;对特长生,应开设深层次的选修课,鼓励他们参加相关学科的竞赛,争取通过自主招生进入理想的大学;对普通同学,应鼓励他们巩固基础知识,在

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出好成绩,接受地方院校的挑选。

五、新招考模式展望

(一)建立学考的条件已经成熟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全国历经了近40次高考,近10年来约20个省份实行了单独命题,国家考试中心也从全国统一卷,发展成难易度不一的分区选择卷,这些考试除公开的正卷外,都有备份的副卷,再加上各地大量的模拟考试卷。这些考卷经过众多的实践检验,证明了试题的科学性,其难易度也有案可查,再加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国家汉语水平考试、美国TOFEL、GRE考试等机考的成功经验,使得建立统一试题库并进行高中学业水平机考的条件已成熟。只要考试管理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试题的进一步加工及难易度评析,试题库的建设将水到渠成。试点阶段可根据考生的名次折算成标准分,积累经验后,可通过调节考卷的难易题比例,采取电脑直接改卷出分的办法。由于试题库题量足够大,而且只是学考而已,失去了考前题海战术的动力;每次考试随机抽取的试题难度相当,不但考试的信度和效度上升,便于多次考试的相互比较,而且可节约因命题、印刷、监考所需的大量费用。每县区只设一个学考考场(考试中心),根据考生的多少,设置100—200个座位,每一座位配备1台电脑,建设考场所需费用不高。电脑利用局域网与主机连接,不会像互联网那样出现网络不畅的现象。学业水平考试原则上按中学分批考试,如果每场限时1小时,理论上每天至少可进行6场考试,按学考课程12门计算,每县区配置一个考场已足够。由于试题随机抽取,不同的考生题目不同,不存在相互偷看等问题,可节省监考所需的大量费用。目前大部分高中已迁至县城,再加上交通普遍较便利,不会出现赶考难的问题。

(二)通过竞赛获得入学资格已证明是成功的

中学奥林匹克竞赛已开展得比较成熟,获奖选手受到各校的广泛追捧。在电视、网络相对发达的今天,开展人文社科知识竞赛、百科知识竞赛也是可行的,有较多的现成资源可借鉴。这类竞赛不但可检验参赛选手的知识储备,而且可反映出选手的口头表达能力、思辩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有利于创新人才的选拔。竞赛可由考试院委托相关高校和电视

台联合承办,在预赛和初赛的基础上进行,以替代目前的自主招生考试,既可做到公平公开,避免高校间的无序竞争,也可使电视台拥有一批教育意义大,观赏性、知识性、趣味性强的优质节目,让学生多一个学习的渠道,让社会大众多一个学习的机会,从而有利于利国民整体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

(三)最大限度实施因材施教

对有志成为技术工人和普通职员的同学,可通过注册入学进入相关高职院校学习。对普通学生,要求他们巩固基础,通过学业水平测试来检验知识的掌握程度,接受二本院校的挑选。对成绩优秀的学生,不要求他们分分计较,而是进行创造性学习,对课程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究,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

学生应在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客观评价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目标。学校也应给予必要的指导。对参加竞赛和高考的同学来说,学业负担会有所加重,所以必须确认学有余力,而且对这些科目是感兴趣的,否则,还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采用本文提倡的模式,部分同学可能会收到两份录取通知书,使得高校的招录人数不易控制,可能造成部分教育资源的浪费。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应鼓励提前录取的考生尽早作出选择,也可将学校的招生名额适当放宽。由于提前录取和通过自主招生录取的名额相对较少,对大多数高校来说,“取”与“舍”的考生大致相当,所以教育资源浪费的现象应该不会很严重。

参考文献:

- [1]龚春燕.创新教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2]刘海峰.理性认识高考制度,稳步推进高考改革[J].中国高等教育,2013(7):27-31.
- [3]厉越.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政策与实践矛盾分析[J].教育与考试,2015(4):14-16.
- [4]边新灿.新一轮高考改革对中学教育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J].中国教育学刊,2015(7):16-21.
- [5]王桂亮,韩志亮,姚明华.中小学课程开发与创新精神培养[J].教育研究,2014(9):139-144.

(责任编辑 王伟宜)

光华大学自主招生的特点及其借鉴意义*

冯 寅

摘 要: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招生考试中,光华大学颇具特色:其以国家观念办学,注重考察学生的精神意志;坚持自主招生模式,大学自治与政府调控相结合,招生活动稳定;招生制度规范,招考严格,考目与通才培养学程相对应;但也存在私立大学学费偏高,影响报考。以光华大学自主招生为例,分析其招考理念、模式、制度及收费情况,以历史经验加深对高校招生考试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当今高校招生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光华大学;自主招生;招生考试

中国近代私立大学培养了大量近现代社会精英,招生考试是其办学起点与培养人才的基本环节。^[1]在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招生考试中,光华大学办学26载始终坚持自主招生,颇具特色。招生理念上,光华大学因师生爱国而创校,注重考察学生的国家观念。招生模式上,光华大学以国家政策为导向,以大学自治为基础,持续稳定的自主招考活动。招生制度上,光华大学制定了较为规范的大学章程与招生简章,有法可依,招考严格。光华大学自主招生为其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产生了广泛的教育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光华大学自主招生的理念、模式、制度、收费情况、影响与启示,为当今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一、招生理念:光我中华,培养救国人才

招收爱国学生、培养救国人才是光华办学的基本理念。“光华大学之成立,厥为国民自觉之曙光,亦曰国耻纪念之实录。”^[2]1925年6月3日,因纪念“五

卅惨案”与校长卜舛济产生冲突,圣约翰大学及附中553名中国学生和19位中国籍教师愤而出走,自办学校。^[3]光华大学及附中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正是出走师生的爱国观念创造了光华大学。张寿镛言:“一国教育,必有一国之历史与精神。历史者,祖宗传授之基业;精神者,子孙所以报答祖宗,而发挥光明其基业,以推暨于无穷者也。……光华之肇造也,其意义如此而已。”^[4]光华建校仓促,却将国人复兴中华的宏愿、反抗外敌的民族气节深植根基,体现在其各办学环节。光华刊登的第一封招生广告,即言明“以培养高尚人格,激发国家观念为主”的办学宗旨,招收大学文科理科上课各级及高中初中各级新生。^[5]光华创办伊始即将国家观念明确写进办学宗旨中,在民国大学中亦为罕见。

光华大学第一年生源分两类,一为出走圣约翰的离校生,可直接入学;二为新招学生,须经入学试验。光华招生“广义罗致海内向学之士,狭义使约翰

作者简介:冯寅,四川成都人,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高等教育史(贵阳 550001)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招生考试研究”(项目编号:12JJD880017)之研究成果。

离校学生仍得聚集一堂无涣散之忧”。^[6]光华大学及附中首先须保证圣约翰离校学生的就读需求,其次招收外校学生,明确表示“学生先圣约翰大学中学离校学生收录余则斟酌留其他学校离校学生”。^[7]光华深厚的爱国基础使它得各校学生踊跃报名。光华创办一月后即开始面向社会招生,“前昨二日共接到三百五十余份报名者,大中两学各居半数^[8]”。月余时间,报考人数除圣约翰离校学生外有六百余人,导致入学试验因学生拥挤而更换考场。^[9]由于报名人数实在过多,三日后光华登报“紧要启事”:敝校附属中学报名者已逾六百五十余人,实苦难以兼容即日起停止中学部免试转学办法,无论何人必须经过入学考试,并以预缴保证金十元的方式确保入学,否则二次招考时领取新生递补。^[10]两月时间光华大学及附属中学共招新生一千余人^[11],大中两学各占约半。

光华注重考察学生之爱国精神。考生不仅要在考场上挥汗如雨地答题,笔试后继以口试,由教务主任按次接谈、籍以测验意志、联络感情。^[12]光华以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了解学生的国家观念与人生志向,作为录取的重要指标。在光华大学第一次开学典礼上,时任代理校长张寿镛致词勉励学生“静·勤·实”三字,并谓本校教育根本于国家观念,以“严公”二字为旨。^[13]可见,从建校招生到录取入学,国家观念是光华办学之主导,爱国精神是光华招生之考量。光华大学诞生于中华民族觉醒之时,以私立大学之姿,立兴学救国之志。

二、招生模式:以国家政策为导向,自主招考稳定

自主招生是中国近代私立大学的主要招生模式。私立大学较公立大学享有较大的自治空间,但在招生考试、课程设置、毕业考核等重要环节上,必须符合教育部政策规定。1927年国民党政权建立后,高等学校招收新生仍然以自主进行为主,但1932年起,教育部开始每年制定招生计划,限制大学文实平衡,1937年教育部开始直接参与实际招生,以数所国立大学联合招生考试、全国统一招生

考试调整学科比例,另对各学系招生名额进行限制,公私立专科以上院校一律照办。^[14]相对于国立、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受教育部政策约束较少,但办学关键环节须受政府调控监管。1939年起,教育部陆续下达各项针对私立大学招生的规定,如各校拟定招生名额及招生简章需要呈部审定;入学试验科目,应参照统一招生笔试科目编列;新生入学试验教育部得派员监试;将全部考生成绩列册,连同各科试题保部备审;入学试验卷必要时须教育部得随时抽阅等等。^[15]总体上,政府支持并鼓励民间力量办学,但政策环境从宽松逐渐收紧。

光华大学的招生政策体现了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光华成立于1925年,其发展正处于国民政府教育部频繁调整招考政策时期。光华大学数次修正大学章程,使其办学活动符合教育部对私立大学的管理,并接受教育部审查,积极申请立案。光华自行编撰的招生简章、制定招生计划和入学试题,其整体要求与教育部政策一致。光华大学招生简章规定的报考资格为:(甲)一年级头考生须在新式高级中学或其他相当程度之学校毕业;(乙)二、三年级插班生须在经本校认可之国内外大学得有一或二学年分者。报名要求一年级投考生必须提供高中毕业证书,二、三年级插班生须索取空白转学证书一纸自行填注,更须在转学证书后面粘有本人最近四寸半身照一张,均须请原肄业之学校校长或教务长签证,^[16]与国立大学、省立大学招生简章的报考资格规定并无差别。

以教育部宏观政策为导向的同时,光华大学亦体现了自主招生的规律性,以下从三方面分析。

其一,招生时间稳定。统计1925年至1949年光华大学刊登在申报(上海版)上的招生广告,其数量发布、时间分布呈现稳定且规律变化的特点。见表1。

由表1可知,1925年至1942年,光华大学在申报(上海版)刊登招生广告平均每年近36次,1926年高达65次,受战争影响1942年至1944年间光华内迁成都,没有在申报(上海版)上刊登广告。总体上,光华大学自主招生持续稳定。

表1 光华大学在申报(上海版)发布招生广告
次数统计(1925—1949)

年\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小计/ 年
1925							7	1				7	15
1926	14				5	9	5	18	5			9	65
1927	1	5				14	1	7					28
1928	7	2				6	0	11					26
1929	7	12				4	5						28
1930	5	5				5	10	11					36
1931	7					6	0	9					29
1932	11						5	2					18
1933							9	25	3				37
1935	1							5					6
1936						3	24	21	3				51
1937	12	4				9	19	9	7	2			62
1939	10	3				8	8	9	3				41
1940	7	4				7	11	12					41
1941	9	13				6	9	11	6				54
1942													
1943													
1944													
1945								5	7				12
1946	3	3					2	3	4				15
1947	3	3						4	8				18
1948		2						4	5				11
1949	2	6											8
小计/ 月	99	62			5	77	122	167	51	2	0	16	601

资料来源:据1925年至1949年申报(上海版)的光华大学招生史料整理。

从光华招生广告出现月份来看,1925年至1949年间广告刊登月份为1月、2月、5月、6月、7月、8月、9月、12月,其中广告数量最为密集的为寒假期间即1月、2月,分别为99次、62次,暑假期间即6月、7月、8月,分别为77次、122次、167次。光华招生广告一般早于招考日期两个多月见报,给予投考生充分时间备考,例如1927年6月9日刊登该年招生广告,考期则为8月24日、25日、26日。

其二、招生维持在100~150人,坚持小规模办学模式。光华大学1926年至1931年的申报(上海版)招生广告中,均明确了拟招生数,详情见表2。

表2 光华大学申报(上海版)招生广告
拟招生数额统计

年	月	拟招 一年 级生	招生广告内容
1926	5	120	文理工商各四十名,预科五十名,二三年级十名
1927	7	100	文理商共一百名
1928	6	100	文理商共一百名
1929	6	200	一年级与插班生二百名,男女兼收
1930	6	150	一年级一百五十名,二三年纪插班各五十
1931	6	150	一年级一百五十名,二三年纪插班各五十

资料来源:据1925年至1949年申报(上海版)的光华大学招生史料整理。

由表2知,从1926年起,光华每年一年级生学额控制在100~150名左右,1929年将一年级与二、三年级插班生合计为200人,但插班生一般设置在各年级50人。光华大学从创办到解放后院校调整为止26年,先后入校学生达14000余人,^[17]光华大学部学生规模基本上一直维持在400~500余人,以小规模办学形式运作。

其三、生源保障:中高等教育自成系统,输送优质人才。光华以大学、附中同时办学,迅速具备了成形的中高等教育系统,附属中学为大学输送了一定数量的优质生源。1925年创校之际,光华即以“先办文理商法四科他科容后续办,中学除维持约翰中学各班外,男加初级中学”,^[18]中高等教育同时开始。光华招生均以“光华大学暨附属中学招生广告”的形式登报,大学、附属中学一起招生。光华初中、高中、大学三级升学系统建构有利于形成稳定的内部生源,见表3。

光华附中学生总数保持在六百人至七百人左右。^[19]经廖世承苦心经营,光华附中成为“设备完善、办事认真、成绩斐然”的甲级中学,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9所优良中学之一,^[20]渐与上海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并驾齐驱。1934年附中高中毕业生,参加上海市教育局会考者高中十二人,核准毕业生十人,补习一二科者二人,本校会考平均分数列第二名。^[21]出

表3 光华附中与光华大学招生规模对比

时间	附属中学招生数	大学招生数
1926年	80(初一)	120(一年级)
	30(高三以下各级)	20(插班生)
1927年	100(初一)	100(一年级)
1928年	120(初一)	100(一年级)
	80(高一)	
1929年	200	200
	(初中高中两级)	(一年生与插班生)
1930年	40(初一)	150(一年级)
	80(插班生)	50(插班生)
	50(高一)	
	30(插班生)	
1931年	40(初一)	150(一年级)
	80(插班生)	50(插班生)
	80(高一)	
	30(插班生)	

资料来源:据1926年至1931年申报(上海版)光华大学暨附中招生广告史料整理。

自光华附中的学生,在投考时受各大学青睐有加。对光华大学来说,成绩审查(保送复试)也成为招收本校系统内部生源一种方式。

三、招生制度:章程规范完整,严格招考

光华大学的招生简章是完整的招生制度文件。光华大学招生简章共八方面,包括学额、资格、地点、考目、考期、报名、公布七项及附录。投考资格、学额前文已提不再赘述。考试地点一般都设置在本校举行。考期一般设置为两日,一年级投考生与二三年级插班生同时进行,具体日程见下表。

表4 光华大学入学考试安排

时间	对象		对象	
	一年级投考生		二、三年级插班生	
第一日	午前九时	英文	午前九时	英文
	午后一时	国文	午后一时	国文
	午前九时	算学		
第二日	午前十时半	社会常识	午后九时	入学试验
	午后一时	科学常识		

资料来源:光华大学招生简章(1931年)

由上表知,光华大学入学考试安排在制度基础上,又体现了针对不同考生的选拔模式及大学自身特色。第一日的英文、国文为面向一年级投考生、二、三年级插班生全体学生,属对学生共同知识和基础能力的考察。第二日一年级投考生的算学、社会常识、科学常识三门考目,不难看出光华通才培养的思想。针对二、三年级插班生的入学试验则由各院系主任或教授负责,自行选择口试或笔试的方式考察插班生的专业素养。考案在试验后三日内在申报揭晓。^[22]另外,招生制度完整性还体现在新生到校注册的规定上。光华大学规定“但凡录取新生均须按期到校注册,逾期后到校注册者须缴逾期注册费两元,自上课日起学生迟到者每日罚缴迟到费壹元,逾三星期而未经学校许可者即以退学论。”^[23]可见,从招生资格审定到考试流程、注册入校,光华大学体制完整,管理规范。

光华大学考试制度之严格令人称道。一旦发现学生考试作弊,即行除名。申报专撰“光华大学注重考试”一文,指出“光华大学规定每学期举行月考三次大考一次,……严格考试如查有舞弊者立即开除不予宽假,附中学生有因考试作弊已开出两名云。”^[24]招生考试与毕业考试分别是人才培养的入口与出口,考试制度严格与否关乎教育质量高低。以1931年为例,光华招生广告预计招收大一新生150名,插班生50名,放榜则实录大一新生94名,插班生2名。^[25]光华大学办学26载培养了14000余名学子,但获得学位证书的实际上只有2400余人。^[26]

办学卓有成效的的大学各有特色,但都注重考试,严把人才质量关。例如与光华大学齐名的大夏大学,创办27年,共培养了近20000名学生,其中毕业生6000余人。^[27]严格的考试管理造成学生高比例淘汰,但又为私立大学获得了社会地位与声誉。申报数次报道“光华大学新生考投之踊跃”,由此可见光华大学的社会影响力。

考试科目体现通才培养要求,与课程设置对应。光华大学由圣约翰离校师生创办,其办学模式仍受母体影响。圣约翰的自由教育传统与当时效仿美国大学办学模式影响了光华大学,注重培养通才。以下将一年级考试科目与考试目的进行整理,参见表5。

**表5 光华大学与圣约翰大学一年级
投考生考目对比**

光华大学考目	圣约翰大学考目
国文	国文(包括作文及中国史地)
英文	英文
算学	数学
社会常识: 政治经济中外史 地及一般社会的常识	科学: 分化学、物理、生物 三项, 投文理学院着任选一 项, 医学预科须两项及格,
科学常识: 试验生物理化等 科学常识	土木学院指定考物理, 必须 及格

资料来源:《光华大学招生简章》(1930年); 李立峰等编《上海高校招生考试发展史纲》,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由表5可知, 考目设置上, 光华大学与圣约翰大学既有共性, 又有不同。基于通才理念, 两校均以国文、英文、算学、科学知识为共同必考科目, 注重考察学生中西方文化基础和基本的计算能力。但光华大学与圣约翰相比, 其考目设置体现出强烈的本土特色和民族性。例如圣约翰非常重视英文, 其英文考试题量之大为各所大学之罕见, 但光华则不然。据于澄编撰的《大学投考指南》所示, 光华大学英文试验仅三道大题, 分别为句子分析(三长句)、英译中(英文短篇不超过150字)、小作文(200字左右, 该卷作文题为“China and Japan”)。^[28]另外圣约翰将中国史地纳入国文中一并考察, 但光华却分为国文和社会常识两科分别试验。即使是考察生物理化等科学知识, 光华大学的考题设计十分强调学生的爱国观念, 以下这道化学题就非常典型:

“a. 铝若忽然绝迹, 尚有其他金属可以替代者否? b. 目今国内尚无大规模硝酸厂, 若一但与邻国宣战, 有何办法?”^[29]

可以说, 光华大学考目设置与试题设计所体现出来的通才培养模式, 较之圣约翰大学更本土化、是以致力于选拔和培养爱国、救国、报国的中国人才。1929年, 经教育部批准立案, 光华大学正式开设文学院、理学院和商学院, 均为4年学制。其课程设置上以各院共同必修课程与各系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组成体系。参表6。

**表6 光华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
四年制课程设置**

学院	年级	
	一年级、二年级	三年级、四年级
文学院	各系必修课程	国文系、英文系、政治系、 教育系、历史系、社会系各 系必修课程、选修课程
理学院	各系必修课程	数理系、化学系、土木系各 系必修课程、选修课程
商学院	各系必修课程	经济系、会计系、银行系各 系必修课程、选修课程 在本院、他院的选修课程

资料来源: 私立光华大学章程(1936年)

由上表可知, 光华大学招生考试科目, 是为入学后的通识课程服务的。招生须测试的国文、英文、算学、社会常识、科学常识考察学生知识面的宽广性, 以适应各学院一二年级的共同必修课程。

四、入学费用: 以学养学, 收费高形成招生壁垒

高等教育精英化时期, 私立大学学费对普通家庭的学生来说是一道门槛。总体上,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学费至少是国立大学的两倍甚至更高。将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学费进行对比, 参表7。

**表7 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
学杂费对比**

学校	元/学期				
	学费	住宿 费	膳食 费	其他 费用	合计
交通大学 (1934年)	20	10	32	18.5	80.5
光华大学 (1931年)	50	另缴	40	28	118 (不含住 宿费)
圣约翰大学 (1935年)	75	30	35	7	147

资料来源: 陈明远著《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225页,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 《光华大学招生简章》(1936); 熊月之等著《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史》第441页《圣约翰大学一瞥》,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圣约翰大学因学费之高被称为贵族学校, 由上表可知, 光华大学学费较之圣约翰大学不遑多让。

本表统计的光华大学学杂费不包括住宿、实验费、讲义费,这些费用入校注册时还需在会计处另缴,否则科主任不签字。复旦、光华、大同、大夏既是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也是被公认的学费比较昂贵的大学。^[30]学费偏高的经济壁垒会客观淘汰掉部分优质生源,这是私立大学无法规避的经济现实。

私立大学办学经费来源以学生学费为主,即以学养学,所以学费居高不下。民国期间大部分私立大学都属于以学养学类型,如1931年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的学费收入占全校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2%,77.2%,83.3%。^[31]相对公立大学,私立大学获得的国家资助少得多,在获得国家资助的私立大学中,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的经费又为最少。参表8。

表8 民国24年部分私立专科以上高校资助情况

校别	教席费	设备费	总计
大同大学	4000	26402	30402
复旦大学	3360	10009	13369
光华大学	4000	6814	10814
大夏大学	4000	9369	13369
沪江大学	8000	10220	18220
燕京大学	16000	37475	53475
南开大学	8000	27254	35254
厦门大学	32000	49398	81389

资料来源:刘大佐《各项教育统计——二十四年度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教育杂志1937年27卷第3号第138页。

1935年末,教育杂志总共统计了33所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收到的政府资助,光华大学以4000元位教席经费资助倒数第五,以6814元位设备经费资助倒数第十一,以为10814元位总经费资助倒数第十四,同为上海私立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大同大学总资助均高于光华。从全国范围看,厦门大学以81389元为政府经费资助之最,超过光华大学近八倍。实际上,光华从办学伊始就资金紧缺,出走圣约翰的五百余名师生无地无银,建校全凭学生家长及社会人士的善意募捐。张寿镛追述创校曾言:“方其经营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及,借甲损乙,补屋牵

萝,托钵题缘,自忘愚痴。热诚者一呼便应,冷嘲者讥为多事。”^[32]

光华办学经费绝大部分须由学费支撑,家境清寒的学生因此经济负担较重。考得起的学生读不起,成为光华乃至私立大学招生的一大硬伤。周有光先生忆求学光华,付不出学费,后争取到张校长文书员一职勤工俭学,才解决难题。^[33]但学费过高始终是光华办学的主要矛盾之一。上海日据时期,光华大学内迁成都,经费更是日益紧张,唯有依赖收取学费。1943年物价飞涨,成都光华大学全体教师和主要职员开会讨论,议定每一学生应缴本学期的学杂费等一千元九百元,但公布后即遭到学生抗议,指谓“学费过巨”,抵制副校长谢霖,甚至还出现了“欢送谢霖先生离开光华,以娱晚年”的校内标语,几经波折,最后学杂费定为一千七百元,无法再降。^[34]收费高是私立大学不得已之选择,但确实对其招生甚至整个人才培养环节都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

五、教育影响与历史启示

光华大学办学二十六载,先后入校学生达14000余人,完成大学学业并获得学位者2400余人。乔石、姚依林、荣毅仁、叶圣陶、周而复、田间、赵家璧、黄鼎成、陈遽恒、尉健行、谢云晖、杨纪珂、张芝联、董寅初和胡适等都曾在光华大学或附中学习或工作过。^[35]除此之外,中国现代文学家穆时英和予且、政论家储安平、社会活动家张承宗、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教育学家朱有瓛以及藏学家柳陞祺等也都出自光华大学。^[36]光华大学富有特色的自主招生,提高了生源质量,为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透过光华招生的理念精神、运行模式及制度特点,总结经验,能够加深对高校招生考试的认识,以其历史发展规律启发当今高校招生考试改革。

其一,招生考试活动应体现大学特色与办学志向。回顾光华大学办学历史,其大学特色与办学志向从招生考试即有体现。光华以“吾国为独立自主之国,教育之事本不应仰人鼻息”^[37]之志办学。其招生注重考察学生的情感意志,以考试信誉制培养学生品行;环境艰难亦坚持稳定招生,上海日据时期化整为零,沪蓉两地薪火相传。上述招生考试活动,正体现出“观国之光远有耀,重任在吾躬,中华民气原

俊伟,奋起自为雄”^[38]的光华精神,令人动容。当前,我国推进“双一流”建设进程中,大学在目标上应遵循“无志之校常立志,有志之校立长志”^[39]的准则,志存高远,方竞风流。

其二,在大学自治基础上,应保持与国家宏观政策一致,完善招生制度。光华大学招生制度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归功于其制定的详细规章制度。规范的制度条例,使办学者有章可循、避免朝令夕改,也有利于考生自主选择,增强招生选拔公信力。^[40]另外,光华大学依据教育部政策指导数次修订章程,积极配合审查,严格制定招考标准,保障生源质量。当前,民办学校作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应遵守本校章程规范招生,更应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体现教育面向社会全体的公益性原则。

其三,构建中高等教育升学体系,形成生源基础,共享教育资源。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早已进入大众化阶段,民办高校生源竞争激烈。在高等教育高度精英化的民国时期,上海私立大学为数众多,生源竞争较之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光华构建中学到大学的升学体系,形成生源基础,值得借鉴。光华从建校开始即中学、大学同步招生,在校学生最多时曾达1700余人,其中大学800余人,高初中900余人。至1938年,毕业大学生1118人,高中生1026人,初中生509人,共计2653人。^[42]光华附中为光华大学输送了优秀生源,光华大学通过多元招生方式录取附中学生。本校中高等教育体系有利于共享教育资源,尤其是师资。例如廖世承先后任光华大学副校长、教育系主任和附中主任,朱有燮先是光华大学教师,又在光华附中执教公民教育。中学大学共享优秀师资有效地培养了学生对于光华的文化认同感,促进了本校升学率。光华从附中到大学的良性互动升学机制,有利于形成高质量的本校生源。这种做法对今天的中国民办高校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其四,鼓励民办教育捐资办学,应以多种奖助降低学生入学成本。大学学费不仅与学生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更是涉及教育公平和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特定历史条件造成光华大学学费高昂,尽管艰难,张寿镛校长仍竭尽所能进行社会筹资,减轻学生经济负担。较于公立学校,民办高校所获国家资助

有限,以学养学是民办教育的普遍模式,但同时亦应积极采取多渠道从社会吸纳经费,并设置多种奖助学金资助学生。

在中国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时代,自主招生改革既是高考制度改革的过渡,也是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转折。回顾光华大学自主招生的理念、模式、制度以及学费情况,既体现了中国近代私立大学的历史特点,又反映了高校人才选拔的共性规律,对当前中国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张亚群.私立时期厦门大学招生透视[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5):5-10.
- [2][37]张寿镛.私立光华大学成立记[Z].私立光华大学章程,1936:1.
- [3][17][26][35]袁运开,王铁仙.华东师范大学校史:1951-2001[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62,371;371,371.
- [4]吴雯.百年大计,根在树人——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的办学之道[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4):82-88.
- [5]光华大学暨附属中学招生广告[N].申报(上海版),1925-07-07.
- [6][10]光华大学起始募捐[N].申报(上海版),1925-08-08.
- [7][18]光华大学筹备之进行[N].申报(上海版),1925-07-04.
- [8]进行中之光华大学[N].申报(上海版),1925-07-08.
- [9][12]光华大学今日试验新生[N].申报(上海版),1925-07-28.
- [11]光华大学筹备开学[N].申报(上海版),1925-09-03.
- [13]光华大学开学典礼记[N].申报(上海版),1925-09-13.
- [14][15]杨学为.中国考试通史(卷4民国)[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17-322,200.
- [16][22][23]光华大学招生简章(1930年)[Z].
- [19][21]附中消息[J].光华大学半月刊,1934(6):67-68.
- [20]谢长法,张丽萍.战前廖世承的中学教育思想[J].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3):55-58.
- [24]光华大学注重考试[N].申报(上海版),1928-01-18.
- [25]光华大学暨附中录取新生揭晓[N].申报(上海版),1931-09-04.

[27]柯英兰.私立大夏大学办学特色与历史地位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2010.

[28][29]于澄.大学投考指南[M].出版地不详:实学研究社,1946:38-39(英语之部);27(化学之部).

[30]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223.

[31]宋秋蓉.20世纪上半叶中国私立大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J].高等教育研究,2006(11):98-105.

[32]张寿镛.约园著作选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5.240.

[33]周有光.百岁新稿(修订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84.

[34]张钦楠,朱宗正.张寿镛与光华大学[M].2010.234-235.

[36]李力.光华大学校园文化研究[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3(4):38-47,121.

[38]李子迟.大学史记:近代中国的那些大学[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0.253.

[39]张亚群.志存高远谋新篇——由校庆所想起的[Z].2016-04-06.

[40]张亚群.私立时期厦门大学招生透视[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5):5-10.

[41]李雪,张刚.沪上风云 双碧辉映——大夏大学、光华大学[J].科学中国人,2009(4):30-37.

(责任编辑 王伟宜)

民国时期私立复旦大学招生考试特点探析*

李雪梅

摘要:民国时期,各知名大学在自主招生考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上海的几所大学自主招生考试时间最长。本文以民国时期私立复旦大学为例来进行探讨,分析了其招生考试的几大特点:严格把控学生质量及招生类型的多样化以获得优质的学生资源;实行春秋两季考试及设置多处考点以实现人性化招生;考试科目设置的多样性;举办暑期学校以拓展优异的学生资源;招收女学生以保障男女受教育权的平等。

关键词:民国时期;复旦大学;招生考试

1917年复旦公学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下设文、理、商三科以及预科和中学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内迁重庆北碚,并于1941年改为“国立”。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私立复旦大学时期实行的自主招生考试制度。在私立复旦大学时期,大学在选拔人才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自主招生考试制度也在逐步地完善。复旦大学能够招收并培养出像陈寅恪、罗家伦、徐悲鸿等大家,其招生考试实在是功不可没。笔者有意将民国时期私立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特点进行分析,从而为当今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提供借鉴。

一、严格把控学生质量及招生类型的多样化以获取优质的学生资源

民国时期,由于各地中学教育水平的不一致,大学在招收学生的标准上也很难达成一致,招收的学生质量着实令人堪忧。然而,从复旦大学历年的招生简章我们可以看出,复旦大学始终秉持着严格招生的理念,以“招精英型人才,办精英型大学”为准则。譬如,1918年的招生简章中提出:程度备馆及中

学二三四年级、大预科文科理科商科、大学本科文科一年级均可插班。^①在1920年的招生简章中记载:程度中学备馆均可插班大学预科文理商三科,一二年级须有卒業毕业证或有相当学校转学证书方可投考。^②同时,在1920年复旦大学章程中,关于入学程度有了更加详细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凡欲入大学本科者,需具有与本校大学预科毕业相当程度,欲入大学预科者,必须具有中学卒業程度。且于下列各科,实验及格始得录取。英文:(甲)文学,下列诸书或其他程度相等之书,至少须读过一种,有本校考验,须于其文章体裁确有所心得,始得及格。Vicar of Wakefield,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Ivanhoe, Tales of a Traveller。(乙)作文,试验作文一篇,以词句通顺,缀字无讹者合格。历史:须略具世界史知识。算学:须曾习过平面,立体几何及平面三角。^③而在1921年,招生考试章程愈加严格,提出:(1)大学预科文理商三科,一二年级必须有中学畢業文凭并有相当学校转学证书;(2)中学一二三四年级及特别商科,凡投考四年级及特别商科者,应有相当

作者简介:李雪梅,山东潍坊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高等教育史(厦门 361005)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招生考试研究”(项目编号:12JJD880017)研究成果。

学校转学证书毕业文凭;(3)备馆须曾习英文至少一年,算学过命分小数。^[4]在1922年,又加上一条:预备科须国文顺通英文,略有门径算术,有高校毕业程度者。^[5]事实上,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内外忧患的局势已经给大学的招生带来了不少的困难,许多大学也因此难以为继,遂降低招生考试标准以扩充生源。然而,私立复旦大学不但没有降低招生标准,反而始终保持着录取精英式人才的招生原则,这是私立复旦大学能够培育出大师的重要保证。从1918年至1922年的招生简章中,我们不难看出,复旦大学对于招收的学生要求是逐渐增多的,并且招收的学生质量也在一步步的提升。

此外,从私立复旦大学的招生简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招收的学生也存在着多样化的特点:不仅招收本科一年级的正式生,也招收插班生和特别生。譬如,1920年复旦大学章程中规定:凡携有本校所承认之著名大学颁给所读各科目分数单,本校可按其程度酌量插班。并且,对于插班生的投考做出了详细地规定:凡报名投考插班诸生欲指定入何年级者,须将前一年级各科学一律试验合格,方准入指定之级;插班诸生除英文、算学二科不准补考外,其余学科有考不及格,或素未肄习者,其数若在两种以下,得暂时插入制定班内,惟须于学年终补考及格,始得正式加入该班。^[6]1923年,复旦大学自主招生简章中规定:大学部文理商三科一年级新生须有中学毕业文凭,二年级以上插班生必须有相当学校转业证书。^[7]1930年2月间,复旦大学寒假第一次招收新生121人,第二次28人,特别生59人。注册总人数901人。招生委员会决定,本学期所收特别生必须经过入学试验,方能转为正式生。^[8]民国时期私立复旦大学招生的多样化为学校招收了大批优秀的学生,同时,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始终秉持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坚守招生的质量底线,逐步提高招生的标准,从而为大学培养了一大批的著名学者,也为其积攒了良好的声誉。然而在当今时代,许多大学自主招生的质量没有得到很好的把关,招收的学生质量也在逐步下降,这着实得使我们进行深刻反思。事实上,在大学的自主招生之中,“招生”是很重要的问题,如何制定招生的标准,如何保证招收的学生质量等,这

都是进行自主招生考试的大学生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实行春秋两季考试及设置多处考点以实现人性化招生

民国时期,多数私立大学实行春秋两季招生考试,私立复旦大学亦如此。例如,复旦大学在1920年2月11日至6日的招生简章中提到:试期三月九号至十一号(均上午九时由校中备有午膳)连试三日。^[9]1920年8月13日至29日的招生简章中提及考试日期为:考期八月三十号至九月一号(均上午九时有校中备有午膳)连试三日。^[10]实行春秋两季招生的优点之一即可以根据社会的需求来及时调节招生科目,变更人才培养方案。例如,在1920年春季招生第三日提出考试科目为:外国历史地理、商业地理、商业史、文学史、社会学、修辞学、德文或法文等科。^[11]而在1920年秋季招生科目变为:外国历史地理、商业地理、生理学、化学、修辞学、德文或法文等科。^[12]从其变更的科目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动荡,内忧外患,理学、医学类以及化学等化工类是社会所亟需的,所以考试科目有所增多,而文学史等文学类科目有所缩减,这是适应当时社会大环境的需要所做出地调整。实行春秋两季招生考试另一优点则是通过两次考试,有利于消除“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从而为更多的人提供充裕的复习时间。这充分体现了考试的公平性,从而为多数人实现了大学梦。从1920年到1936年这16年间,复旦大学在春秋两季招生的学生数量是不断增多的,为大多数人提供了进入大学的机会,从而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的优秀人才。譬如,在1920年记载,春季注册人数161人,其中正科文科19人,正科商科16人,预科文科52人,预科理科10人,预科商科64人。秋季注册人数205人,其中正科文科18人,正科商科43人,预科文科42人,预科理科17人,预科商科85人。^[13]而到了1936年间,春季注册人数1472人,其中文学院264人,理学院310人,法学院388人,商学院510人。秋季注册人数1510人,其中文学院288人,理学院351人,法学院367人,商学院504人。^[14]在这十六年间,注册人数从1920年春季的161人增加到了1936年的1472人,增加了约10倍,这不得不说是复旦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的一大进步。在招收的如此多的学生数量的同时,招生考试的标准却并没有

随之下降,从而为当时社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民国时期,大学尤其是知名大学几乎都建立在东部地区,以北京、上海、南京最多。而经济的拮据,交通的不便阻断了大多数人进入知名大学的机会。教育部第十届教育会联合会议建议案中提到:国立专门以上学校今年录取新生,有数省额数极少或竟无人者,在学校亦一有此觉悟,复假交通便利之区招考新生,而所有录取新生几全为交通便利地方之学生,查国立学校原为造全国人才而设……今所取学生多偏一隅,已非国家设立学校之本旨。^[15]而民国二十九年度提出统一招生目的:减轻学生因投考大学而往返奔走于各地之困难以及因此而所受之经济损失。民国二十九年度统一招生考试办法:招考区更为普遍,二十七年度分十二处,二十八年度分十五区及十三分处,二十九年度设十六区十八分处。^[16]在此时期,复旦大学也在各处设立招考点,不仅解决了一部分因处偏远地区交通不便而无法考试困境,更吸引了大批优秀学生报考复旦大学。由此,复旦大学不仅招收了一大批优秀的学子,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

三、考试科目设置的多样性

民国是一个社会动荡、国家战乱的时期,多样化的人才才是国家所亟需的。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人才必须通过大学的培养来实现,大学招收各专业人才则是实现多样化人才培养的保障。据民国二十六年以前专科以上学校历年招生概况所记载:专科以上学校招收新生,向来各自办理,二十年度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文、法、商、教育、艺术等科学生占百分之七十,而理、工、农、医等科学生仅占百分之三十,甚失均衡,尤其九一八事变以后,外辱日亟,非造就多数使用科学人才,不足以用非常环境及各种建设之需要。^[17]二十二年五月,教育部颁发二十二年度各大学及独立学院招生办法,纠正文、法科教育畸形之发展,规定各大学兼顾甲类(包括文、法、商、教育、艺术)学院及乙类(包括理、工、农、医)学院者,如甲类学院所设学系与乙类学院所设学系数目不同,则任何甲类学院各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之平均数,不得超过任何乙类学院所招新生及转学生之平均数。^[18]譬如,

在1920年复旦大学发布的招生考试科目为:第一日试国文,英文;第二日试数学、物理、簿记、商算、商法、经济学理论;第三日试外国历史地理、商业地理、商业史、文学史、社会学、修辞学、德文或法文等科。^[19]而在1921年的招生考试中规定:第一日试国文,英文;第二日试数学、物理、簿记、商算、商法、经济学理论;第三日试外国历史地理、商业地理、商业史、文学史、社会学、修辞学、德文或法文等科。^[20]比较两个不同时段的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出,第二次的考试增加了生理学以及化学的考试,削减了文学史、社会学等文学系的科目。从此处看来,复旦大学招生考试在应对教育部提出的要求,应对社会变化,在培养亟需人才的同时,将考试科目逐渐增加,并且注意增加理工农医的比例,这就为社会的变革培养了一大批的优秀人才。

同时,从复旦大学1939年的毕业学科人数之中,可以看出学校招生的科目侧重于理法商科。据1939年间记载,春季毕业人数75人,其中文学院13人,理学院13人,法学院23人,商学院26人。秋季毕业生人数122人,其中文学院11人,理学院30人,法学院37人,商学院44人。^[21]就当时的大学来看,大学设置的科目大多数是偏文学性的科目,招收的学生也是趋向于报考文学、历史学等,这与当时国家抵御来侵略,国家的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是极不相符的。而当时复旦大学应国家的需求改革应试科目,改革人才培养的方向,这是复旦大学招生考试的要求与社会需要多样化的人才目标的重合。这体现了大学对于培养社会人才的重要性,招生考试对于招收多样化的人才的重要性,大学培养多样化的实用人才的重要性。因此,当今的高校自主招生考试中,学校对于招收的学生应该持有培养多样化发展的人才观,应该秉持着培养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的人才观。

四、举办暑期学校以拓展优异的学生资源

民国时期的大学招生考试,不仅仅是通过春秋两季的考试来招收优秀的学生,并且还以一种新的形式来拓展优质生源,即通过举办夏令营来挖掘“精英”。例如,民国十年春季岭南大学发布招生规则,其中提出:“有心投考各生,以先入本校夏令营修业一月为宜,既得一月之练习,考试合格,九月开学时

有线收录”。^[22]而复旦大学在暑期举办的暑期学校就与夏令营有相同的性质。复旦大学在1927年暑期学校招生的条例中写到:本大学设暑期学校以利用暑期光阴推广教育辅助学业为宗旨,凡于下列资格之一者无论男女皆可报名入学。(甲)本大学学生(乙)国内各大学学生(丙)大学预科学生(丁)高级中学毕业生,暑期学校所授科目皆得本大学承认。^[23]1934年7月9日,暑校开课。本届暑校共计开设课程35门,注册学生500人。任课教师有洪深(戏剧编撰与演出),应成一(社会问题),金通尹(河工学),王云瞻(木桥规划),徐人级(人类生物学、卫生学),陈维稷(实用化学),沈梦占(化学计算)等。^[24]虽然复旦大学暑期学校的目的是推广教育以辅助学业,但在招生的学生之中,加入了大学预科生以及高级中学毕业生。这部分学生可利用暑期时间,通过在校学习复旦大学的课程,与复旦大学的同学、老师交往,既可以收获知识,又可以了解到大学的学习课程走向,从而更有利于他们考取复旦大学。同时,可以看出,复旦大学在收取暑期学校的学生有所限制,如规定招收的暑期学生只能是大学预科生和高级中学毕业的学生。所以,在复旦大学暑期学校招收的学生中,其基础学业的完成是基本条件,并且在此基础上选拔更加优秀的学生,以保障优质的学生资源。

梅贻琦先生在《大学招生评论》中写道:“吾国实行新教育以来,学校就随带的负起两种任务。一面要使教育普遍化,给一切有识之士修学的机会;一面又要审慎选择,务使入学的都是可造之才。只就大学而论,全国大学数十处,每处每年都办招生。其目的不外选材拔士,在许多中学毕业生当中,就其体格,操行,志趣,知识,挑选若干有希望可造就的青年授以高等教育,而望其对于学业事功,有所成就。”^[25]复旦大学的招生考试不只是注重学生考试成绩,而是通过每年的春秋两季以及暑期学校的学习,教师考察学生的学习,操行以及志趣,体格,为复旦大学招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复旦大学举办的暑期学校也就成为拓展优质生源的有效途径。

五、招收女学生以保障男女受教育权的平等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女子们一直处在社

会的最底层,传统的封建礼教将她们牢牢地束缚在了深闺之中,女子的受教育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女生进入学校学习更是无稽之谈。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的独立自由、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渐影响到了中国的女性,她们所受到的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压迫的怨念,经由西方男女平等等的思想的激发,找到了争取自由的突破口,许多妇女认识到“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一大批女子冲出了封建家庭的束缚,进入学堂学习。民国时期虽有一批女性可以进入大学,但只能进入女子学校,而综合性的知名大学几乎不收女学生。然而,复旦大学自1927年暑期学校开始招收女学生,实现男女同校。譬如,1927年5月18日复旦大学暑期学校招生简章中规定:本大学设暑期学校以利用暑期光阴推广教育辅助学业为宗旨,凡与下列资格之一者那女皆可报名入学。^[26]在1929年,复旦大学首次在报纸上刊登复旦大学招收女学生的广告。1929年9月间,复旦大学首招女生,其中文科熊至兰等17人,理工科李韵茵等5人,商科严幼韵等7人,生物科宋德芳等4人,社会科学茅以滇等16人,中国文学科陈英等8人,预科王汝琪等25人,特别生王石家等21人。总计103人。^[27]同时,1933年复旦大学招生简章中写到:文学院、史学系、社会学系、理学院、生物学系、化学系、土木工程学系、法学院法律学系、商学院国际贸易学系一年级男女新生及各级插班生即日起至九月十二日每日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在本大学注册处(考试)。^[28]以上招生中,可以看出女性不仅可以和男生一样到知名大学学习,而且选择的专业亦不再受到诸多限制。在民国初期,女性多数职能选择师范类等人文学科,而其他理工科,鲜有招收女生的信息。而在复旦大学的招生考试信息中,女性可选择的科目扩展到了化学系,土木工程学系等男生“扎堆”的科系之中,这着实体现出了男女生教育的平等性。虽然在今后的应考男女生的比例差别很大,譬如,在十二个区应考之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九人中,男性为九千零八十一人,占百分之八一·六七。女性为二千零三十八人,占百分之一八·三三。^[29]但不得不说,高等院校尤其是像复旦大学这样的知名大学,招收女学生,实现男女同校,在当时看来,实属不易。大学不仅是培育学生知识,更是

肩负社会责任的地方。国家若想实现社会平等,则应以男女平等为起点;若想实现男女平等,则应力求男女间教育的平等,而大学正是实现男女教育平等的重要场所。在当今的大学自主招生中,虽然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但权利的滥用也成了自主招生考试的弊病,应不应该取消高效的招生自主权亦成了热点问题,所以在当今的大学自主招生考试中,保证招生的公平性才是保证其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通过探究民国时期私立复旦大学招生考试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复旦大学在招生考试方面一直在进行有益地探索,招生简章也在一步步完善。严格把控学生质量及招生类型的多样化以获得优质的学生资源;实行春秋两季考试及设置多处考点以实现人性化招生;考试科目设置的多样性;举办暑期学校以拓展优异的学生资源;招收女学生以保障男女受教育权的平等的特点正是复旦大学能够在民国动荡的年代始终保持着“精英大学”的头衔,私立复旦大学的招生考试特点值得当今大学借鉴。

参考文献:

- [1]复旦大学招生考试广告[N].申报,1918-1-11.
[2][9][10][11][12][19]复旦大学招生考试广告[N].申报,1920-2-11.
[3][6]复旦大学章程[G].《复旦大学百年志》编纂委员会编.复旦大学百年志(1905-2005)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9:48.

- [4][20]复旦大学招生考试广告[N].申报,1921-12-25.
[5]复旦大学招生考试广告[N].申报,1922-6-9.
[7]复旦大学招生考试广告[N].申报,1923-1-8.
[8][13][14][21][24][27]复旦大学百年记事第一编[G].《复旦大学百年记事》编纂委员会编.复旦大学百年记事(1905-200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9.
[15]教育部第十届教育会联合会议建议案[G].杨学为.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七卷(民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3.
[16]三十一学年度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招生考试办法[G].杨学为.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七卷(民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74.
[17][18]专科以上学校历年招生概况(节录)二十六年以前[G].杨学为.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七卷(民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96.
[22]岭南大学简章[J].岭南季刊,1921(1):25.
[23][26]复旦大学招生考试广告[N].申报,1927-5-18.
[25]梅贻琦.大学招生评议[G].杨学为.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七卷(民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7.
[28]复旦大学招生考试广告[N].申报,1933-9-7.
[29]教育部二十七年度国立各学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报告(1938年)[G].杨学为.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七卷(民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14.

(责任编辑 王伟宜)

● 科举学丛谈

科举文学与主体性的制造： 八股文里瞥见的“吾”和“自己”

[美]戴沙迪

摘要：本文重审科举制度与文学主体性在明末清初的复杂关系。制艺虽然通常被认为缺乏创作力，八股文里复制与个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微妙的多层认同结构。从形式角度来看，“吾”、“我”、“自己”之类代词的用法都暗示着晚明文学个性创造的重要前提。在匿名评价制度下，意识形态复制功能还有反面：审美性的区分。个人独特性的概念是科举系统管理的基本原则与信条。因此，科举制度成为独特的文化空间，促使文人充分地考虑作者权力、创造力问题。晚明文学里的“个性”不是自然而然生出来的，而是一种文化制造品，被利用最先进“文学技术”——包括八股文的多层性认同结构——的作者创作的。

关键词：八股文；科举；文学主体性；认同结构

一提到明末小品文、戏曲和小说，就容易联想到“奇”、“趣”、“才子”之类具有非常明显个性色彩的一系列词语。最近三十年来，众多学者不断地考虑晚明文化生产中的个人主体性与近代欧洲类似现象的相同之处，尤其对小说进行仔细的研究。在近代欧洲文化史这个学术领域，资本主义的出现及其发展成为主要社会背景，在个人主体性嬗变的历史戏剧里扮演主角。而中国明清两代除了市场经济以外，还有另一种对文化生产极其重要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虽然跟普通“资本”是间接关系，但是难以否认它成为“文化资本”的主要来源与坚实基础，跟文化生产的关系既直接又密切。

科举制度的影响不限制于平庸的考生，还延伸到著名的“文化英雄”；例子多不胜数，只举三个。李贽可以算是晚明个性最强的思想家之一，激烈地批评当时社会的“以假人言假言”，但在文学方面他断

言：《西厢记》、《水浒传》，“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①汤显祖被称为是“中国的莎士比亚”，主张非常浪漫的“情”的理念，不过早在其戏曲受到读者欢迎之前，他就被誉为明代八股文八大家之一。^②董其昌是明末有突出创作力的画家、书法家，也曾经当过科举考官，写了一本具有广泛影响的考生专用时文写作指南——《华亭九字诀》。^③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般士人非关心制艺不可，很容易理解。但是为什么恰好是这些非比寻常的奇才表示出此等热忱？本文以这种具有极强个性却关心场屋之业的“矛盾”现象成为起点进行探讨，重审科举制度与文学主体性、创作力在明末清初的复杂关系。此研究尚在初步阶段，主要根据是一些对八股文的细读，今天在此抛砖引玉。

制艺通常被认为缺乏个性、专门用于意识形态的复制的文类。其实，“代人言”的概念以外还有“断作”的文学技术；观察八股文的代词用法就会发现个

作者简介：戴沙迪(Alexander Des Forges)，男，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与文学、比较文学 (波士顿 MA0425-3393)

性与复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产生微妙的文章与多层的主体性。“吾”在科举卷子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表示第一人称，还体现一种富有想象认同并批判反省力的发言者。可惜的是这种人称只能观察，很少采取具体措施。^①“自己”则不然，时常表现出一种能自然而然行动、具有自信心的性格。“自己”很少呈现出“吾”那样委婉的主体反省与谨慎的道德衡量，他反而假设一种既坚定又隐藏的“私心”。^④无论是“吾”的认同动态还是“自己”的内在真实，两个代词从不同角度都暗示着晚明文学个性创造的重要前提。

首先不妨讲一下“吾”为认同象征的“可移性”：在八股文里，到底何人在发言有时难以确定。例如茅坤(1512-1601)，《乡人饮酒》的起股、过节：

杖者未出，而我或先之，君子以为亢矣。

杖者既楚，而我或后之，君子以为命矣。

唯孔子则不然，不敢群少长相为宴言而已也必也；周还于俎豆之间，时其起居而不离，亦不敢唯酒食相为征逐而已也必矣。俯仰于几席之际，时其动静不违。

因为“代言”的习惯，读者很可能本来以为讲话的“我”是孔子，遇到过节部分直接用“孔子”来指示圣人，这时才发现讲话的“我”也很可能指的是作者自己。如此突然的转变当然也可以派上很实际的用场：正在打瞌睡的考官至此也许会大吃一惊而醒起来。可是这个修辞方法的意义远远超过工具性的动机，让我们读者意识到八股文里第一人称认同的多层性和暂定性。

尽管很可能让读者感到困惑，但茅坤这篇文章幸好把转变放在起股和过节之间——文本过渡性的一部分。王阳明的《志士仁人》则不然，在仅仅承题的一个句子里就把“吾”所指的人好像从叙事者变到“志士仁人”本身。

夫志士仁人皆有心定主而不惑于私者也，以是人而当死生之际，吾惟见其求无憾于心焉耳，而于吾身何恤乎？

句子最后一部分提到的“吾身”无疑指的是志士仁人之身(叙事者的身体何险之有?)，可是前面的“吾”却是叙事者，句子的前一部分都用第三人称来

指示志士仁人。

顾宪成的《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里“吾”和“我”都用，逻辑一样，但多层性更强。

孟子曰：所贵乎交邻者无他，势在我则忘之而已矣，势在人则顺之而已矣。王欲闻其道乎？臣试言其概，而王择焉。夫天下之人国多矣，有以大国而邻我者焉，有以小国而邻我者焉。

大奚以交于小也？其道则仁者得之。仁者曰：吾于小国邻而忿焉与小国较，将以树威结怨则可矣，若欲照德而怀贰，则计之左者也。是故其事之也，以为宁使天下议我以怯，而有不恭之加，毋宁使天下议我为暴，而有不靖之患也。古之行此道者，吾得二人焉：汤也事葛矣，文王也事昆夷矣。

在这一段文章里，第一人称所指示的人物不断地改变：

* 首先，孟子用“我”代人立言，以自己的想象力来从齐宣王的角度看情况

* 然后，孟子设想“仁者”会怎么说，“吾”在这一部分是指示仁者的第一人称

* 下一句子一开始就转变，用第三人称(“其”)指示仁者

* 然后，同一个句子的下一部分又转回来，用“我”指示仁者

* 到最后一个句子，孟子终于利用“吾”从自己的立场讲自己的话

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第一人称的用法像流行歌曲的主旋律那样简单；在不少时文，第一人称的用法反而可以像巴赫变奏一样复杂，而顾宪成更是像毫无主旋律似的变奏。

这种写作方式是不是在科举文学里少见？当然，不是每一个考生都想这样发挥。可是早在成化年间，难以确定的多层性“吾”已经出现在王鏊的著作《百姓足，君孰与不足?》里：

吾知

藏诸閭閻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

蓄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廩，而后为吾有也。

这两行的最后一个“吾”都应该指的哀公，但是

句子前一部分提到哀公的时候都用“君”。不仅如此,首先出现的“吾”应该算是有若在讲话,而不是哀公。这个例子很特别:因为这不仅很早,比明末的作者还要早一百年,而且是科举文学史上非常有影响的典型作品。

认同在这些例子里不是超越时间的定量或本质,而是富于时间性的过程。在短短的一个句子或者一段文里,作者通过自己想象力的发挥来同情另一个人,从他的角度来看世界,从他的口里说出话来。

我们通常把“吾”看成代名词而已。然而代名词在“代人言”的话语中施展,使得原来的语法功能为心理学功能所补充,变成一种认同结构(structure of identification),一种想象框架。这种认同结构所供养的心力贯注不仅有单向性的流动,它还可以呈现双向性的交换。“代圣贤立言”从来都不是仅仅重复圣贤所讲的话,而是利用自己的想象力进行推想:圣贤在某种情况下会说什么?除了经典里传下来的话以外,圣贤还会说什么?如此替别人“代言”到底是模仿他们,还是冒充他们?明末以来,不少批评时尚文风的人强调“冒充”方面,例如焦循愤怒地说:“至庄老释氏之旨,文人藻绘之习,无不可入之。第借圣贤之口以出之耳。”^[5]董其昌对此权力问题极其敏锐,从另一个角度作了稍微不同的结论:“凡作文,原是虚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牵由人,非执定死煞者也。”^[6]

在八股文里出现的圣贤是偶像还是傀儡?八股文的作者是奴才还是抽牵人?其实,对这种问题作出定论并不是我的目的。我还是想强调科举制度是如何成为独特的文化空间,允许明代中期以来的文人热烈地辩论这些问题。这场辩论实际上是作者权力概念与创造力概念的肥沃土壤。

“吾”和“我”往往暗示一种观察的态度跟渴望及反省的心理结合在一起,所说所做的都是有意的。八股文里的“己”和他的所有自然而然的行为缺乏那种多层性的“意”(intentionality)与它联系的复杂主体/客体关系,反而强调个人的“志”。譬如钱禧(1625进士)的《匹夫不可夺志也》(值得指出的是,这篇八股文毫无“代人言”的迹象):

惟在己者之足恃,故匹夫能胜乎三军也。盖匹夫虽渺,其志则其所自有也,虽欲夺之谁得而夺之?

现代汉语常用的“自己”在八股文并不常见的,但是“自”和“己”时常在同一篇分别出现,往往一起列在“吾”的自觉、反讽、做作的对面。

韩葵的《诗云经始灵台》是饶有兴趣的田园曲,批评文人不够自然:

夫台必序其所以始,必序其所以成,必以为出于民之心,而非吾君之所为,而又必极言吾君之所观览,以示足为吾君娱。作者之体自皆然也,何必灵台,然此往往出自词人学士,驼峰劝之微意,逞瑰丽之雍辞,而试问诸闾阎,何寂寂无颂声作也。

若灵台之诗则不然,当其时中林野人,汉南游女,类皆能文章,娴吟咏。观斯台者,自写其忠爱之诚,而想夫憩息之适,揽高深之殊致,状禽鱼之极观,其犹二南之风与。然而其音雅矣。

在大结里,也提到这首诗出于民心之时,“情自深”而“意自长”。

就写作而言,瞿景淳(1543进士)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对当时的年轻文人提出建议:

作文须要从心苗中流出,初时觉难,久之自易,盖熟极自能生巧也。今之后生,专去翻阅腐烂时文,以为得法,抑知吾有至宝不去寻求而取,给他人口吻以为活命之资,真可叹矣。更有一题到手,辄取旧文以为式样,初时以为省力,不知其耳目增垢,心志转昏,自家本来灵性反被封闭不得透出,即能成文,亦平庸敷衍,不足观矣。

瞿景淳首先提到“作文”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以为他指的是所谓纯粹文学,例如古文、诗歌之类;时文只能成为“腐烂”的批评对象。可是到最后意思已经很明显,瞿景淳讲好的文章,是能够充分地表示自身本来灵性的,他理想中的文章也包括时文。

这种富于自信心和独特性格的“自己”在八股文里只是海市蜃楼吗?小品、戏曲、小说的作者从晚明空前地强调“自己”、“私心”主要目的之一难道不是冲击科举制度的虚伪吗?这样说,科举的文化生产只能被看成是一种腐败的背景,让新的个人真实性更加闪耀而已。可是如此下结论就忽略了科举制度本身的一个真实:个人独特性的概念是科举系统管理的基本原则与信条。

中国文学史上“见其文如见其人”的说法历史悠

久,在明清文化生产中的地位之重要,就像资本主义中拜物主义的关键性。可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信条得不到客观性的肯定。如果早就认识一首诗或者一篇散文的作者,那首诗、那篇散文的评价就免不了受到影响。虽然只晓得作者的名字、社会圈子,也会引起一些偏执。可是如果对于作者本人不认识,名字也从来没有听过,看诗文的时候怎么能以文本和人作“见其文如见其人”的比较呢?只有先看匿名文章,评价做好之后发现作者到底是谁,才能作公正的估价。就明清文学生产而言,除了科举以外很少遇到类似的评价制度;虽然科举历史上的“关节”之类腐败现象也不少,总的来说科举的“匿名评价”不能判定为虚名。与社会上的所谓“应酬文”生产、消费的区别实在很大。^②也可以说,场屋成为通过文学的方式将个人从社会背景中提升出来的重要场地。虽然世家、文社一直在尽量把科举制度捻成群体生产,或者是通过私塾的建立,或者是通过社稿的出版,但科举制度终归以个人作为基本单位。正如焦循所说,“科举应试之文用之一身者也”;⁽⁷⁾对明清社会菁英来说,很少有可以与场屋里的孤孤单单相比之经验。

设想一下,匿名评价对考官们会提出什么挑战?撇开少数的关节之类腐败情况不谈,如果考官们真的不知道卷子是谁写的,他们别无选择,只好按照文本之间的区别来列好等级。每一个考生欲求以文字卓然而立,每一个考主同样地期望发现一种可靠的标准来分别并评价不同的卷子。雷同原来仅是文章的失败而已,然而在制艺评价的过程当中已经变成官僚系统中的一个棘手问题。^③因此,解决之道求诸于修辞审美的领域。

学者往往提到科举制度的意识形态复制功能,可是还有反面:审美性的区分。虽然大多数八股文都要肯定朱熹的阐释,而少数批评道学家老套观念的八股文也仍跳不出儒学传统基本话语的范围,但是修辞方面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俞长城评价唐顺之的八股文时断言其“格奇理正”,想法十分正统,而文风富于创造性;叶燮同样地说没有自成一家之道,而自成一家之文学是有的。⁽⁸⁾“成一家之言”这个

转义经常跟一些表示独立突出意义的形容词、副词和动词出现在一起,例如“卓然”、“立”和很可能最普遍的,“奇”。

李廷机在万历年间就时文断言:“今天下之文,竞趋于奇矣。”⁽⁹⁾到康熙年间,连日用类书也能提到这种倾向。石成金编的通俗读物《传家宝》对考生有一些建议:

今之士子,所恃以为揣摩者,大都蒙侥幸之念,怀捷得之心。当展卷时,多不肖依经体注,规规矩矩于理法,唯思何以怪异,如何深远,方能出人头地,不与众手雷同。于是高其文法,奇其格局,逞其才华,使其气势,欲字字不落寻常蹊径而后快。

石成金这一段话虽然是含有贬义的,但它仍可以成为一种可靠标准:大多数的考生不停地想,我怎么把自己与别人分得十分清楚?然而,从嘉靖年间起,这个问题的回答经常是:高奇也好,怪异也好,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个充分发挥自己创造力的机会。

我们如果真的想了解晚明的“个性崇拜”现象,“奇”概念在科举制度扮演的角色成为重要起点之一。再说,晚明文学里的“个性”不是自然而然生出来的,而是一种文化制造品,被利用最先进“文学技术”——包括多层性的认同结构——的作者创作的。有一些学者,借鉴近代欧洲思想资源而主张把中国文学从十六世纪开始的审美革新归功于全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商品化趋势;文学的自觉创造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相当于纺织品的精致。但是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竞争都源于市场经济;考生虽然经常用“售”这种充满市井气的词语来表示他们希望受到考官的欢迎,但科举制度有它自己的内在竞争逻辑,与市场制度有叠瓦性的联系而算不上同一个系统。不只是考生、考官的形式创造与意识形态开拓不一定反映市场的要求,而是响应科举制度的内在冲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创造与开拓的回声在明代末年积极发展的文化生产处处有所体现。

注 释:

①随手翻一翻时文集,很快就发现:“吾见”“吾观”“吾

(下转第96页)

明清小说中的文人游戏与八股文

王玉超

摘要:明清时期很多社会风尚习俗都受到科举的影响,其中与科举相关的文人游戏经常为小说作者提及,明清小说中的文人游戏以酒令居多,灯谜、属对一类也有涉及。诸种文人游戏或以科举为题材内容,或借用八股文的写作手法,尤其对破题技巧的使用和八股思维方式的借鉴,往往在有意无意之中与科举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文人游戏不仅反映了文人的雅趣和学问,更反映了科举对明清文人的影响之深。

关键词:明清小说;文人游戏;八股文

明清文人在集会、宴饮时往往进行各种游戏和娱乐,如行酒令、猜谜语、联诗、对句、唱曲等,其中以行酒令、猜谜语和属对最为常见。明清小说作者用大量笔墨对这些内容加以描写,与科举相关的游戏更为他们所青睐,这些游戏与科举及其主试文体八股文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展现了小说中文人的雅趣和兴致,另一方面显示了小说作者的文采和才思。

一、文人酒令

酒令是明清小说中出现最多的文人游戏之一,一般小说写到宴饮就会涉及各种不同的酒令。酒令虽属游戏小道,却自古有之,汉代刘向在《说苑·善说》中就有记载,“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觴政。”^[1]冯梦龙在《古今谭概·谈资部》中说:“古人酒有令,句有对,灯有谜,字有离合,皆聪明之所寄也。工者不胜书,书其趣者,可以侈目,可以解颐。”^[2]酒令既反映着文人的雅趣和学问,又呈现着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学样态。

明清小说提到的酒令种类很多,有牙牌令、文字令、律令、骰牌令等,从文学角度来讲,这些酒令有雅

俗之别,其中文学性很强的酒令,其行令者大多是学养深厚的文人雅士和文采出众的才子。《绘芳录》中写到了几个酒令:

汉槎一张地牌,一张长二,一张长三是顺水鱼的点色。——“半途而废。这生后生。春色先归十二楼。”

小凤两张长三,一张么二巧合三的点面。——“所就三所去三。两当一弄成合。雁行中断惜离群。”

小黛两张梅花,一张二三,是个巧合五的点色。——“子男同一位凡五等。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南枝才放两三花。”^[3]

小说虽写女子行令,实际代表的却是文人。她们所行酒令属骰牌令,即需要应对骰牌上的点色,酒令内容比较复杂,既有成语、俗话,也有词句、诗文,这是文人酒令的典型特征。

从明清小说的描写中发现,明清文人酒令与科举及其主试文体——八股文直接相关。《红楼梦》第二十六回《宴花朝雅令集风诗》写鸳鸯要求酒令:“今儿是花朝,又是妃子的好日子,咱们掷色子数红,

作者简介:王玉超,女,黑龙江双城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昆明650500)

数到谁,谁要说两句《诗经》合一个花名儿。”^[4]且不论这种酒令是否符合人物身份,仅从行令内容上看,这种需要用《诗经》句子关合事物的酒令不是普通人能完成的,它至少要求行令人对《诗经》之类的文学经典比较熟悉,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两般秋雨盒随笔》中有“毛诗酒令”,道:

向在友人家小饮,行一酒令,须四言《毛诗》二句,合成一花,要并头、并蒂、连理,如“宜尔子孙,男子之祥”,隐宜男,此并头花也。“驾彼四牡,颜如渥丹”隐牡丹,此并蒂花也。“不以其长,春日迟迟”,隐长春,此连理花也。此令甚新。^[5]

此处行酒令的场合是“友人家小饮”,要求用《毛诗》行令,这些酒令本身反映了他们对“四书”、“五经”的熟悉程度,同时也体现了他们经过长期八股文训练的写作水平。

《红楼梦》第六十二回写到了射覆,即薛宝琴的“老”字,覆“圃”字,史湘云教香菱射“药”字;贾探春的“人”“窗”,薛宝钗射“榭”字。她们的射覆酒令不但文雅,与“四书”、“五经”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宝琴说“老”字,湘云猜到她是用《论语》中句,“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6]探春说“人”、“窗”二字,宝钗猜到她借《诗经》中句“鸡棲于榭,日之夕矣,羊牛下来。”^[7]射一“榭”字。射覆酒令对于覆字、射字所在的语句不用言说,只需行令人意会。这种行令方法和过程说明她们对“四书”、“五经”非常熟悉。

明清科举对酒令的影响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明清科举考试首场为七篇八股文,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读书人为应考科举,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因此,在宴饮、集会等所行酒令中,常将“四书”、“五经”内容纳入其中。明清文人可以将任何一种酒令与“四书”、“五经”联系起来,尤以“四书”为多。《铁花仙史》中毕纯讲到一个酒令:“既要先行酒令,我说一个席上生风,要《四书》一句,合着免饮。”^[8]毕纯的酒令为“三月不知肉味”合着席上一碗肉;元虚应令“不敬何以觥乎!”合着一碗觥。这类酒令在《古今谭概》、《广笑府》、《两般秋雨盒随笔》中随处可见。“四书”酒令古已有之,明清时期特别繁盛,其原因正是由于“四书”在科举考试中最受重视,明

清时人在私塾童蒙阶段就开始学习,凭借他们对“四书”的熟悉程度,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四书”融入酒令,这也正说明科举对酒令游戏的影响之深。

第二,从文人酒令的内容、行令方式等方面能够看出,酒令与八股文破题极为相似,即破题与题目关合,特别是八股文破题与酒令的思维过程十分接近,这更成为科举与酒令联系、融合的桥梁和基础。题目是八股文的灵魂,破承起讲都要围绕题目、阐发题蕴,尤其首句破题要阐释题意,立下文章主旨。《两般秋雨盒随笔》中写:“商邱安舜庭,童子时,向郡守求试。守指路旁‘此屋实卖’四字,令作破题。安应声云:‘旷安宅而弗居,求善贾而沽诸。’郡守首拔之。又有人作‘伯夷叔齐’四字破题云:‘甲子以后无天,首阳之外无地。’亦觉奇伟可喜。”^[9]诸如此类,八股文破题的训练并不一定都是正统、严肃的“四书”文题,很多是随意命题以考察举子思维的敏捷性,《两般秋雨盒随笔》中所记“此屋实卖”和“伯夷叔齐”二题之破题,将题目之意全部包含,设置得恰当、巧妙,其思维过程实际就是寻求题目与破题之间的联系,这本身与酒令的构思就极其相似。

明清小说中存在大量的牙牌令,牙牌令的令筹有如八股文题目,行令语句便以此为中心,似八股文破题。如《绘芳录》中王兰“一色地牌”的酒令:“其为物不贰。线脱珍珠。六宫粉黛无颜色。”^[10]这三句运用得非常恰当。“其为物不贰”出自于《中庸》“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11]“不贰”是“一言而尽,不过曰诚而已”,点明“一色”;“天地之道”指示“地牌”。“线脱珍珠”出自《西厢记》第五本“线脱珍珠,泪湿香罗袖”,^[12]王兰抽取“线脱”暗合“一”字。“六宫粉黛无颜色”出自白居易《长恨歌》,也点明“一”字。这三个语句既符合形式要求,又能反映令筹“一色地牌”的含义。明清小说提及的牙牌令,都是首句用《四书》点明令筹,确立含义,后面两句在此基础上加以生发。题目的解释可以多样,但选定一种含义并立下破题之后,文题主旨就确定了,接下的内容都要“抱定”题旨进行阐发。对于长期训练八股文写作的明清文人来讲,八股文的思维方式、破题的构思,以及题目的照应与酒令相同,将这种思维和方式运用到行令当中可谓轻而易举。

第三,酒令的趣味性与八股文以及游戏八股文的趣味性极为相近。明清文人以游戏的态度解释“四书”文句,或调侃、或谐谑,常常带有强烈的趣味性。《坚瓠乙集·文笑》载:“虽使五尺之童二句”,破云:“以可欺之人,居可欺之地,而卒莫之或欺焉,可以见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矣,或嫌其欠简健。”^[13]八股文破题可以从任何角度生发,科举考试的题目,其破题一定严正,但作为习业或游戏之作,其破题却是丰富多彩的,其中就有极具趣味甚至戏谑的游戏破题。酒令本身是一种文人游戏,趣味性是最为重要的,文学性倒在其次,这一点又成为八股文破题与酒令的相通之处。

明清小说中的人物在行酒令时,其解释“四书”的法则和技巧都与八股文毫无二致。他们往往随意摘取“四书”语句,使之脱离了原文语境,行令人无需顾及经典原意,只就文字本身进行释义即可,这种方式在八股文破题中经常出现。如《两般秋雨盒随笔》“三十而立”一条云:

《一夕话》载三十而立破题云:“两个十五之年,虽有椅杌而不坐焉。”……《北梦琐言》:“魏博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甚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讲《论语》,及讲至《为政篇》,明日,谓诸从政曰:‘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闻者无不绝倒。”^[14]

词条对人物不解经典本意的摹写虽然夸张,但是“三十而立”的游戏破题倒也有几分道理,无论是“两个十五之年”,还是“有椅杌而不坐”、“方能行立”,都与文字的字面意义吻合。这类破题属游戏之作,它反映了文人的巧思,其破题语言精炼、扼要题旨,极具概括力和准确性。小说中的酒令与此相同,不管视其为游戏,还是智力测验,文人的巧思都由此显见,它的趣味性也正体现了明清文人八股破题训练的方式和八股文写作的功底。

第四,酒令与八股文一样有优劣之分,明清文人品评酒令往往像品评八股文一样,有理有据、评论中肯。对于八股文,一般认为上品者,要贴题贯理,联句切当,一气贯通;其次要语句清奇,首尾贯串,没有俗俚句字;再次,要题体不失,平仄和畅,但是往往意味平平;下等文章则是事实杂乱,首尾断续,不可卒

读。从一气贯通、首尾贯串,到意味平平、首尾断续,八股文的结构和构思,成为决定文章优劣的重要标准。这种评价标准既可属于八股文,也可属于文人酒令,明清小说中便有很多类似的评论。《绘芳录》中写小凤赞道:“畹姐姐这条令,融贯得毫无斧凿痕迹。”这条酒令评论实际上正符合八股文的评判标准,无斧凿痕迹即理气贯通,在文章中亦属上成之作。甚至在《绘芳录》中还讲道:

东席上众人齐声赞好道:“有其主必有其婢,好个横扫五千人,真乃工于形肖,而且具见心性。你有此才华,还怕不扫倒若辈,同此骚坛之上又添一小蜚将了。”小凤、小怜也大为赞赏得意,小黛等人莫不折服。最难他并不专心向学,不过偷闲剽窃得一点半点,真要愧死那皓首穷经,一世无成之辈。^[15]

小说人物甚至用八股术语评价酒令,称其“形肖”。小说人物行令至绝妙处,大家往往加以点评,其中对肖形、文风两个方面多有提及。就形肖而言,很明显作者是把酒令当成文章来看,从整体角度进行评说,显得恰如其分。由此可见:一方面只有学问出众者才能参与这类酒令游戏,另一方面行酒令与写八股文一样,八股文要求作者设身处地使自己达到圣贤心境,从而代圣贤立言,酒令文字也要与规则相符,甚至最简单的筹令也要力求神似,以至形肖。

明清科举社会中,不管科举及第是否可以作为才华和学识的评价标准,文人对科举的重视是毫无疑问的。文人生活无时无刻不与科举保持联系,酒令只是其中的表现之一,他们乐于将科举和八股文融入游戏当中,而与科举相关的酒令盛行也是文人科举生活的一种展示。

二、文人谜语

谜语是明清小说中出现较多的又一种文人游戏,与酒令一样也带有十分明显的科举和八股文痕迹。启功先生谈到八股文破题时曾说:“从实质上说,这种破题的作法,和作谜语极其相似。有谜面,有谜底。破题两句即是谜面,所破的题目名字即是谜底。进一步讲,整篇的八股文几百字就是谜面,题目那些字即是谜底。”^[16]启功发现了八股文与谜语的关系,他将八股文的破题和题目比作谜面与谜底。

明清小说涉及的与科举及八股文相关的谜语种

类繁多,或以科举为背景,或以科举为内容。《坚瓠甲集》中记“辛未状元谜”道:“隆庆辛未会试,江阴袁舜臣作诗谜于灯上云:‘六经蕴藉胸中久,一剑十年磨在手。……’众皆不解,惟苏州刘城,一见能识之,乃辛未状元四字。”^[17]这类以科举为背景的谜语是文人谜语中常见的一类,多反映科举及第的荣耀、备举勤学的艰辛。从谜语的风格上来看,有雅俗之别,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记:

“吊者大悦”(《论语》一句)——临丧不哀;

“硬派老二做老大”(《孟子》一句)——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

“不可夺志”(《孟子》一句)——此匹夫之勇;

“颺”(《书经》一句)——四方风动。^[18]

这些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的谜语,尽管都与科举和儒家经典相关,但语言有雅有俗,当然,就小说而言,雅俗谜语的使用必需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镜花缘》中写锦云道:“他虽结巴,倒会打好谜,并且说的也清爽。”小说中锦云所评价的“清爽”谜语,便是雅的代表。其中更有紫芝的谜语“穿缎靴,打《孟子》一句”,陶秀春设计的谜语“隔靴搔痒,打《孟子》一句”,掌红珠道:“这个题面更奇”,^[19]所谓“奇”,是指谜面与谜底的关合巧妙,足见明清文人不仅把谜语当作游戏,更把谜语当作八股文题,特别讲求题目的新颖与否,正如科举考试为避免题目陈旧、举子熟悉,于是故意出截搭文题一样。

明清小说涉及的文人谜语,一类是以“四书”、“五经”语句为谜面。如《八洞天》中有《四书》猜人名的谜语,像“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谜底为“来俊臣”,“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谜底为“太公望”。^[20]这类谜语往往是经学语句指向的谜底十分明确,不存在歧异或疑义的。另一类是以“四书”、“五经”为谜底,小说中出现的谜语大多属于此类,如《红楼梦》中李纨编的《四书》谜“观音未有世家传”,谜底是“虽善无征”;“一池青草草何名”谜底是“蒲芦也”。^[21]《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述农写一“示”字,谜底是“视而不见”;又出一个“良莠杂居,教刑乃穷”,谜底为“虽日撻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22]这些谜语与文人酒令一样,都需要参与者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不但要熟悉儒家经典,更要谙知八股文。

事实上,明清小说中的大多谜语,或是谜面、或是谜底都与“四书”、八股文、破题、八股思维相关。《两般秋雨盒随笔》中有“子同生”一条,记:“偶见有作灯谜者,‘公与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射《四书》一句:‘然则有同与’。”^[23]其中又有“灯谜”一条,记道:

“直把官场作戏场”:“仕而优”;

“红旗报捷”:“克告于君”;

“分明《周易》语,却是楚骚心”:“象曰郁陶思君尔”;

“一乘轿子两人抬,晓脚跟班随后来”:“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24]

这些与儒家经典相关的谜语,都将儒家经典作为谜底出现。这些文人谜语都纳入了八股文的要素,其设计十分巧妙,梁绍壬说:“近人作灯谜,心思突过前人,以余所闻之佳者备录之。”谜语的巧妙与八股文的构思,尤其是破题非常接近,如“直把官场作戏场”与谜底“仕而优”,谜面与谜底的关联点是“官”与“仕”相对,“戏”与“优”相对,这与八股文题目和破题的对应关系完全一致,其间的巧思连接也是相同的。

首先,谜语与八股文相比,二者的不同表现在题目与破题的孰先孰后,很多文人谜语是先有破题再猜题目。刘熙载说:“昔人论文,谓未作破题,文章由我;既作破题,我由文章。余谓题出于书者,可以斡旋;题出于我者,惟抱定而已。破题者,我所出之题也。”^[25]也就是说,八股文题目的解释和破题方式可以见仁见智,一个题目可存在多种不同的破题,这一特点比较适用于酒令中筹令的编制,而一个破题一般仅对应于一个题目,很少存在对应多个题目的情况,因此比较适用于以“四书”、“五经”为谜底的文人谜语,这样就不至于谜底模糊不清,答案多样了。

如果将谜语与八股文类比,谜语与八股文的形式相反,即谜面是破题,谜底是八股文题目,谜语是先有破题再有题目,但它的思维逻辑和方法却与八股文相同。八股文破题要依据题目,用一句简练显豁的语句概括题旨,如明代陈际泰有《欲齐其家者二句》,破题二句为:“家取则于身,故君子谋所以齐之者焉。”^[26]在猜谜过程中,猜谜者也要依据谜面选择一句儒家经典,既具有概括性,又要扼住谜面之意。如《镜花缘》第三十一回的一条谜语“游方僧”,打《孟

子》四字,唐敖猜道:“所过者化”;又一条谜语“守岁”二字,打《孟子》一句,多九公猜“以待来年”。《四书》谜语的猜谜法与八股文破题一样,都是针对题目中的重点字词加以生发。

其次,很多明清文人谜语的猜谜方式与八股文的破题技巧相同。八股文破题非常巧妙,能够反映读书人的才思与学识,文人谜语看似与八股文毫无关联,但在科举社会中,八股文的思维和写作技巧必然影响到文人的生活,包括文人游戏,很多文人谜语的猜谜过程与八股文破题就十分相似。《镜花缘》中写薛蘅香道:“我出‘农之子恒为农’,打《孟子》一句。”……姜丽楼道:“必是‘耕者不变’。”^[27]小说作者对猜谜过程讲得明白,指出猜谜与分析八股文一样,在诸多意思相近的破题中,选取最接近题目、最符合题意的一个。《镜花缘》中还写道:

印巧文道:“我出‘核’字,先打《孟子》一句,后打《论语》一句。”玉芝道:“这个‘核’字有何精微奥妙,要打两部书,若按字义细细推求,‘核’之外有果,‘核’之内有仁。”董翠钿道:“我猜着了:可是‘果在外’、‘仁在其中矣’?”巧文道:“正是。”

宰银蟾道:“我出‘重庆’,打《孟子》一句。”婉如道:“《孟子》上面‘祖’字甚少,至于‘父父子子’,又是《论语》。”掌骊珠道:“必是‘父子有亲’。”题花道:“这个‘亲’字借的有趣。”^[28]

这里写以“核”字为谜面,在猜谜过程中,要结合“核”的特点,即外果和内仁,经小说人物的细致分析,再结合《孟子》、《论语》,其谜底为“仁在其中矣”最恰当不过。至于“父父子子”亦是如此,不但讲解猜谜过程,更对方法、技巧加以总结,小说人物说道“‘亲’字借的有趣”,这个谜语运用了借字法,借字法与八股文破题的钩挽调渡诸法一样,本属八股文的破题技巧之一。这不仅表示谜语与八股文相似,更说明文人在游戏过程中有意运用八股文的思维方式。

三、文句属对

明清小说涉及较多的文人游戏还有一种就是属对,包括对联和对句。属对本来就是古代文人自幼研习的课业之一,在科举社会中更为普遍,且与酒令、谜语一样深受科举影响,带有强烈的科举色彩。

首先,明清小说及文人笔记记录的对联和对句,

内容广泛,表现丰富,其中,出现于各地的、与科举相关的对联可谓信手拈来。《两般秋雨盒随笔》中有“贡院对”一条,记:

阮芸台官保为淞江监临,于行台中题一对云:“下笔千言,是槐子黄时,木犀香候。出门一笑,正西湖月满,东海涛来。”何等风流兴会!^[29]

贡院作为明清科举考试的重要场所,是举子们最为尊重的地方,也是他们心中最神圣的地方,这副对联不仅与贡院场景、科举选才相契合,而且也足以反映科举对文人的重要意义。其中又记“广东香山书院对”,云:“‘诸君到此何为?岂徒学问文章,擅一艺微长,便算读书种子。在我所求亦恕,不过子臣弟友,尽五伦本分,共成名教中人。’措词质而不郭。”^[30]此条所记对联则突出了明清书院与学校的不同。所谓“一艺微长”即举业文章,这是明清很多学校的讲授内容,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由于“科举必由学校”,^[31]另一方面随着科举应试观念在读书人中的流行,八股文成为他们唯一的课业,学校难免有失其教育职能。“名教中人”指书院培养的人才,与钻研于举业者相反。这副对联反映了书院的本质,即明清书院作为学校的补充,职能与学校并不相同。这类与科举相关的对联,多书写于贡院、书院、学堂等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文人雅趣,以及读书人的科举心态,同时也反映了小说作者的科举观念。

第二,明清小说和文人笔记中出现的属对,多涉及“四书”“五经”内容。《西湖二集》中写甄龙友:“一进山门,看见四大金刚立于门首。提起笔来集‘四书’数句,写于壁上道: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已。”^[32]《两般秋雨盒随笔》中也有“四书对”一条,云:

某太守,清苑人,曾令泾县,颇贪酷。一日辰起,见听事贴一对云:“彼哉彼哉,北方之学者,何足算也!戒之戒之,南人有言曰,其无后乎?”^[33]

此类属对委实不少。其实,以“四书”语属对的情况自古有之,只是明清时期尤其之多,大多小说和文人笔记都有提及,如《古今谭概》中甚至有专门的“四书语”一类,其中记有:“虞集未遇时,为许衡门客。虞有所私,午后辄出馆,许每往不遇,因书于简云:‘夜夜出游,知虞公这不可谏。’”这是用了《孟子·

万章上》,虞回对云:“时时来扰,何许子之不惮烦!”^[34]这是用了《孟子·滕文公上》。用“四书”语句进行属对,不但可以考查文人的属对能力,也可看出其对“四书”的熟悉程度,在明清科举社会中,不失为考课举业的好方法。《坚瓠戊集》中“董生”条记:“董生十岁时,外祖熊博士举峰诞日。试对曰:‘六十八翁,有数十人,子妇女婿并外孙,称觞庆寿。便拚一醉何妨。’董对曰:‘百世一师,集三千士,颜曾闵冉及子夏,论道传经。’”^[35]综观明清小说及笔记提及的“四书”和“五经”语句属对,使用“四书”语的情况远远多于“五经”语,这与酒令、谜语等其它文人游戏没有区别,科举对文人的影响之深由此亦可见一斑。

第三,明清科举的主试文体——八股文本身在形式上要求骈俪对偶,属对因此成了举子的基本功课,甚至被纳入蒙学范畴,是孩童必修的课业,它促使《笠翁对韵》之类的蒙学韵文读本大量出现,年龄幼小又善于属对的孩童常被人夸赞,《坚瓠丙集》中写:“陆浚明(粲),幼善属对。”^[36]是否善于属对已成为品评明清读书人文学水平高低的标准之一。《坚瓠乙集》中写:“丘琼山幼从师于里宦之家塾,聪敏有声,宦儿颇不好纸笔。”^[37]其中也写到孩童在家塾中的习业情形,练习属对是极为重要的一项。明清科举社会中,甚至有以属对作为技艺者,《两般秋雨盒随笔》“招牌对”一条道:“纪文达公尝集京师招牌,为对甚夥。如诚意高者,细心坚烛,学经蒙并授。店槽道俱全。之类,具极工整。”^[38]对于童蒙课业和举子讲习,属对都是最为重要的内容,无论塾师还是学生,属对都会引起他们的重视。明清文人生活在科举社会中喜欢将八股文融入游戏,这种有趣的形式既可以佐助娱乐,又可以变相地练习八股举业。

文人酒令、谜语及属对,虽然游戏形式不同、方法各异,但在明清文人的游戏娱乐过程中,多与科举联系。对于明清科举文人来说,一切能够与科举、八股文联系的机会都会为他们所利用,酒令、谜语和对句等文人游戏,不仅是他们标榜的文人雅趣,也是他们耳濡目染于儒家经典之下的无意识运用。

参考文献:

[1](西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

书局,2000.276.

[2][34](明)冯梦龙.古今谭概[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584,575.

[3][10][15](清)西泠野樵.绘芳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21,218,220.

[4](清)郭则沅.红楼真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04.

[5][9][14][23][24][29][30][33][38](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盒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36,72,340,146,201,44,49,186,312.

[6][11](宋)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161,39.

[7](宋)朱熹.诗集传[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179.

[8](清)封云山人.铁花仙史[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180.

[12](元)王实甫.西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5.

[13][37](清)褚人获.坚瓠乙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6,11.

[16]启功.说八股[M].北京:中华书局,2000.9.

[17](清)褚人获.坚瓠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9.

[18][22](清)吴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M].济南:齐鲁书社,2008.276,554-555.

[19][27][28](清)李汝珍.镜花缘[M].香港:中华书局,1985.605,604,604-606.

[20](清)五色石主人.八洞天[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119.

[21](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626.

[25](清)刘熙载.刘熙载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190.

[26](清)方苞编,王同舟、李澜校注.钦定四书文校注[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373.

[31](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十九)志四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75.

[32](清)周清原.西湖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48.

[35][36](清)褚人获.坚瓠戊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14,11.

(责任编辑 王伟宜)

唐顺之四书文研究

(台)蒲彦光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号荆川,武进人。年二十三,举嘉靖八年会试第一。《明史·文苑传》曾提及“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则王鏊、唐顺之”^[1],而明人旧称“王、钱、唐、瞿为四大家”^[2],不仅同时代的茅坤评价其为“本朝第一”^[3],方苞《钦定四书文》也将唐氏与归有光并举,认为是“明文之极盛”^[4],可见唐顺之在明代制艺史中,是位极具代表性的作者。

一、承先与启后的唐顺之

我们不妨先从文体史上来看唐顺之的创作,方苞《钦定四书文》曾把明代制艺史依时代先后分为四期,藉以说明其文风演变:

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踰。

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

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茶然矣。

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

凡此数种,各有所长、亦各有其蔽。^[5]

换言之,在洪武至弘治间的制艺,主要成绩或风格是“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踰。”要到了唐顺之的时代(正德、嘉靖),制艺作品“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在文章的义理与书写上,不必“恪遵传注”与“谨守绳

墨”,四书文在义理面开始具有更大的诠释空间及自由,而形式上则使用了唐宋“古文”的笔法来写作。至于方苞所提的第三期(隆庆、万历),“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茶然矣”,则不论其义理面^①,主要表现出文体形式之完熟。

制艺评论家曾指出唐顺之四书文的渊源与影响,例如清代俞长城说:“成、弘二朝会元,皆能名世,文之富者,为王守溪、钱鹤滩、董中峯三家。王、钱之体正大,中峯之格孤高。王、钱之后,衍于荆川,终明之世号曰元镫。”^[6]可以看到唐氏基本上延续了第一期王鏊、钱福的书写成就,这是说他的“承先”。至于“启后”,唐顺之深刻影响了后期制艺的写作形式,如王夫之即批评他:“钩锁之法,守溪开其端,尚未尽露痕迹;至荆川而以为秘密藏,茅鹿门所批点八大家,全恃此以为法,正与皎然《诗式》同一陋耳。本非异体,何用环纽?摇头掉尾,生气既已索然,并将圣贤大义微言,拘牵割裂,止求傀儡之线牵曳得动,不知用此何为?”^[7]唐顺之对于篇法笔法的强调,使制艺形式上更见严密、创新,乃至于试图超越既有格套法式,追求一种浑然天成的表现方式。

二、创作特色与时代风气

《钦定四书文》评语中曾提及正德、嘉靖期间的制艺特色,总括而言可以分为四点:以古文为时文;风格之气盛辞坚;融液经史之变革;章脉贯通之讲求。我们可以先在此一格局下,观察唐顺之的四书文。

例如方苞认为此期时文之最大特色,首先在于唐顺之、归有光等人运用了古文写法来作八股,方氏曰:

以比偶为单行,以古体为今制,唯嘉靖时有之,实制艺之极盛也。^[8]

以古文之品格出之,故同时作者皆为所屈,盖或识不及远、或才不逮意,虽苦心营度,终不能出时文蹊径也。^[9]

其提掇眼目,皆本古语法脉,而运以坚劲之骨、雄锐之气,读之可开拓心胸,增长智识。

“以古文为时文”自唐荆川始,而归震川又恢之以闳肆,如此等文实能“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而脗合于当年之语意,纵横排荡,任其自然,后有作者不可及也已。^[10]

提到“以比偶为单行”的古文写法^②,系由唐顺之首先施用于制艺的书写,造成了制艺文体的重大变革。同时,由于采用了古文笔法,制艺开始能够表现出一股“纵横排荡”、“屈盘劲肆”、“错综尽致,笔意峭劲”、“坚劲之骨、雄锐之气”的不俗气势,这也就是所谓的文章“气格”、“气脉”。至于标榜“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可以窥见“文以载道”的古文主张,方苞于此继承了唐顺之、茅坤及归有光等唐宋派论文的观点^③。

“以古文为时文”的另一特征,则是所谓“融液经史”的变革。借用古文家的说法,八股文书写从“守经遵注”演化至“融液经史”,正如古文之宗主韩愈昔年所论的,是一种“师其意,不师其辞”,可以看见古文家对于经义的重新表意、与形式上之改写。这当然也就是韩愈所标榜“自树立,不因循”的特殊诠释观点^④。此期作品之融液经史,例如方苞评论唐顺之曰:

深明古者君臣之义,由熟于三经三礼三传,而又能以古文之品格出之,故同时作者皆为所屈。盖或识不及远、或才不逮意,虽苦心营度,终不能出时文蹊径也。^⑤

就《语》、《孟》中取义,而经史事迹无不浑括,此由笔力高洁,运用生新,后人动阑入《四书》字面作文,殊乏精采,所谓上下床之隔也。^[11]

不采“字面作文”,是因为唐作“浑括”了经史事

迹、熟于经传,所以才会称其“运用生新”^⑥。方苞在评归有光时也强调此一“用”字:

化治以前,先辈多以经语诂题,而精神之流通、气象之高远,未有若兹篇者。学者苦心探索,可知作者根柢之浅深。三百篇语,汉魏人用之即是汉魏人气息;汉魏乐府古诗,六朝人用之即是六朝人音节。观守溪、震川之用经语,各肖其文之自己出者,可悟文章有神。^[12]

由于不像化治以前“多以经语诂题”,方苞形容王鏊、归有光之“用经语”,犹如汉魏人之“用”《诗经》,犹如六朝人之“用”汉魏乐府古诗,能“各肖其文之自己出者”,这种“用”是首先有一“言志”之主体在焉,故其赋诗不妨“断章取义”^⑦,可以“任笔抒写”,“以我馭题”;借他人酒杯,浇自身之块垒。

正如古文运动是“以复古为开新”、化传统于流行,依方苞说法,或许因为这些文章改写后的“气息”与“音节”,保留了当代审美趣味,所以他才会称美此期制艺书写上“精神之流通”与“气象之高远”,不似前期之板滞拘谨。这一方面固然可见义理上“融液经史”之挥洒,另外一个重要层面,则是文体技巧的日渐成熟。^⑧行文手笔之熟练,使得此期文章比较起化治以前作品,显得夷犹自得、贯通而遒密,请看方苞评语:

其嘘吸神理处,王守溪亦能之,而开阖顿宕夷犹自得,则犹未辟此境也。^[13]

章脉贯通,坚重遒密,嘉靖盛时风格。^[14]

贯通章旨,首尾天然缩合,缘熟于古语法度,循题腠理,随手自成剪裁。^[15]

八股至此,绵密已极,过此不可复加,故遂流而日下也。长至五六百字而不可增减,可以知其体认之精、敦琢之纯矣。^[16]

强调这些作品“首尾缩合”的“谨严”、“遒密”与“章脉贯通”,其形式上则日渐臻于“过此不可复加”、“不可增减”之“绵密”、圆熟,循此以往,也就开启了“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讲求“钩勒贯穿”的隆庆、万历风气。

三、讲求文法与融炼自然

前面提及唐顺之制艺在形式上之熟练、贯通,也就从正德、嘉靖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明人对于制艺文

法的讲究。唐顺之制艺所以“贯通章旨”，方苞指出系“缘熟于古文法度”，确实如此，唐顺之曾刻意讲求古文文法，例如他的《文编》序言即说：

欧阳子述扬子云之言曰：“断木为棋、椀(抗)革为鞠，莫不有法，而况于书乎？”然则又况于文乎？…文而至于不可胜穷，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则不能无文，而文不能无法。是编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圣人以神明而达之于文，文士研精于文，以窥神明之奥，其窥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驳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尝不在焉。所谓法者，神明之变化也。易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学者观之，可以知所谓法矣。^[17]

所以对于文法之讲求，对于他们而言不只是读懂或写好一篇文章而已，文法还是读懂古文经籍、以上窥圣人神明变化之堂奥。

唐顺之讲求文法，主要也涉及了明初以来文坛的复古运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唐氏曾有此评论：

其文章法度，具见《文编》一书所录，上自秦汉以来，而大抵从唐宋门庭沿溯以入，故于秦汉之文，不似李梦阳之割剥字句、描摹面貌，于唐宋之文，亦不似茅坤之比拟间架、掉弄机锋，在有明中叶，屹然为一大宗，至其末年，遁而讲学，文格稍变。^[18]

至于《明史》则说：

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诗仿初唐。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启、禛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见者，其源流大抵如此。^[19]

可见唐氏乃是延续自弘治以来的复古思潮^⑨，只不过李梦阳、何景明所欲兴复之典范为秦汉文，到了王慎中、唐顺之，却改辄以唐宋古文为典范^⑩。

讲求文法最重要的方式，自然就是编选一系列相关的模板教材^⑪。《文编》所选文章自先秦至宋代共1422篇，其中先秦两汉文计346篇，唐宋文计1053篇，魏晋六朝文只有23篇。综观各体之下的文章，发现唐顺之对宋代的欧阳修和苏轼偏爱有加，二人的文章入选得最多^⑫。

我们也可以在唐顺之制艺的相关评语中，发现其作品表现出一种唐宋古文之笔法与风格：

笔力圆劲，神似欧、苏论辨。^[20]

人亦知其妙处只是顿跌之法精熟耳，到拈笔为顿跌又摹他不似。盖顿跌皆从《国策》、《史记》、韩、欧文得来，与时文中顿跌似是而不同。^[21]

或于前面托一层，或于后面收一笔，夫子德盛礼恭，从容中节处，曲曲传出，而行文亦极回环错落之巧。^[22]

制艺既取法于唐宋古文，因此便重视文章的结构与风格，一方面在形式上日趋严整，另一方面则要求表现出作意与作者之精神面貌。古文家所谓“文以载道”，文体形式与文章内容本是一体两面，互相抗衡，如果太拘于书写的形式层面，则作意与精神往往会为其所掩，反而失落了制作之初衷^⑬。

因此，唐顺之或方苞等古文家虽重视文法，却主张“活法”，反对形式之板滞，强调唐宋文后天之法，应取则于秦汉上古“无法之法”的自然^⑭。方苞评论唐顺之制艺时即屡称其“天然结合”之高妙，例如：

理精法老，语皆天出，几可与韩氏《对禹问》相方。^[23]

属对之巧，制局之奇，细看确不可易，须知题之宾主轻重，前案后断之间，自有天然部位，妙手乃得之耳。^[24]

如脱于圣人之口，若不经意而出之，而实理虚神焕发刻露，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也。^[25]

随题体贴处处得喟然之神，行文极平淡，自然中变幻无端，不可方物。其嘘吸神理处，王守溪亦能之，而开阖顿宕夷犹自得，则犹未辟此境也。^[26]

着明唐氏制艺“自然中变幻无端，不可方物”的“融炼自然”，进而表现出一种“开阖顿宕夷犹自得”的精神面貌。可以说，这正是唐顺之承继，而又超越了王鏊之处。

四、深透史事与精神命脉

既以制艺为研究题材,为了讨论的方便,也希望能从文本来理解唐顺之如何写作,于此不惮辞费,试参考其《三仕为令尹六句》^[27]:

大夫之心裕而公,忠于谋者也。【破题】

夫裕则齐得失,

公则平物我,

而子文可以为“忠”矣,“仁”则吾不知也。【承题】

子张之意若曰:今夫天下之人,谋其身也过周,而谋其国也过畧。【起讲】

夫惟其过周也,则少不如意者,未尝不为之戚焉;

夫惟其过畧也,则苟无预于己者,未尝屑为之谋焉。【起比】

此无怪乎幸进之多、而善治之寡也。子文曾有是乎?【出题】

方其三仕为令尹,继而三已之也,

吾知满其欲得之志,不能不喜于利见之初,

而拂其患失之心,不能不愠于播弃之后。(股中对比一)

况夫勉于其暂,不能勉于其久者,人之情也;

矫于其顺,而不能安于其逆者,理之常也。(股中对比二)

子文则谓:穷达命而已矣,

贵贱时而已矣。(股中对比三)

运之所隆,则其仕我者其道亨也,不色喜也;

势之所去,则其已我者其道穷也,不色愠也。

(股中对比四)

安其常,而不摇于身外之感,

顺其适,而不迁于事变之交,(股中对比五)

其在已也,犹其在夫仕也,

其在三也,犹其在夫初也。(股中对比六)

吾于是而知其心之“裕”矣。【上股】

及其将去,而新令尹以代也,

吾知忌心生于新故之变,则必幸其败事以形吾之善;

愠心起于去位之日,则必不谋其政而任其人之为。(股中对比一)

况夫功成者退,则旧政虽善,未必其我德也;

责有所归,则新政虽不善,亦未必其我咎也。

(股中对比二)

子文则知有国而已矣,

知有君而已矣,(股中对比三)

惧其未识乎治体也,而孰所当因?孰所当革?尽其说而道之焉;

惧其未识乎民宜也,而孰为便民?孰为不便于民?举其国而听之焉。(股中对比四)

大其心,而不计其形迹之嫌,

忘其私,而求善夫身后之治,(股中对比五)

使其政之行于我者,犹其得行于彼也;

而政之行于彼者,犹其得行于我也。(股中对比六)

吾于是而知其心之“公”矣。【下股】

吁!子文其《春秋》之“良”哉!【收结】

此篇篇题为《论语·公冶长篇》之“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文章具有相当清楚的结构:先有个扼要的冒子说明经文脉络与题意,正面提炼出“裕”与“公”的理解(主体是被代言者孔子),再以小讲反面布局(扣题,回到发语提问者子张),议论时以两扇立格,每扇当中有六个对比句式,上股谈经题前四句(裕),下股谈后二句(公),由外在“运势”讲到个人内心之挣扎,最后则以对楚令尹子文之评语作结。行文条理井然,不枝不蔓,具见其所谓古文法度。

方苞对于此篇之评语,很值得我们注意:

就人臣立论,身国对勘,反正相形,子文全身已现,却仍是子张发问口吻,于题位分寸不溢。归、唐皆以古文为时文,唐则指事类情,曲折尽意,使人望而心开;归则精理内蕴,大气包举,使人入其中而茫然;盖由一深透于史事,一兼达于经义也。^[28]

所谓“身国对勘,反正相形”,确实如前所述,具见于唐顺之此篇行文结构中。“仍是子张发问口吻,于题位分寸不溢”,是指此篇掌握了合宜的立场、与扣紧经句条理分明的析论。至于“子文全身已现”,方苞乃指出此篇赋予子文一个鲜明的精神面貌。

因此,方苞又进一步说唐顺之“以古文为时文”的重要特征,在于“指事类情,曲折尽意,使人望而心开”,其渊源上则是“深透于史事”。除此篇外,《钦定

四书文》也有其他相关的评语:

抉摘髓者隐曲,纤毫无遁,指事类情,尽其变态而止。^[29]

刻划深透,几可袭迹于唐荆川,而终不能强者,古文之气脉耳。^[30]

都指出唐顺之制艺有“刻划深透”、“抉摘隐曲,纤毫无遁,指事类情,尽其变态而止”的手法。这种“曲折尽意”表现出经题内在深心的笔调,或许就是唐顺之藉由欧阳修文法以上溯《史记》的一种书写策略^⑤。

除了以古文上溯《史记》,唐顺之此一笔法或许与前辈作家钱福有渊源,如储大文说:“经义正宗,首尊守溪、鹤滩。荆川得之鹤滩,昆湖独得之守溪。”^[31]俞长城曾说钱氏“至名物度数之繁,声音笑貌之末,皆考据精详,摹画刻肖,中才所不屑经意者,无不以全力赴之。”^[32]可见唐顺之此等作法已有先例。

五、结语:超越于文法之上

唐顺之“以古文为时文”,既讲究“贯通章旨”^[33]的文法以探究经籍堂奥,却又时时想要超越于法律之窠臼,“以天合天”^[34]。损之又损,后期乃有“本色说”之见解,试看其与茅坤讨论自己的转变:

……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则有说。鹿门所见于我者,殆故吾也,而未尝见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岂欺鹿门者哉!其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谓一切抹搨、以文字绝不足为也,盖谓学者先务有源委本末之别耳。文莫犹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论。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间一段精神、命脉^⑥、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养富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剽说、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废。然则秦汉而上,虽其老墨名法杂家之说,而犹传今,诸子之书是也;唐宋而下,虽其一切语性命谈治道之说,而亦绝不传。欧阳永叔所见唐四库书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⑦

如以唐顺之的说法来看,写作的内容(性命或治

道)不再重要,形式之工拙也并非重点,书写的意义反而在于透显作者“精神、命脉、骨髓”之真切,想要达到这种超越的真实,则必须有“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的心性修炼功夫。

受到五四运动以来的批判,今人多不晓明清制艺与理学的关系,以为此文体(当日也称为“经义”)只有空洞华丽的八股形式,这其实有很大的误解。即以唐顺之为例,确实如唐鼎元(1894-1988)于编修年谱时所指出的,他这一生可以分为几段重大的创作与思想上的转折:“公二十以前专精制艺之文,故负海内盛名,为场屋圭臬。三十左右为师古文辞,……四十以后专研理学。”^[35]唐顺之正是由制艺文法的精研,走向了理学性命之深究。因此在他过世后,不仅李贽《续藏书》将唐氏编类于“理学名臣”(而非“文学名臣”)项下,黄宗羲也将其列入《明儒学案》,良有以也。

注 释:

①事实上上期之义理面亦足可观,主要表现出阳明心学与三教合一的混杂。

②“以古文为时文”之首要特征,端在化骈为散,如梁章巨提及:“吾乡朱梅崖先生以古文名家,其应举制义,亦纯以古文之法行之,不肯稍降其格。乾隆甲子乡试,首场卷已为同考官所抹,以句读不清批黜。…原评云:‘郁然而深,旷然而明,忽整忽散,若断若续,纯以古气经纬其间,西汉遗风于斯未坠。’”(《制艺丛话》,页251)此评语所谓“忽整忽散”可为其证。从其相反面而言,也有古文家说到科举八股之“排比对偶”,会对写作古文发生“化散为骈”的不良影响。(见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5年,上册,卷二,页25)

③制艺文当然也有不以唐宋古文为典范的复古策略,如梁章巨曾提及:“王耘渠(汝驥)曰:世之诟病时文者,谓其气体之非古耳。若得左、马之笔,发孔、孟之理,岂不所托尤尊而其传当更远乎?愚故谓有明制义,实直接《史》、《汉》以来文章之正统也。”(《制义丛话》,页22)则以汉人史书为典范。

④韩愈《答刘正夫书》:“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韩昌黎文集校注》,马通伯校注,台北:华正,1986年,页121-122)唐顺之也有同样的说法:“文章稍不自胸中流出,虽

若不用别人一字一句,只是别人字句,差处只是别人的差,是处只是别人的是也。若皆自胸中流出,则炉锤在我,金铁尽熔,虽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字句,如《四书》中引《书》引《诗》之类是也。”(《与洪方洲书》,《荆川先生文集》,卷11,收录于《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王云五主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76册,1979年)唐宋古文运动原是一种对于秦汉经典的新诠释,在书写上本就强调“不师其辞”、“不因循”;就这一点来看,正德嘉靖间八股文“融液经史”之精神,与古文运动对于经典传统之消化创造是一致的。

⑤评唐顺之,《有故而去五句》,《钦定四书文》,页176。后人往往以“熟”字评论唐顺之制艺,例如梁章巨的记载:“林于川雨化曰:唐荆川顺之精于制义,有自为诗云:‘文入妙来无过熟,书从疑处更须参。’此荆川自道其所得也。”(《制艺丛话》,页64)

⑥俞长城曾说“唐荆川先生教学里中时有教学文,为吏部时有吏部文,为中丞时有中丞文。”(《制艺丛话》,页64-65),可见唐氏于制艺写作之勤。《钦定四书文》原属官方编修的模板,在选文态度上务求谨慎保守,方苞虽然收录了唐顺之21篇作品(在正嘉期间是第二高,收录篇章最多者是归有光),然其评论唐氏《请问其目一节》,尚收录了当日之“原评”曰:“荆川三墨,惟此可谓规圆矩方,绳直准平矣。”(《钦定四书文》,页116)又《昔者太王居邠合下二节》篇,方苞评曰:“属对之巧,制局之奇,细看确不可易,……妙手乃得之耳。”(页165)可以推论唐顺之应试获隽,乃至其他未及收录于《钦定四书文》的作品,大抵称不上“规圆矩方,绳直准平”,此可窥见唐氏制艺文之求新求变。另一方面,如从唐顺之《文编》的批点来看,其于韩文亦经常强调作意之“奇思”。

⑦据《日知录》记载:“林文恪公(材)《福州府志》云:‘余好问长老前辈时事,或为余言林尚默志方游乡序为弟子员,即自负其才当冠海内士。然考其时试诸生者,则杨文贞、金文靖二公也。夫尚默当时所习特举子业耳,而杨、金二学士皆文章宿老,蔚为儒宗,尚默乃能必之二公若合符节,何哉?当是时也,学出于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习之,譬作车者不出门,而知适四方之合辙也。正德末,异说者起,以利诱后生,使其学,毁儒先,诋传注,殆不啻弁髦矣。由是学者依依然莫知所从,欲从其旧说则恐或生新说,从其新说则又不忍遽弃传注也。己不能自必,况于人乎?是故射无定鹄,则羿不能巧;学无定论,则游、夏不能工。欲道德一、风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制艺丛话》引,页230)林材此处的说法很值得留意,他认为八股“毁儒先,诋传注”之“异说”纷起,系从正德末年开始的,而方苞于此期所称美的唐顺之、归有光,二人皆于嘉靖期间登第,这恰好可以让我们理解正嘉间人对于固有诠释模式之变革,与文评家方苞标举此期之解经态度。

⑧此期文学技巧日渐成熟,也形成了不同的宗派风格,如钱禧说:“正、嘉以来,或兼雄浑、或兼敏妙、或兼圆熟,各自成家,亦各有宗派,然皆有平淡之风。”(《制艺丛话》,页233)

⑨又如康海(1475-1540)《溪陂先生集序》曰:“我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反古昔而变流靡者,惟时有六人焉: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鄠杜王叔友、仪封王子衡、吴兴徐昌谷、济南边廷实,金辉玉映,光照宇内,而予亦幸窃附于诸公之间。乃于所谓孰是孰非者,不溺于剖劖、不怵于异同,有灼见焉,于是后之君子言文与诗者,先秦两汉、汉魏盛唐,彬彬然盈乎域中矣!”(《对山文集》,卷三,收入《明代论著丛刊》,台北市:伟文图书,1976年,页123-124)

⑩嘉靖八年(1529),唐顺之以会元登进士第,当时的他尚未以唐宋古文为典范,据夏言(1482-1548)于嘉靖十一年(1532)的疏文来看:“至于成化、弘治间,科举之文,号称极盛,凡会试及两京乡试,所刻文字,深醇典正,蔚然炳然,诚所谓治世之文矣。近年以来,士大夫学为文章,日趋卑陋,往往剽剽摹拟《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蹈袭衰世乱世之文,争相崇尚,以自矜眩。究其归,不过以艰深之词饰浅近之说,用奇僻之字盖庸拙之文,如古人所谓减字、换字之法云耳。纯正博雅之体,优柔昌大之气,荡然无有。……伏乞圣明采纳,敕考试官今次会试较士,务取醇正典雅、明白通畅、温柔敦厚之文,凡一切驾虚翼伪、钩棘轧茁之习,痛加黜落,庶几士子知所趋向,而文体可变而正矣。”(《正文体重程序简考官以收真才疏》,《南宫奏稿》,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429册,1986年3月,页420)可见当时的制艺作风,往往摹拟先秦古籍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表现出一种“艰难”、“奇僻”之文风。唐顺之要到来年(嘉靖十二年,1533)才接受王慎中的建议,转向取径于唐宋古文。

⑪唐顺之一生热衷于编选,经史子集无不涵盖,希望“由制艺而引之古”。例如焦竑说:“毗陵唐应德先生,以文学主盟区宇,所贯穿驰骋于古今群籍,靡所不该洽。其归自词林,授徒荆溪者垂二十年,尝欲由制艺而引之古也,则取《文章正宗》、《唐宋名家策论》批评之,即句栉字比,间于作者,往往洞朗关窍,若面相质不啻也。最后《文编》出,具诸体因具之观,又非二书埒矣。”(明施策辑《批点崇正文选》,浙江图书馆藏万历四十二年刻本,卷首)

⑫此中,尤其以欧文影响最大,例如罗洪先《祭唐荆川文》说他:“文继欧曾”(《念庵文集》,《四库全书珍本》,王云五主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5集,卷17,页13)而黄淳耀《答张子灏书》亦云:“《荆川集》送到,此老是欧曾嫡派。……不能指其何字何句是古,而逼真古人。”(《陶庵全集》,《四库全书珍本》,1982年,第12集,卷1,页11)

⑬例如林雨化(1738-1811)曾经指出唐顺之制艺有“流水

不齐文法”,表现出一种融化典籍的精熟巧妙,并提及俞长城之评论:“此等作法,成、弘、正、嘉间多有之,隆、庆以后则绝响矣。”(见《制艺丛话》,页64)隆庆以后文体形式日见严密整饬,反而失去了此等洒脱。

⑭明代中叶对于法的讨论,自然是受到当时复古诗论的影响。何景明早在正德二年(1507)就说到:“曷章句之足守分,发矩矱之自然。”(《述归赋序》)又说“泯其拟议之迹。”(《与李空同论诗书》,《大复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67册,卷32,页19下)

⑮唐宋派对于欧文之取法,例如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说:“宋诸贤叙事,当以欧阳公为最,何者?以其调自史迁出,一切结构裁剪有法,而中多感慨俊逸处,予故往往心醉。”(《唐宋八大家文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页15)又艾南英《答陈人中论文书》说:“不佞极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过于尺寸铢两而毫厘不失乎法,视《史》、《汉》风神如天衣无缝为稍差者,以其法太严耳。宋之文由乎法,而不至于有迹而太严者,欧阳子也,故尝推为宋之第一人。”(《答陈人中论文书》,见李壮鹰等编:《中华古文论释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明代下卷,页416)皆提及欧阳修(文法)与司马迁(天衣无缝)之关联。余来明认为:“欧阳修文章受到推崇,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唐宋派看来,八大家中欧文风调与《史记》最为相近。…他们推崇《史记》,在于《史记》最切近地秉承了六经文章的精义。这一理论路径的形成,是基于以下认识:由欧阳修文章上窥《史记》,进而窥测六经文章经义,是使八股文‘气息淳古’的正确作法,直接取法六经,很容易误入歧途。…唐宋派、‘前七子’,二者流派统系上看似‘同归’,实则由于在是否经由唐宋古文上溯秦汉经典,存在分歧而体现不同的治学路径。”(《唐宋派与明中期科举文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62卷第2期,2009年3月,页189-195)唐顺之取则于欧阳修者,主要正在其有法可循;但欧阳修之取法于司马迁者,诚如苏轼所论:“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孔凡礼典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月,卷10,页316)在于其记事之生动鲜活。然而,王夫之曾经批评唐顺之此类作法太戏剧性、容易流于庸俗:“经义之设,本以扬摧大义,剔发微言,…若荆川则已开诤语一路,如《曾子养曾皙》一段文,谓以余食与人,为春风沂水高致。其所与者,特家中卑幼耳;三家村老翁姬,以卮酒片肉饲幼子童孙,亦嚶嚶之狂士乎?诤则必鄙倍可笑,类如此。此风一染笔性,浪子插科打诨,与优人无别。有司乃以此求士,可谓之举国如狂矣。”(《夕堂永日绪论·外编》,页11610)。

⑯王夫之曾经批评这些措词与阳明心学之发展有关:“良知之说充塞天下,人以读书穷理为戒。故隆庆戊辰会试,《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文,以不用《集注》,由此而求之,一转取士,教不先而率不谨,人士皆束书不观。无可见长,则以撮弄字句为巧,矫吟褻吃,耻笑俱忘。…乃至市井之谈,俗医星相之语,如‘精神’、‘命脉’、‘遭际’、‘探讨’、‘总之’、‘大抵’、‘不过’,是何污目聒耳之秽词,皆入圣贤口中,而不知其可耻。”(《夕堂永日绪论·外编》,收录于《船山遗书全集》,第20册,页11597-11598)有学者指出唐宋派与阳明心学的关系:“实际上,归、唐、王、茅所标举的道,与唐宋文家的传统儒道有很大不同。与唐宋文道的经典、神圣、辅时济物相比,它们与心学关系紧密,更加强调人的创造性与个性,也更接近日常生活,已经从崇高走向庸常,具有一定的近代色彩。他们的散文由家国天下向世俗生活位移,正与这种道的变化相同步。”(《从神圣到庸常:“唐宋派”文道的新变》,罗书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9卷第4期,2013年7月,页94-97)

⑰《与茅鹿门知县二》,收录于李壮鹰主编:《中华古文论释林》,明代,上卷,页379-381。左东岭认为此篇撰写时间当为嘉靖二十四年,唐顺之三十九岁之时,从内容上来看,“属于受阳明心学影响下的产物”。(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参考文献:

- [1]张廷玉等.明史·卷285(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01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808-809.
- [2][3][6]制艺丛话[Z].上海:上海书店,2001.65,64,230-231.
- [4][5]进四书文选表·凡例(《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二)[Z].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6.286.
- [7]夕堂永日绪论·外编(收录于《船山遗书全集》,第20册)[Z].台北:中国船山学会,1972.11593.
- [8]评胡定,《逃墨必归于杨一章》,《钦定四书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1册,196.
- [9]评唐顺之,《有故而去五句》,《钦定四书文》,176.
- [10]评归有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章》,《钦定四书文》,88.
- [11]评唐顺之,《君子喻于义一节》,《钦定四书文》,98.
- [12]评归有光,《大学之道一节》,《钦定四书文》,75.
- [13]评唐顺之,《颜渊喟然叹曰一章》,《钦定四书文》,105.
- [14]评许孚远,《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一节》,《钦定四书文》,118.
- [15]评唐顺之,《此之谓絜矩之道合下十六节》,《钦定四

书文》，79-80.

[16] 评瞿景淳，《道也者二节》，《钦定四书文》，133.

[17] 唐顺之，《文编序》，《荆川先生文集》，卷10.

[18] 《〈荆川集〉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72，集部别集类25，第4册，548.

[19] 张廷玉：《明史·文苑传》，1875.

[20] 方苞评唐顺之，《尽信书一章》，《钦定四书文》，194.

[21] 吕留良评唐顺之《晋人有冯妇者一章》，《唐荆川先生传稿》，《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1册，516.

[22] 方苞评唐顺之，《入公门一章》，《钦定四书文》，107.

[23] 评唐顺之，《匹夫而有天下者二节》，《钦定四书文》，

179.

[24] 评唐顺之，《昔者太王居邠合下二节》，《钦定四书文》，165.

[25] 评唐顺之，《吾与回言终日一节》，《钦定四书文》，89.

[26] 评唐顺之，《颜渊喟然叹曰一章》，《钦定四书文》，

105.

[27] 《三仕为令尹六句》，《钦定四书文》，99-100.

[28] 评唐顺之，《三仕为令尹六句》，《钦定四书文》，100.

[29] 评唐顺之，《可以言而不言二句》，《钦定四书文》，197.

[30] 评王樵，《子张问明一节》，《钦定四书文》，117.

[31] 《纯仁任子时文序》，载《存砚楼二集》，卷九，559.

[32] 《钱鹤滩稿》，收录于《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俞长城编选，清康熙刻本，卷首《题识》.

[33] 评唐顺之，《此之谓絜矩之道合下十六节》，《钦定四书文》，79-80.

[34] 评唐顺之，《吾与回言终日一节》，《钦定四书文》，89.

[35] 唐鼎元.明唐荆川先生年谱[M].北京：北京图书馆，1999年，民国二十八年武进唐氏刊本.

(责任编辑 王伟宜)

吴中博雅传统与吴宽的古文、时文 “适相为用”说及其文本实践*

李 柯

摘要:吴中文坛切磋艺文、趣尚博雅的文化景观在历经元末兴盛、明初萧条后,于弘治、正德间复苏,吴宽、王鏊、祝允明、文徵明、唐寅、桑悦、顾清、钱福等吴中文士率先以地域群体自觉的姿态,深刻检讨科举文风,其中的许多人还将古文作为解决举业困境的重要资源有意识地引入时文领域。吴宽所建构的古文、时文关系较具代表性和先导性。“于书无不读”的学习行为所积蓄的知识储备是吴宽创造性处理古文、时文关系的先决条件;对以虚文应试的现象、科举考试内容,以及时文文体本身的批判性检省则是吴宽古文、时文关系说的提出语境。在此基础上,吴宽非但明确要求时文写作须借鉴古文传统,还认为两者亦可相互补益,“适相为用”。吴宽还通过时文写作实践将对两者关系的理解诉诸文本,其古文、时文在风格形态上具有一致性。

关键词:吴宽;时文;古文;吴中博雅传统;文本实践

一、吴中博雅传统与举业检讨的群体自觉

元末至正,得益于战乱间的相对承平与张士诚集团的庇佑、笼络,并受富庶地方经济的推动,自古风物清嘉的江南吴中形成了切磋艺文、趣尚博雅的文化景观^①。

其地名士荟萃,雅会日兴。至正八年(1348),以昆山顾瑛所构宅园玉山草堂为活动空间的玉山雅集已盛况空前,是年“二月十有九日之会为诸集之最盛”^②。当时,“四方文学士河东张翥、会稽杨维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张雨、于彦、成琦、元璞辈,咸主其家。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暨饴馆声

伎,并冠绝一时。而德辉(顾瑛)才情妙丽,与诸名士亦略相当”^③。随后,由方国珍势力等引发的战乱对吴中地区的实际影响并不大,雅集之风犹兴。据《列朝诗集》、《明诗纪事》、《草堂雅集》、《玉山名胜集》、《元史》、《明史》等史料考证,参与玉山雅集者,既不乏张翥、杨维禎、柯九思、李孝光等异地名流,袁华、徐达左、顾晋、郟韶、郭翼、繆侃、释良琦、束宗庚、瞿智等众多吴中文人亦活跃其间。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诗文、戏曲、书画、音乐、收藏等易于表达文人情性,个体、个性色彩浓厚的艺文活动愈益成为吴中文士的尚好所在。

作者简介:李柯,男,湖南武冈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后,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科举与文学、明代图像与文学、上海地域文学与城市文化、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海 200241)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李流芳与晚明文艺思潮——以文本和图像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史考察”(项目编号:15YJJCZH079);2015年度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嘉定文人李流芳与晚明文艺思潮——以文本和图像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史考察”(项目编号:15ZS086);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预研究项目“明代古文与时文之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16QN020)的研究成果。

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攻占平江,顾瑛“仓卒奉母避地于湖州之商溪”^[4],张氏所部则“兵入草堂”^[5],玉山雅集由是日稀。然而,张吴政权为了稳定局面,“又好招延宾客,所赠遗舆马、居室、什器甚具”^[6],“故海内文章技能之士,悉萃于吴”^[7],“凡不得志于前元者,争趋附之”^[8]。张氏属僚亦能礼贤文士,其参政“(饶)介之为,人,倜傥豪放。一时俊流,如陈庶子、姜羽仪、宋促温、高季迪、陈惟寅、惟允、杨孟载辈皆与交,衍(姚)广孝亦与焉”^[9]。在张士诚集团相对宽和的文化政策下,吴中风雅依旧能在元季兵燹中得以续存。

逮至明初,由于蒙元、张士诚政权与朱元璋间存在的政治对抗,以及朱明王朝对于无益集权统治、有悖理学思想的个性思维、娱情文化的压制,前元特别是张氏所笼络的吴中文人遭到残酷打击,高启、王彝、徐贲、张羽、杨基等皆因此丧生,顾瑛亦于洪武元年(1368)被发配临濠,元末建构的吴中文化格局就此濒于瓦解。然而,此地既有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因为政治的高压而彻底断绝。在历经了洪武至洪熙年间的潜沉之后,宣德以来,随着文网渐宽,吴中文化逐步得以再生,陈继、刘昌、刘珏、王璠等吴中人开始崭露政坛,亦且皆具文名。至成化、弘治间,吴中艺文已呈复苏态势:

其在本朝宪、孝之间,世运熙洽,海内日兴于艺文,而是邦尤称多士。于时若杜用嘉、陈孟贤二公,以高年为诸儒倡率,最先有名;继则先生与贺美之、都维明、楼仲彝、沈启南、史明古辈,相踵而起。数君子者,虽其造诣或殊,然大抵博雅有文,行义修洁,出入则古衣冠,人望而起敬。^[10]

从陈继弟子杜琼、其子陈宽到沈周、史鉴、都穆等人,均接续了吴中文化的“博雅”传统,大抵取资广泛,博综古今,如赵同鲁,“自六经诸子至天文地理、黄帝岐伯、神仙养生之说靡不涉猎,为文下笔数千言,滔滔莫御”^[11];朱存理“居常无他过从,惟闻人有奇书,辄从以求,以必得为志。或手自缮录,动盈筐篋。群经诸史,下逮裨官小说、山经地志,无所不有,亦无所不窥,而悉资以为诗”^[12];沈周则“凡经传子史百家、山经地志、医方卜筮、稗官传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13]。

许多吴中文士对待文化的博洽态度与当时在科举考试的制度框定下,他地文人多唯四书五经及程朱理学是尊的狭窄趣识大相径庭。而知识构成、文化背景往往决定着主体意识,因此随科举流弊日益累积,至弘治、正德间,该地士人吴宽、王鏊、祝允明、文徵明、唐寅、桑悦、顾清、钱福等正是基于吴中博雅传统所生成的知识结构,率先以地域群体自觉的姿态,深刻检讨科举文风,对科举考试的范围、内容,甚至时文文体本身采取批判态度。王鏊即不满时文之“割裂装缀,穿凿支离”,建议参鉴唐代以经义取士的明经科和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二科并行”^[14]的做法,“于进士之外别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类,必兼通诸经,博洽子史词赋”^[15],“有官、无官皆得应之”^[16],这样便可为国家选拔更加多元化的人才类型开拓门径,弥补明代科举八股取士之有效性的不足。而“兼通”、“博洽”诚乃吴中文化传统赋予王鏊的基本素养,也是他依傍于自身知识结构而做出的必然选择。顾清“以明道德、通世务为为文之要,以深怪险僻、雕刻浮藻为为文之病”^[17],建议有司衡文取士务必“崇雅而去浮,剪华而取实”^[18];桑悦斥责“后世以空言取士”^[19],“惟四子一经是鏖、是蠹,甚至章句初通而伦魁已得”^[20]的乱象;王宠亦谓士子“攬摭经传,苟以徼于有司,其尤疵者口耳乎帖括,剽裂乎佔毕”^[21];祝允明更是直接抨击自宋以来作为取士之本的“道统性理之学”^[22],并认为“诏诰表内宜增科二道判语,须求用事精博,词文华缛”^[23]。以上诸位皆能立足吴中博雅传统,从各自的理解与反思出发,针砭当世举业之虚浮。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许多吴中文人还利用学养上的优势,将该地域群体知识结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古文作为解决举业困境的重要资源有意识地引入时文领域。古文、时文的关系就此开启了新的建构、表述过程。

吴宽、王鏊、祝允明、文徵明、唐寅、桑悦、顾清、钱福等博雅之士皆以古文辞为擅。“初在郡学,御史山阴司马璠按直隶,檄郡学有博学能为古文词者,免课书,更殊礼遇,郡以允明当”^[24];文徵明则自称:“弘治初,余为诸生,与都君元敬、祝君希哲、唐君子畏倡为古文辞。”^[25]古文辞方面的深厚功底及其博洽的文化修养促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认识到要改变时文

文风因其固有功利属性而导致的虚饰造作,就必须以理想形态的古文作为药引,从精神理念、写作法则,乃至语言形式诸方面对时文进行逐一改造。通过相关的理念申张、创作示范,以古文为时文;或倡导古文选本的刊行,以“使里巷童蒙一展卷而得古人立言之法,区区时文虽无事焉可也”^[26]。

在这一地域群体中,尽管许多人以古文救时文之弊的具体内容、方式手段不尽相同,但以激活古文学辞的时文功能为己任的文化诉求是大体一致的,完全可视作一种群体行为和群体自觉。此其中,吴宽较早介入文风批判与文体检省,其所重新建构的古文、时文关系亦较具代表性和先导性。

二、吴宽的古文、时文“适相为用”说

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南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成化四年(1468)举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侍讲孝宗东宫,孝宗即位,以旧学迁左庶子,预修《宪宗实录》,进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卒于官,赠太子太保,谥号文定。有《家藏集》。《明史》本传载:“宽行履高洁,不为激矫,而自守以正。于书无不读,诗文有典则,兼工书法。”^[27]通过“于书无不读”的学习行为所积蓄的知识储备,特别是在诗文、书法等艺文方面的修为,乃吴中文人最显著的博雅标识,这也成为吴宽创造性处理古文、时文关系的先决条件^[28]。

科举考试设定以后,很快便确立为有明一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作为科举制度的直接受益者,状元出身的吴宽并没有对这一取士选才的制度本身表示质疑。他说:“国初右武事,上民功,士之出为世用者不限以科第。至于永乐纪元,民庶且富,文教大兴,龙飞初科取士,倍蓰于前。一时绩学馆阁、试政方州者,多其人。至今言进士科者,首称之。盖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磨砺天下,而为此盛举耳。”^[29]科举取士有利于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更重要的是其所包含的制度化人才甄选机制推动并维系着国家的稳定与兴旺,因而被吴宽视为“盛举”。成化二十三年(1487),吴宽主典会试。对于自己能共襄此番“盛举”,他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皇明有天下百二十年于兹,文教所及,无间遐迹。士怀负才美,以幸际盛世,益自磨濯,以兴于是,举于乡而来会试礼部者,翁

然咸集。上命文学重臣充考试官,而滥及臣宽。”^[30]典试取才的使命感更促推着吴宽以文风扭转作为一己之担当。

正由于特别看重科举考试为国选材的意义,所以在明初以来实用主义时文观紧扣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吴宽主张的是“取科第,出为世用,以行其所学”^[31],同时极力批判以虚文应试的做法:

然昔尝怪宋苏洵以文妙天下,顾于当时之文,若不足其日盛者。夫文载乎道,道因文而凝,不因文而散,而洵之言若此,岂不以世之所尚者文,则所立有大于此者,将分其力,夺其志,及其弊也,不几为浮华之言乎?夫浮华之言,荡然无益于世,其体裁类俳,足以惑人,是以君子患之。今日所取士岂亦有是乎!盖言与理俱胜,取之;理胜于言,取之。若夫言胜于理,固所谓浮华者,不能取也。然世亦有善于为言,疑若近于理者,一时亦可以欺有司,要之终身不可掩焉。^[32]

反对不能明道,言之无物,于世无益的虚文,并强调以言与理的辩证关系作为衡文取士的基本标准,一方面表达出作者对“文以载道”传统的尊奉,另一方面也说明吴宽看到了时文文体在推行过程中显露的弊端所在,所以才会在这一则跋文中反复申述“足以惑人”、“君子患之”的“浮华之言”对理道的危害,力求防止“欺有司”的现象再度发生。

然而,与前人相比,吴宽之于科举八股的反思有着更为深谨之处,即在于他不仅对近世时文文风趋向浮华的现象作出批评,更能循为学博雅之风,对科举考试所涵摄的范围,乃至时文文体本身表达不满:“盖又以士读书止于科第之计,故其学多拘滞不通,乃复置群经诸史若干卷,以资观览,必欲造就人才如昔之盛。”^[33]他认为八股时文作为考试文体,赖以考察知识、能力的有效性范围通常是十分局限的,因此亟须拓宽应试士子的视野与学养,这在当时实属思想超先之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检省,吴宽提出了前人未及的古文、时文关系论。他在《送周仲瞻应举诗序》一文当中集中阐述道:

今之世号为时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对偶,率腐烂浅陋可厌之言。甚者指摘一字一句以立说,谓之“主意”。其说穿凿牵缀,若隐语然,使人殆不可

测识。苟不出此,则群笑以为不工。盖学者之所习如此,宜为人所弃也。而司其文者其目之所属,意之所注,亦唯曰主意者而已。故得其意,虽甚可厌之言一不问;失其意,虽工辄弃不省。其言曰:“吾知操吾法,以便吾之取而已,恶暇计其它。”盖有司之所取又如此。夫国家今日之用人莫急于科第,其事可谓至重矣。重之至则宜慎之至,慎之至则宜精之至。……呜呼!文之敝既极,极必变,变必自上之人始。吾安知今日无若宋之欧阳永叔者而一振其陋习哉!吾又安知无若苏、曾辈出于其下而还其文于古哉!^[34]

吴宽为成化八年(1472)进士,这篇撰成于成化七年(1471)三月望日的序文既是为其友人周仲瞻应举而作,也真实反映出未第时吴宽的内心状态和思想诉求。羁于场屋如身陷囹圄的他对于“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对偶”的八股文体尤为反感,认为其主要弊害在于割裂为文、穿凿附会,“率腐烂浅陋可厌之言”,而“司其文者”却以此来取录科第,因此他说“文之敝”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么,何以有效地应对这样的困境呢?前人并没有明确提出“极必变”的“变”究竟在哪里。对此,吴宽却能发人所未有。他不再从时文妨碍古文抑或古文妨业的视角出发,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而是通过表达有如欧阳修、苏轼、曾巩者出而起振陋习的企盼间接表露出以欧阳修、苏轼、曾巩诸家古文来补救时文之弊的观点。

吴宽对时文文体本身率先发难,不仅明确要求时文写作须借鉴古文传统,还认为两者亦可相互补益,“适相为用”。正如他在《容庵集序》中所论:

乡校间士人以举子业为事,或为古文词,众辄非笑之曰:“是妨其业矣。”噫!彼盖不知其资于场屋者多也。故为古文词而不治经学,于理也必闕;为举子业而不习古作,于文也不扬,二者适相为用者也。乡贡进士谢君少游郡学,即好古文词。既取乡贡,不幸未仕而卒。幸其子昞及其二孙雍、睦能承其家,尝痛其父祖早世,而无所传,搜篋中得遗文数篇,将粹之以自慰。盖君没于景泰初,至今已五十年,吴中举子何啻数百人。其间登高科、跻贵仕,以功名显者,固有之,余子皆寂然无闻。而谢君为当时所不好者,独传于人,不知君者读之,犹知有其人。而若不死者,则古文词之为用,岂特资于场屋而已?睦方为邑学

弟子,介其友陈维佑持君遗文来请一言。予不及识君,窃叹君所传者止此,使更活数十年,其成就当如何哉!聊书以还之。君讳会,字惟贞,吾长洲人,以号“容庵”故名其集云。^[35]

在吴宽眼中,举子业、古文词并不是看似简单的妨碍和被妨碍关系,而是相辅相成、互为体用的关系。“古文词而不治经学,于理也必闕;为举子业而不习古作,于文也不扬”,阐释经义有助于提高古文写作的逻辑能力和理论水平,习学古文经典,更是“资于场屋者多也”。正因如此,他对同乡进士谢会游郡学时,修习古文词的做法予以肯定,对“其学不专治进士业,兼能古文词”^[36]者尤为钦佩,对苏州府儒学教授刘先生于“经学之外为古文词,典雅得法,有曾王遗意”^[37]的事迹亦深表赞同。

吴宽主张时文取法古文,其所谓“古文”的内涵泛指先秦两汉文和唐宋诸家之文。前文业已述及他欲以欧、苏、曾为旗帜,“还其文于古”。对于吴宽为文学宗苏、韩、欧的说法还另有旁证,稍后于宽的王鏊有云:“独念公生颇好苏学,其于长公每若数然者。及其自著,乃独异焉,纡余有欧之态,老成有韩之格,信其学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养可知已。”^[38]其实,吴宽不仅宗尚苏、韩、欧,对于《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文亦加尊奉,正如尝对其有过提携的李东阳说:“公少以经学为程试,既而徧读《左传》、《史》、《韩》、《柳》、《欧》、《苏》诸家之文,欲尽弃其旧业。及为部使所迫,取甲科,官史局,文名满天下,老居台阁,弗究厥施,而终始于所谓文者。”^[39]可见,在吴中博雅传统的语境下,吴宽追踪甚广,其古文、时文关系说中的古文内涵并非狭隘的某家、某派之文,而应广泛指涉先秦两汉以及唐宋时期的诸家经典,具有一定的囊括性与通适性。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吴宽在古文、时文的关系上形成确切定位和深刻认知有其阶段性的发展过程。换言之,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了这样的观念,这一思想理念的发展、成熟与其个人经历有密切关联。

宽年十一入乡校习科举业,稍长,有知识。窃疑场屋之文排比牵合,格律篇同之,使人笔势拘繫,不得驰骛以肆其所欲言,私心不喜。时幸先君好购书,始得《文选》读之,知古人乃自有文。及读《史记》、

《汉书》与唐宋诸家集,益知古文乃自有人,意颇属之。适与诸生一再试郡中,偶皆前列,辄自满曰:“吾足以取科第矣。”益属意古作。然既业为举子,势不得脱然。弃去,坐是牵制,学皆不成,故累举于乡,即与有司意忤。虽平生知友未免咎予之迂,予则自信益固,方取向之《文选》及《史》、《汉》、唐宋之文益读之。研究其立言之意、修词之法,不复与年少者争进取于场屋间。未几,当大比之岁,提学宪臣有知予者乃强遣之,不意名在乡解。又四年,试春官,皆不见黜,寻登进士第。^[40]

宽自小习学举业,就对结构板滞、拘牵笔意的“场屋之文”心生嫌恶;与此同时,对《文选》、《史记》、《汉书》和唐宋诸家文集却青睐有加。由此可见,古文和时文在吴宽的心目中一开始便处于对立状态。随后,他在读书、应试过程中却发现受举业牵制,“学皆不成”,反而会导致累试不中,于是愈益以研究古文的“立言之意、修词之法”为要务,“务博学,攻诗文,不专治举子业,决意不就场屋”^[41]。不久,吴宽“偶于一士大夫家,作《听鸟轩记》一篇,悬之堂上。忽一达官见之,称羨不已,问其人,主人以实对,达官乃苦劝之就试。公(吴宽)从之,遂举于乡。壬辰试礼部第一,廷试状元及第,仕至礼部尚书”^[42]。其乡试第三,会试第一,殿试取为一甲第一名的这一事实确乎证明古文研习诚有利于举业。正是基于以上切身经历,吴宽最终认定古文、时文间实存在着互补互给的关系,并将自己能够登第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长期以来积淀的古文辞涵养。

三、吴宽古文、时文关系说的文本实践

吴宽的古文、时文关系说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不仅如此,他还通过时文写作实践将其对两者关系的深刻理解诉诸文本。吴宽的古文风格与其时文文风具有一致性。王鏊论宽文曰:

文章不难于奇丽,难于醇,难于典则。虽然,醇与则可能也。醇而不俚,则而能畅,殆有非力所至而至者焉,其必由养乎,是难能也。……明兴,作者代起,独杨文贞公为第一,为其醇且则也。公(吴宽)之文视文贞,吾未知所先后,使获当路于时,其功业岂少哉!^[43]

王鏊论文以醇厚典则为高,认为杨士奇之文即

“醇且则”的典范所在,而吴宽之文则能与杨文并举。《四库全书总目》亦曰:“(吴宽)诗文言亦和平恬雅,有鸣鸾佩玉之风。”^[44]而典雅醇厚、内蕴深沉也是吴宽时文的风格特色所在。梁章钜《制义丛话》载:“俞桐川曰:‘每诵吴匏庵宽稿,春容尔雅,不动声色,文之以养胜者。’”^[45]文体不同、风格相合的特点正是古文、时文互为影响的文学理念在吴宽创作实践中的效果呈显。

在其具体的时文作品中,亦可折射出吴宽借鉴古文意蕴、古文笔法以入时文的观念痕迹。如其程文《方里而井一节》:

田制有公私而均授于人,农功有先后而因辨其人。盖井田之制,内公而外私也。治田者先公以供其上,而后及其私,则上下之分不于此而辨哉?孟子以周之助法告毕战也,盖谓井田之法乃郊外可行者。于凡地方一里,制其地以为一井,而每井共有九区焉;画其地以为九区,而每区各为百亩焉。合九区之地,凡得九百亩,以为井田之制;计一井之中,凡为百亩,则有公田之名。故以其外八百亩,分授乎野人而为恒产,则野人固以力耕为业者,必使八家各私其地以自耕焉;以其中百亩,专给乎君子而为常禄,则君子不能并耕而食者,必使八家同出其力以助耕焉。夫田制固有公私之分,而治田亦有先后之序;盖公田君子之所有也,君子在上以食于人者,不先治其田可乎,惟先治其田,则君子之分,秩然以明矣;私田野人之所有也,野人在下以食于人者,当后治其田可也,惟后治其田,则野人之分,截然以分矣。是则田有内外,而其名有公私;名有公私,而其功有先后;功有先后,而其分有上下。井田一行,寓意委曲,周之助法可谓善矣。^[46]

是篇题出《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47]朱熹《四书集注》释曰:“此详言井田形体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为君子之禄,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后私,所以别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据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国中二法,此独详于治野者,国中贡法,当时已行,但取之过于什一尔。”^[48]吴宽即依照孟子原旨和朱子传注围绕井田制的功能、价值进行阐发。

所论皆实务,“叙事详明”^[49],内容充实,绝去虚浮,“井田形体,宛然在目,典雅严洁,后人必不能为”^[50],表现出对古代典章制度的精熟和实用主义的写作精神;而由于文章大处着眼,细处着手,所系皆日用民生,故对现实社会亦有启示作用,是以“格高味厚”^[51]。就古文、时文关系的呈显而言,该文同宣德十年(1435)解元,正统十年(1445)会元、状元商辂论井田助法、贡法、圭田、余夫之制的程文《请野九一而助三节》如出一辙,接续了反对六朝浮靡文风,明道致用的唐宋古文的内在精神,亦皆得先秦两汉说理散文之遗风^[52]。吴宽另一制义名篇《子在齐闻〈韶〉一节》同样以神似古文而为人称道,兹录全文如下:

圣人寓邻国而听古乐,学之久而专称其美也。至夫古乐,莫美于《韶》也。观圣人所以学之,与所以称之者,则圣乐之美,圣心之诚,皆可见矣。昔乐有名《韶》者,乃帝舜之所作者也。后千余年,列国惟齐能其乐。孔子在齐适闻其音,想其慕舜之德,其心已极于平日。闻舜之乐,其身如在于当时。故不徒听之以耳,而实契之于心。于凡鸣球琴瑟之类,其声之依永者无不习,以至鼗鼓笙簧之属,其音之克谐者无不考,盖学之不厌也。至于三月之久,而好之甚专也。本乎一心之诚,故当食之际,虽肉味有不知其为美者。何也?其心在于乐,则发愤至于忘食之勤;其志好乎古,则终日且有不舍之笃。彼刍豢何物,果足以悦我口耶?夫既学之而有所得,则称之自不能已。盖谓舜之乐,昔尝识之于《书》,如后夔之所典者,以为犹夫乐也。今习其度数,不意若此其美,则其声之感召,真可致神人之协和也。舜之乐,吾尝闻之于人,如季札之所言者,以为犹夫乐也。今考其节奏,不意若此其盛,则其德之广大,信有如天地之覆载也。其感叹之意,溢于言表如此。然则《韶》非舜不能作,亦非孔子不能知。彼端冕而听古乐,惟恐卧者,可以语此也哉!^[53]

该文题出《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54]朱子集注云:“《史记》‘三月’上有‘学之’二字。不知肉味,盖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尽美又尽善,乐

之无以加此也。故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叹美之如此。诚之至,感之深也。’”^[55]此题深芜,似无从下笔,作者却扣住朱注“学之”二字娓娓道来,举重若轻,直切题意,既恪守法则,又能自然浑成,洒脱畅达,可谓“步骤有法,曲折入情”^[56],古文境界已然自现其中。是故,王巳山评曰:“《史记》于‘三月’上有‘学之’二字,而朱子采之章句,盖非学则下面两层都渺无根据,徒尔心醉神游,亦复何关理要。文特于闻《韶》下实疏‘学之’,最是先辈读书深谨处。通体古澹而意味盎然,亦缘此会心独远也。”^[57]义法昭昭,文情并茂,可当古文一读。

吴宽另有题文《不幸而有疾景丑氏宿焉》,此一琐碎晦涩、轻重难辨的截搭题同样被他演绎得巧妙得体,文气纵恣。方苞评曰:“义意曲尽,骨脉甚紧,有如柳子厚所称昌黎之文,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者。虽隆、万间之灵隼,启、禛间之划刻,岂能过此?以肤浅直率为先辈者,可爽然自失矣。体制正大,不得以题有割截而弃之。”^[58]《明文钞》亦评曰:“自然天成中,巧不可阶,不图化、治时有此。”^[59]以韩愈古文比拟此篇,韩文的雄健跌宕、曲折自如皆为吴宽所得,可为明代后期屡屡出现的截搭题文垂示法门。

参考文献:

[1]按:“吴中”作为一个文化地理学概念,其历史区界有一定的沿革变化。就明代而言,这一概念的指涉范围主要有如下四种说法。第一种为苏州府别称,如“吴中四子”之“吴中”即是,清人亦有持此说法者,清孙从添曰:“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苏州府吴县、长洲县)、虞山(常熟县)、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参详孙从添《藏书纪要?鉴别》(清《昭代丛书》本)。第二种指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归有光《三吴水利全书》即主此说。第三种指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此说出自晚明人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等。第四种指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五府,不名撰者所编《吴中水利通志》行此说。考虑到镇江、杭州二府被纳入吴中区界的说法并不多见,此二府之人物事迹亦未见载于杨循吉《吴中往哲记》(明嘉靖间刻本)、张和《吴中人物志》(明隆庆间张凤翼张燕翼刊本)等方志,故本文从昆山乡贤、古文、制义大家归有光之说,以苏、松、常三府为明代“吴中”,除洪武八年(1375),原属扬州府(路)的崇明县(州)划入苏州府外,约略

相当于元末的平江路、松江府、常州路和江阴州,至正二十七年(1367),江阴州降为县,归属常州府。参详《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康熙常州府志》卷二等。

[2](元)杨维桢.雅集志[A].卷二,顾瑛编.玉山名胜集.明朱存理钞校本。

[3](清)张廷玉等.明史[A].卷二百八十五,列传第一百七十三[M].中华书局,1984.:7325.

[4](元)顾瑛.补释典序[A].卷上,玉山璞稿[M].中华书局,2008.:4.

[5](元)顾瑛.绿波亭记[A].卷五,顾瑛编.玉山名胜集.明朱存理钞校本。

[6](清)张廷玉等.明史[M].卷一百二十三,列传第十一[M].中华书局,1984.3694.

[7](明)文徵明.题七姬权厝后[A].卷二十一,甫田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明)瞿佑.归田诗话[M].下卷“哀姑苏”条.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9](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甲前集“饶右丞介”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0.

[10](明)陆燾.仙华集后序[A].卷一,陆子余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11](明)王鏊.赵处士墓表[A].卷二十六,震泽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明)文徵明.朱性甫先生墓志铭[A].卷二十九,甫田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明)王鏊.石田先生墓志铭[A].卷二十九,震泽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15][16](明)王鏊.拟罪言[A].卷三十三,震泽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18](明)顾清.会试录后序[A].卷二十北游稿,东江家藏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20](明)桑悦.桂阳州新建儒学记[A].卷六,思玄集.明万历二年桑大协活字本。

[21](明)王宠.秦汉文序[A].卷九,雅宜山人集.明嘉靖十六年董宜阳朱浚明刻本。

[22][23](明)祝允明.贡举私议[A].卷十一,怀星堂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明)阎秀卿.祝允明[A].文苑,吴郡二科志.《丛书集成初编》本。

[25](明)文徵明.大川遗稿序[A].补辑卷十九,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59.

[26](明)顾清.古文会编序[A].卷十九北游稿,东江家藏

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清)张廷玉等.明史[M].卷一百八十四,列传第七十二.中华书局,1984.4884.

[28]按:吴宽亦尝遥想乡贤顾瑛的博雅风致,诗云:“神龙飞度石头城,一日吴门失顾荣。池上已亡金粟影,邑中不改玉山名。故人断简重相授,内史高文款与评。栩栩百年真梦境,濠梁还见旧题铭。”并注其末句曰:“仲瑛后迁中都,家于庄子观鱼台傍,题其屋曰‘梦蝶’。”参详(明)吴宽.题元顾仲瑛玉山佳处卷后[A].卷十三,匏翁家藏集.《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29](明)吴宽.吴县儒学进士题名记[A].卷三十二,匏翁家藏集.《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30][32](明)吴宽.丁未会试录后序[A].卷四十一,匏翁家藏集.《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31](明)吴宽.绿野书院记[A].卷三十八,匏翁家藏集.《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33](明)吴宽.许州儒学修建记[A].卷三十五,匏翁家藏集.《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34](明)吴宽.送周仲瞻应举诗序[A].卷三十九,匏翁家藏集.《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35](明)吴宽.容庵集序[A].卷四十三,匏翁家藏集.《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36](明)吴宽.乡贡进士陈君墓志铭[A].卷六十二,匏翁家藏集.《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37](明)吴宽.苏州府儒学教授刘先生墓志铭[A].卷六十四,匏翁家藏集.《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38](明)王鏊.匏庵家藏集序[A].卷十三,震泽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明)李东阳.匏翁家藏集序[A].卷六十四文后稿四,怀麓堂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李东阳云:“吴文定原博未第时,已有能诗名。壬辰春,予省墓湖南,时未始识也。萧海约为致一诗曰:‘京华旅食变风霜,天上空瞻白玉堂。短刺未曾通姓字,大篇时复见文章。神游汗漫瀛洲远,春梦依稀玉树长。忽报先生有行色,诗成独立到斜阳。’予陞辞日,见考官彭数五,为诵此诗,戏谓之曰:‘场屋中有此人,不可不收。’数五问其名,曰:‘予亦闻之矣。’己而果得原博为第一,亦奇事也。”参详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40](明)吴宽.旧文稿序[A].卷四十一,匏翁家藏集.《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41][42](明)陆榘.蒹葭堂杂著摘抄[M].《丛书集成新编》本。

[43](明)王鏊.匏庵家藏集序[A].卷十三,震泽集.清《文

(下转第 79 页)

● 高等教育研究

追求卓越:基于信息化的本科教学改革探索和实践

彭南生 刘建清 胡中波

摘要:文章从理解一流本科教学建设的三个维度出发,论述了推动本科教学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具体关系,并结合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教学建设和改革的实际,介绍了基于信息化本科教学建设和改革的探索经验和体会。

关键词:一流本科教学;维度;信息化

一、一流本科教学建设的三个维度

教育部高教司张大良司长在《创建一流本科教育 培养大批优秀人才》一文中提出:在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中,创建一流本科教育应当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特别是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一项重大使命,成为“双一流”建设实施方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列入其中整体推进。要创建一流本科教育,应当发挥学校的主体作用,抓住教师这个关键,紧扣质量主题。文章指出,“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否办出一流本科教育,有五个最基本最核心的观察点:一是学校是否具有一流的师资队伍;二是学校是否有政策制度保障一流的师资配备到本科教育;三是学校是否把一流学科优势和一流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四是学校的一流科研成果是否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五是学校是否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创新创业人才。这提供了思考一流本科教学内涵的线索。

(一)站在一流大学和一流教育的高度

一流本科教学是一流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教学是开展教育工作的最重要的载体。什么是一流大

学和一流本科教育呢?哈佛大学哈瑞·刘易斯教授在《失去灵魂的卓越》一书中指出:一流大学的灵魂应该包括大学对于学术、学生和国家的责任感、有计划的通识教育、执着于教书育人的本分、强调教育过程和方法甚于教育内容等元素。而对于一流的本科教育,学术界一般认为包括精英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高质量的生源,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研究性的教学模式,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严格的淘汰制度等基本特征。可见,要搞好一流本科教育,就必须抓住一流本科教学这个“牛鼻子”。

同时,要推进一流本科教学,构建一流本科教育体系,也必须站在一流大学建设的高度来搞建设。国家搞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观察世界一流大学和具有一流学科的世界知名大学,都可以看到这些大学都是有一流的本科教育和一流的本科教学的。1998年,美国博耶委员会出台了《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性大学蓝图的报告》(简称“博耶报告”)。其中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提出了明确建议。可

作者简介:彭南生,男,湖北黄陂人,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高等教育管理(武汉 430079);刘建清,男,河南汝南人,华中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校教务管理(武汉 430079);胡中波,男,湖北随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教务处教学研究办公室主任、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校教务管理、中美教育交流史(武汉 430079)

见,本科教育在美国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任何一个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都不会以牺牲本科教育为代价来搞一流大学建设,相反只会大力加强本科教育和本科教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原校长田长霖指出: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以本科教育的丧失为代价的。芝加哥大学规定资深教授必须为本科生设计核心课程,且均要参与相关课程的教学。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在其《回归大学之道》一书中,反思和展望了美国大学的本科教育,并对本科教育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莱斯大学长期致力于卓越的教学,通过提供全面的、一流的本科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交流能力、创业和领导能力。

纵观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一流大学均要建设一流的本科教育。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就以其本科生“学院制”(collegiate system)、“导师制”(tutorial system)闻名全球。所以,我们搞一流本科教学和本科教育必须站在一流大学建设的高度来搞建设。

(二)抓住质量核心和教师关键

一流本科教学建设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空喊口号,它要以质量为根基,以质量为导向,要着眼于解决现实教育教学的质量问题,以教育的真问题、质量的真问题为建设核心。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讲过:“教育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所以不能解决问题的,不是真教育”,“逃避现实的教育不是真教育”。近年来,国家高度强调教育的质量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教育部专门出台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30条意见。本科教学上,教育部出台系列改进本科教学质量的实施意见,连续推行两个五年的“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核心都是为了落实“质量”这个关键核心。所以,我们理解建设一流本科教学、一流本科教育,必须围绕“质量”这个核心。

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教师是关键。没有好的老师,哪有好徒弟?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节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建设“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教师队伍。这是推进本科教学开展教师队伍建设的關鍵。我们要发挥一大批名师在本科教育教学

改革中的骨干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要组建高水平的教学团队,加强教育教学研究,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完善课程体系,编写、使用好教材,开设一批高水平课程。只有把教师队伍建设好,一流本科教学才有希望,才有实施队伍。

(三)发挥主体作用和构建协同育人机制

一流本科教学的建设虽有经验,但没有现成路径可循。每个学校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学校是建设一流本科教学的主体。要充分发动本校师生,发挥本校优势,集中本校资源,按照本校特点,建设具有本校特色的一流本科教学体系。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学术传承和基本特点,也都有自己的教学传统,甚至有的老师还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教学艺术,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技术基础和教学环境的布局,要充分发挥学校主体作用,可以按照“学术、技术和艺术”融合的思路探索本校本科教学体系。

教育教学的目的在于育人,学校各类环境的布局 and 教学的体系都应该服从于、服务于育人这个根本。要推进科研与教学融合、教育与管理融合、技术与教学融合,师生协同、师师协同、生生协同、校内校外协同,构建协同育人的机制,这是实现一流本科教学建设的方式所在。

二、一流本科教学建设需处理好的三对关系

(一)目标和手段的关系

一流的本科教育根本目标是为了培养一流的本科人才。一流的本科人才,我们理解是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较高的人文科学素养、较强的发展实践能力、具有创新精神、适应时代发展、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为了实现这一培养目标,就应有变革教育理念、修订培养目标、改革培养模式、调整课程体系、提高师资队伍、发展实践能力等诸多手段。所以,在推进一流本科教学改革过程中,首先要明确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与之相应的,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和变革措施来培养这样的人才。

(二)主体和致用的关系

在推进一流本科教学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明确什么是本科教学建设和改革的“魂”,什么是本科教学建设和改革的“体”,什么是本科教学建设和改革的“用”。本科教学建设和改革的“魂”

即是指改革过程中的理念转换和思想转变;本科教学建设和改革的“体”即是指本科教学的形态构建和生态塑造;本科教学建设和改革的“用”即是指本科教学的技术依托和手段依靠。解决好了本科教学建设和改革的“魂”、“体”、“用”的关系,才能把握住本科教学建设和改革的落脚点、结合部和发力处。

(三)内生和协同的关系

一流的本科教学建设决不能仅仅局限于本科范围,必须在着力建设好本科教学体系,实现本科教学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具有开放协同的思维,既要解决好内生的问题,即坚持继承创新,做好人才培养工作的扬优与激活;也要坚持贯通共享、协调发展,做好人才培养资源的整合与开放,实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要本研协同、内外协同、多方资源协同、师师协同、师生协同、生生协同,在协同观念下布局一流本科教学改革和建设。

三、华中师范大学的探索和实践

为推进一流本科教学建设,华中师范大学近年来依托学校优势,发挥学校特色,集中校内外资源,致力于探索信息化推动下的以“四个转变”理念为指导的本科教学改革。

(一)信息化背景下人才培养方案的顶层设计

华中师范大学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本着把方法教给学生、把时间还给学生的理念,提出从“四个纬度”全面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努力实现教学理念从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教学内容从以专业教育为主向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转变,教学空间从以课堂教学为主向课内外结合转变,教学评价从以结果评价为主向以结果和过程评价结合转变,即“四个转变”的教学理念。

在此理念指导下,学校从2013年起对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全面修订,全面推进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为主、以问题为导向、以任务为驱动的研究型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将学生修读的课程总学分压缩至130学分,强化教师对学生的指导,要求授课教师对课堂教学进行学习辅导或开展课堂研讨,原则上每2个授课课时配备1个课时的指导时间;突出学习过程评价,课程总成绩中平时成绩最高可达80%;利用三年时间,初步实现教学信息化的基础布

局,教师开辟网络教学空间,必修课建设数字化资源供学生在线学习;各专业应提供一定比例的在线课程供学生修读,学生毕业应至少修读2门在线课程。在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按照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结合、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教育全过程的思路,形成了“通专结合、个性融通、强化实践”的课程体系。

(二)推进信息化的教学改革

华中师范大学是国家教育信息化试点学校,以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学科力量较强,学校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教学云平台、电子双板系统等服务于改革的产品。

构建信息化的教学环境。全力推动无线校园网(数字化校园)建设,建设全天候、全覆盖、全应用的无线校园网,实现“时时能学习,处处能学习”的网络环境布局;布局教师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体化”教学云服务平台,实现资源和服务的“一体化”云端集成式管理,支撑教学空间向课内外结合转变;改造现代课堂教学的教室环境,建设满足信息化网络环境教学的实时课堂直播(录播)系统和先进的电子双板教学系统。

开展云环境教学活动。学校依托信息技术对传统实体课堂进行改革,推进研讨式教学;建设、引进网络课堂、混合式课堂,借助信息技术(“云端一体化”的教育云服务平台),推动交互式、体验式、混合式教学。学校教学形态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并存。传统实体课堂、网络课堂、混合课堂等课堂形态多元并存。分三年左右时间完成必修课数字化资源建设。根据“优势互补、共建共享”原则,引进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东西部高校联盟、超星尔雅慕课、“两岸四地”台湾、香港地区高校等开放共享课程,合力建设和使用多元共享的信息化教学资源。牵头湖北教师教育联盟建设,部分优质教学资源与湖北教师教育协作体实现共享。

促进师生能力发展。学校着力建设和紧密依托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从2013年起,用三年时间共开展1849人次的骨干教师培训,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能力是培训重点。此外,常年开展教学咨询、教学工作坊、教学沙龙、教学午餐会、新进教师训练营(领

航服务)、教学精进训练营、教学名师论坛等教学能力提升和交流活动。为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学会运用自主、合作、探究、实践(体验)等方式学习,从2015级开始开设新生研讨课程,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使其初步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熟悉资料(或实验数据)搜集、解读、运用的能力,把方法教给学生。

推动管理制度创新。全面改革教师教学、教学管理等评价方式,实行目标管理考核制度,服务、推动创新型人才培养。教师教学评价从以结果评价为主向过程和结果评价相结合转变,注重教学相长。既注重教师对学生学习和生活过程的引导,教会学生“学会生存、热爱生活、珍爱生命”(“3生”),又特别注重学生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的“自主学习(self-learning)、自助服务(self-service)、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3s”)。在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下,学校采取学院前期投入,学校认证后奖励资助的方式进行数字化课程建设;同时,引导、鼓励学院按相应系数(一般是传统课堂工作量的1.5倍)计算开展信息化教学改革的教师工作量。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职称评聘等政策上对在教学改革方面表现突出的教师予以倾斜。学校出台了适应研究型教学的新的教学评价体系和鼓励开展信息化环境下教学创新的评价体系,推出了教学创新奖,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本科“教学创新奖”评选工作。建立了新的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从教学态度、课程资源建设情况、教学研讨与习题测验、教学效果等方面对教师的课堂教学和通过网络指导学生学习的情况进行整体评价,课程资源、课堂教学、网上学习指导是评价的重点,体现了对教学过程的重视。学校推出教学节,营造“重视教学、崇尚创新”的教学文化氛围,推进教学改革。

(三)深入实施卓越数字化教师培养计划

学校承担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发挥信息化教学优势,致力于培养卓越数字化教师。

学校卓越中学数字化教师的培养目标是:为中学培养一批恪守职业道德,具有教育改革与创新精神,特别是能通过学科教学切实服务与推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实施信息网络环境下面向真实问题教学的卓越数字化教师。按照目标设计,培养的卓越中学数字化教师是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学习过

程的导学者,教学资源的开发者,教学方法的创新者,教育教学的研究者和教师专业发展的终身学习者。

构建“五位一体”的协同机制。为实现卓越教师的培养,学校按照地方政府、教育企业、高等职业院校、科研机构 and 中小学校五个方面协同培养的思路开展相关改革。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实践调研,出台相关的支持协同培养的政策,提供相关的经费保障,引导、推动和调控机制运行;高校主要通过与科研机构、教育企业等开展合作,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引入最新的信息技术,同时,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制订相关培养方案,与中学建立相关实习实践基地,实现数字化教师的培养目标;教育企业则主要是为高校和中学数字化教师培养改革提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可靠产品;科研机构主要发挥研究优势,研究信息技术与高校以及中学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相关培养路径和研发相应的技术支持产品,为高校和中学教育教学改革以及政策的制订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支持;中小学校则主要与高校合作,承担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需求调研基地、过程参与基地、实践反馈基地和成果检验基地等功能,实现全过程的协同一体。

探索协同改革的改革路径。在“五位一体”的模式下,学校与地方政府、教育企业、科研机构、中小学校一起协同制订培养目标,协同设计课程体系,协同建设课程资源,协同组织教学团队,协同建设实践基地,协同开展教学研究,协同评价培养质量。实施进校二级选拔和试点高中AP课程先修培养制度;以综合与交叉为特色优化设计教师教育课程体系,通过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善课程结构,培养德才兼备的卓越教师;按照实践导向设置教学内容,重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主线贯通的实践教学体系,提升师范生职业素养;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促进教学方法变革;推进本硕一体化、职前职后一体化;建设信息化学习平台、数字化实习实践平台;加强教师师德修养教育,提升在职教师素养和能力;引进国内外高端人才,投入教师教育改革,加强国际合作,构建高校与中学互动、教育企业等参与的教师教育师资共同体。

此外,华中师范大学还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专业主干课程建设、研究型教学模式探索、大学英语公共课程分级教学、大学体育俱乐部教学制度、新生研讨课程建设、大学生计算机能力认证制度、本科学分收费制度、学习成绩评定和管理制度、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文化素质教育等方面加强改革和实践,形成了本科教学系列改革工程,致力于按照一流本科教学建设的要求全面推进各项改革。通过几年的改革实践,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今后,将继续着力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按照“创新融入教学、创新引领创业、创业融合专业、创业带动就业”创新创业融入教育全过程的思路进一步推进和实施创新创业教育;二是进一步按照“继承、创新、贯通、共享、协调”的思路推进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及留学生教育等的培养衔接,构建“大教育”融通培养体系;三是进一步按照“魂”、“体”、“用”有机结合的思路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

融合,致力于通过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进一步深度融合推动教学创新和教师教育创新,培养数字化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 [1]张大良.创建一流本科教育培养大批优秀人才[EB/O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321/23/4806549_544175436.shtml.
- [2]哈瑞·刘易斯著,侯定凯译.失去灵魂的卓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3]王强,周刚,朱启超,仲辉.一流大学本科教育的基本特征[J].现代教育科学,2009(5).
- [4]德里克·博克著,侯定凯等译.回归大学之道[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5]刘凡丰.独具特色的牛津大学本科教学管理制度[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12).

(责任编辑 郑芳)

构建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 推进地方院校一流本科教育

黄志刚 钟春玲

摘要:一流本科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能否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主体的高质量人才是检验一流本科教育的标准。地方院校要实现一流本科教学改革与创新,应坚持以生为本的育人理念、坚持人才培养特色、坚持面向区域社会需求,并实现培养模式、教育观念、教学模式上的三个转变。以福州大学为例,阐述地方院校在实施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方面的积极探索及取得的成效。

关键词:协同育人;一流本科;地方院校

2015年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方案(简称“双一流”建设),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一流为目标,引导和支持具备一定实力的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瞄准世界一流,汇聚优质资源,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加快走向世界一流。一流本科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院校,要想在“双一流”建设中有作为,必须特别注重打造一流的本科教育,推进以政产学研协同育人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着力培养一流本科人才。

一、关于地方院校一流本科教育的思考

(一)一流本科教育的标准

多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呈“金字塔”状态:处于塔基的是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劳动者为目标的众多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处于塔身的是以培养支撑社会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的相当规模的一般

和重点本科院校;处于塔尖的是以培养引领社会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的少数一流研究型大学。从社会需求来看,一流人才既包括社会的顶尖精英人才或行业领袖,也应该包括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行业的中坚力量,能否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主体的高质量人才是检验一流本科教育的标准^[1]。因此,一流本科教育并不是少数顶尖一流大学的专利,处于塔身位置的地方院校也可以立足国情、省情,准确定位,以符合本类别社会需求的高质量人才为奋斗目标,致力于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合作意识,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人格健全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

(二)一流本科教育的内涵要求

一流本科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流人才培养理念、一流专业、一流师资、一流课程、一流教学活动和一流管理服务等诸多要素的有机结合体^[2]。在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常态下,地方院校要实现一流本科教

作者简介:黄志刚,男,江西余干人,福州大学副校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高校教育管理(福州 350116);钟春玲,女,福建上杭人,福州大学教务处处副处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校教育管理(福州 350116)

学改革与创新,应做到三个坚持、三个转变:

三个坚持:一是坚持以生为本的育人理念,注重因材施教,开展个性化教育和启发式教学,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选择和立体化发展空间,促进大学生全面成长和个性发展,充分发挥学生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坚持人才培养特色,世界知名大学在本科教育方面都有积淀多年的鲜明特色,如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斯坦福大学的创业教育等,这些名校因在本科教育上的特色追求,成就了世界范围内的一流本科教育。地方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必须坚持人才培养特色,不能盲目跟风追求大而全,要根据自身优势和定位,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三是坚持面向区域社会需求,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从人才培养目标确立、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设置、培养过程实施、人才培养质量检验等人才培养全过程都要充分对接社会和行业企业的需求。

三个转变:一是培养模式从相对封闭的学校教育向开放协同教育转变。以开放办学理念为指导,打通高校与外部组织、高校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藩篱,系统整合学校各项工作,搭建校内外合作育人平台,将人才培养过程中所需的多元化要素纳入协同育人核心地带并发挥应有的功效;二是教育观念从知识传授向能力提升转变。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一体化背景下,高校培养的学生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更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善于多维思考、复杂交流和敢于担当,拥有更为出色的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能力。因此,高校应当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完善人才培养环节,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创业精神,引导学生将知识内化、升华、外显为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教学模式从教师主体向学生主体转变。改变我国高校普遍以学科专业知识体系为主,以教师、课堂、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学生以一种知识探究者身份出现,不再仅仅是以知识接受者的身份存在。教师不再是现成知识的传授者,而应该是问题背景的设计者、研究过程的指导者、学生疑难的咨询者和研究结果的评价者^③。课堂和教材不再

是学生获得知识和能力培养的唯一渠道,与课程紧密融合的课题研究、与专业相关的学科竞赛、与个人兴趣结合的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都可以成为学生学业成长和个人素质拓展平台。

二、实施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是地方院校实现一流本科教育的关键环节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全球科技、教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当代科技创新模式正由传统的线性组织模式逐渐演变成为跨国别、跨区域、跨领域、跨组织的开放式合作模式。

在大学“走进社会中心”的今天,高校的人才培养活动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这一背景下,人才培养工作不在是学校的纯粹的“内部事物”,更不是教学系统的一家之言,而是涉及到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遗产创新等现代大学职能的各个方面,也必然涉及到了社会用人单位。高校的人才培养,是一个多主体协同联动、开放合作的过程,只有政、产、学、研各方面形成合力,形成相对完善的教育系统生态,才能构成完整的人才培养过程,培养的个体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人才培养的质量才能真正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地方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生力军,数量众多,办学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地方大学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层次不断提高,办学特色日益彰显,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性及与区域发展上的密切联系性。与此同时,高校扩招以来,地方院校日益面临经费短缺和生源竞争日益激烈的压力,因此,地方院校要实现一流本科教育的目标,必须在积极进行内部挖掘潜力的同时,注重向外部借力发展,即考虑与地方政府、产业部门和科研院所合作,针对产业科研实践提供科技攻关和技术改造服务的同时,大力变革原有相对封闭的人才培养模式,政产学研联动开展协同育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为教育发展获得持续资金、物质支持,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好的培育平台。

三、政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基本内涵与模式

地方院校实施政产学研协同育人,就是以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为基本目标,主动

适应社会协同创新新模式,大力推进与政府、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主体的全面合作,充分利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在人才培养所需的资金、设备、师资、技术、实践场所等方面的优势,开展各种方式的协同育人,灵活合作模式,丰富合作内涵,通过合作各方资源的融合共享,形成育人合力,构建开放、集成、高效协同育人机制,把以课堂传授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和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的生产、科研和管理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共同服务于学生成长成才。具体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校企合作:面向企业行业实际需求,与企业行业开展合作,利用企业行业在资金、实践环境以及面向市场一线的优势,以实际工程为背景,以工程技术为主线优化设计人才培养方案,采取共建实验室、实习基地,共同制定实施培养方案,共同指导学生实践环节等方式,着力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

校研合作:以提高学生科研创新能力为重点,利用科研机构一流的学科、卓越的师资、雄厚的科研经费、丰硕的科研成果以及先进的科研平台等优势条件,通过开展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育人,以科研平台、科研项目、科研师资、科研方法深化教学改革,实现高水平科学研究与高质量人才培养的相互支撑。

校政合作:开展校政合作,就是利用地政府在资金、区位以及政策引导方面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弥补高校在办学资源、资金方面的紧缺,采取设立专项资金、制定专门的政策等措施,给予高校更多的扶持和引导,以加快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改革进程,增强高校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

校校合作:利用国内外其他高校在办学声誉、办学条件、师资等方面的优势,开展校校合作,采取学分互认、学位互授、师资互派等方式,实施“2+2”、“3+1”等人才培养模式,以达到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级人才的目的。

四、福州大学政产学研协同育人的探索与实践

福州大学是一所创建于1958年,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的国家“211工程”地方院校。近年来,福州大学以深入实施政产学研协同育人为抓手,外引各方优

质资源互融互惠,内促学科专业优化发展,办学实力和活力不断增强,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2010年以来,学校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五年保持在95%以上,就业专业对口率均超过88%,毕业生签约率、就业率位居福建省高校前茅。

(一)福州大学政产学研协同育人主要做法

1.顶层设计开放办校战略。2008年,学校在全校教育思想大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创业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强调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强调与外界紧密合作、借力发展,逐步形成“大学—产业—政府”三重螺旋上升的关系。2012年,教育部与福建省人民政府签署共建福州大学协议,福州大学正式进入省部共建高校行列。2014年,根据福建省委省政府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战略部署,学校制定《福州大学高水平“211工程”大学建设规划(2014-2017年)》,提出实施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开放办校和依法治校“五大战略”,其中开放办校战略中明确指出要推动协同创新,拓展校政企合作办学,通过开放办学,增强体制机制创新的内在动力,实现各种办学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全面激活学校办学活力。

多年来,“开放办校”始终成为学校中长期事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围绕这一重要战略,学校先后与全省九地市市级政府以及闽清县、福清市等县级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形成了省、部、市、县共建的办学新格局;学校还注重与主导行业企业开展联合办学,如与福建ICC基地和相关企业合作复办微电子学专业(2007年),与紫金矿业集团、福建交通运输(控股)有限公司、新大陆集团等大型主导企业合作分别创办紫金学院(2007年)、八方物流学院(2008年)和新大陆物联网学院(2011年);与泉州泉港区人民政府、福建石化集团联合创办石油化工学院(2012年);与晋江市人民政府共建福州大学晋江科教园(2013年)。

通过“开放办校”战略,学校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新举措,创新政产学研合作模式,建立政产学研合作长效机制,充分释放创新创业能量,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为人才培养提供强大支持和动力。

2.创新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1)“预就业”模式。2004年学校与联想集团、东南汽车等10家单位

合作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书,在6个学院开始实施“预就业”培养模式。学院、学生和企业等用人单位之间签订“三方协议”,学院选派指导教师,用人单位选派业务骨干,组成“预就业过程”指导小组,指导和考查学生的专业课程、实习实践、毕业设计等教学环节。学生以预就业形式,一边学习与实习,一边接受工程教育与培训,毕业后直接或优先进入用人单位就业。

(2)“卓越计划”模式。2010年学校以首批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为契机,组织11个工科专业与福建省主导行业企业合作开展试点改革,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增设企业课程、创建双师型师资队伍、共建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实施“专门方案、单独组班、校企联合、双师指导”的“3+1”培养模式,即学生3年在校学习课程,累计1年在企业实习实践和毕业设计,实行校企“双导师制”,主干课程和主要实践环节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突出工程素质与创新能力培养。

(3)闽台高校“3+1”“校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由我校、台湾高校、台资企业三方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联合组建教学团队,联合开展专业、课程、教材等教学资源库建设,联合开展实训基地建设,学生大三赴台湾合作高校学习一年。该模式依托学校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的学科优势,重点培养福建省海洋产业急需的海洋工程及海洋科学领域高级人才,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近海工程专业填补我省海洋工程领域人才培养的空白。

(4)“协同创业育人”模式。学校积极形成“学校主导、教师参与、学生自主、企业介入、政府扶持”创新创业协同育人体系,汇聚各方资源力促创业型人才成长:一是引进台湾创业培训模式,实施“闽台合作大学生创业培训圆梦工程”,举办“台湾优秀创业培训师资队伍授课+政府行业企业专家学者宣讲指导创业政策法规”两段式创业培训班;二是建立跨专业融合、校外内融合、专兼职融合“三融合”的创新创业导师库,聘请职业经理人、企业家、创业成功人士、风险投资人等担任导师,以理论教学、参观交流、创业体验等形式为大学生提供创业指导;三是共建多元化创业实践平台,建立校外创业孵化基地,同时在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近2000m²“福州大学众创空

间”,打造集“创客空间、创新工场、创业实践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学院和研究院”为一体的新型创业孵化器;四是成立“创业校友联盟”,设立大学生创业基金,大力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

3.丰富政产学研合作内涵。(1)专业导向对接产业行业需求。学校积极调整和优化本科专业结构,主动融入福建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改造传统专业,整合相近专业,提升优势专业,培植重点专业,增设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形成了以工为主、理工结合、文理渗透、整体优化、协调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为福建省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学校专业设置与福建省产业发展的契合度较高,在主导产业方面,学校学科专业涵盖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石油化工三大产业,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方面基本达到全覆盖。学校专业建设坚持行业发展需求和学生就业导向,科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将传统以学科知识体系设计为主的培养方案转化为以能力培养体系设计为主的培养方案,对专业发展各重要环节进行系统化综合改革。

(2)育人平台融入企业科研院所资源。学校充分利用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大中型企业以及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多家科研院所的资金设备、科研平台、师资力量、实践场地等优势,通过共享实验室、共建技术研发中心、共建实践实习基地、共育师资队伍、共促科技攻关等措施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着力打造产学研联合发展平台,建立产学研合作发展联盟,避免资源在单一体系内封闭流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互惠多赢”,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好的培育平台。

(3)培养环节引入用人单位参与。校企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联合增设企业课程、联合指导毕业设计、联合监控教育教学质量,人才培养各环节充分引入企业参与。如“卓越计划”试点专业开设至少10学分企业课程,采用基于项目、基于问题的教学方法,学生至少累计有一年在企业进行工程实践,毕业设计全部结合企业工程实践完成;“预就业”企业选派业务骨干,指导学生专业课程、实习实践等环节,及时将考查结果反馈给院系专业负责人。

(4)教学过程融入科研思维。学校教师加强与合作单位的横纵向课题联合技术攻关,把部分课题转化为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来源,及时把自身科研成果、科研方法提炼后融入教材,将国内外研究动向适度引入教学内容,围绕新问题、新方法开展启发式、案例式教学,激发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和思维。设立“专家讲座”系列课程,邀请各行业技术专家介绍最新科研技术或工程实践进展,开拓学生学术视野。实施“双导师”制,校内外科研资源向学生开放使用,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学生可直接参与校内导师的横纵向课题研究,进实验室开展真题科研,也可跟随校外导师参加用人单位项目研发或工程实践。

(5)培养质量注重社会及用人单位意见。坚持开放式办学质量观和质量评价观,主动寻求市场检验和社会评价。一是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构建工程教育与行业协会的联系机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已通过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化学工程与工艺、采矿工程、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已接受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进校考察;土木工程、建筑学、城乡规划专业已通过住建部的多轮专业评估;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环境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列入台湾中华工程教育学会(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认证首批试点专业;二是组织对重点用人单位展开问卷调查,了解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职业技能素质的评价和要求,采集其对学校办学的意见和建议,为今后人才培养工作提供参考;三是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价体系,委托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估与大学生就业能力测评机构—麦可思公司,对2011届大学毕业生开展毕业三年来跟踪调查,从毕业生中期职业发展状况角度改进人才培养工作。

(二)福州大学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成效

1.校内外资源融合不断深化。学校充分发挥合作单位的资金设备、科研平台、实践场地等方面优势,建立了稳定的教学实践基地和科技服务创新平台。目前在电力、石化、电子、信息、机械、建筑等行业和骨干企业建立了389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其中6个为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6个为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与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等40家企事业单位和地方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福州交

通建设投资集团等44家单位共建45个开放式创新平台;在25家企业建立了专家工作站;加入9个产学研联盟;与企业、科研院所共建实验室34个;与校友企业合作挂牌成立10个创业实践基地。联合办学单位共投入了6亿多元用于相关学院办学建设。依托“创业校友联盟”,校友先后创立了“新楚大学生创业基金”、“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奖励基金”等共计4470万元大学生创业基金。

此外,学校积极引入外部师资力量,作为学校师资有益补充,2012—2014年学校聘请了756人次的企业、科研机构及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到校开设专题学术报告;聘请了53名校外企业家、创业者、技术创新专家担任学校创业导师或创投导师;近三学年各专业与企业合作开设283门次专业课程。

2.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不断增强。仅2014—2015学年学生在国际、国内省部级以上大赛中获得各类奖励957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48项,国际级奖项62项;学生正式发表学术论文80篇,其中被SCI、EI和ISTP检索24篇;获准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32项、外观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4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13项。自2008年首届大学生创新论坛举办以来,我校共有15项次优秀论文和展示项目入围,是入围项目最多的福建省属高校。2014届本科毕业生创业率达2.36%,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在校生共运营138个创业项目,实现工商注册48家。

3.学校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加大。学校“预就业”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工程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创新了学生就业方式,荣获第六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经逐步推广,至2015年7月,全校已拓展至12个学院与77家企事业单位建立“预就业”联合培养关系。与紫金集团合作创办紫金矿业学院,成功探索出一种全新的校企深度联合培养工程人才的培养模式——“紫金模式”,即“企业支持办学建设、企业参与办学过程、企业检验办学成效”,获评第四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并被誉为国内产学研深度合作的成功典范。学校“卓越计划”改革经验入选教育部汇编的全国高校“卓越计划”十大典型案例。

学校荣获“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50强”、“全国高等学校创业教育研究与实践先进单位”等荣誉

称号,并在教育部“2014年度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座谈会”及“201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网络视频会议”上,均作为三所高校代表之一做了典型发言。教育部网站以《福州大学多举措深化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为题进行宣传报道。

学校以政产学研协同育人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实践荣获2014年福建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省内外多家高校到我校学习交流改革经验,《光明日报》、《人民网》、《新华网》等各大媒体对学校的改革成效进行了多次宣传报道。

参考文献:

- [1]张建林,吕楠.“一流本科教育”探讨[J].鄂州大学学报.2009(1):62-65.
- [2]王焰新.构建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一流本科教育体系的思考与实践[J].教育研究,2012(10):99-103.
- [3]王洪才,刘隽颖,解德渤.大学创新教学:理念、特征与误区[J].中国大学教学,2016(2):19-23.

(责任编辑 郑芳)

(上接第 68 页)

渊阁四库全书》本。

[44](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一集部二十四[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45](清)梁章钜.制义丛话[M].卷四.清咸丰九年刻本。

[46](明)吴宽.方里而井一节[A].李光地.程墨前选.清道光十年李维迪重刻本。

[47](战国)孟轲.滕文公章句上[A].卷五,孟子.《四部丛刊》景宋大字本。

[48](宋)朱熹.滕文公章句上评注[A].孟子卷五,四书章句集注.宋刻本。

[49](明)钱禧.方里而井一节评语[A].杨廷枢,钱禧.第九册,皇明历朝《四书》程墨同文录.明崇祯八年金闾叶聚甫、张叔籟刻本。

[50](明)杨廷枢.方里而井一节评语[A].杨廷枢,钱禧.第九册,皇明历朝《四书》程墨同文录.明崇祯八年金闾叶聚甫、张叔籟刻本。

[51](清)李光地.方里而井一节评语[A].程墨前选.清道光十年李维迪重刻本。

[52]参详(明)商辂.请野九一而助三节[A].李光地.程墨前选.清道光十年李维迪刻本。

[53](明)吴宽.子在齐闻《韶》一节[A].化治文卷二论语上,方苞.钦定四书文.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春秋)孔丘撰,(三国)何晏集解.述而第七[A].卷四,论语.《四部丛刊》景日本正平本。

[55](宋)朱熹.述而第七评注[A].论语卷四,四书章句集注.宋刻本。

[56](明)唐顺之.子在齐闻《韶》一节评语[A].三编论语上,高塘.明文钞.清乾隆五十三年广郡永邑培元堂杨氏刊《高梅亭读书丛钞》本.按:高塘《明文钞》所录原题为《子在齐闻《韶》一章》,据方苞《钦定四书文》改。

[57](清)王步青.子在齐闻《韶》一节评语[A].三编论语上,高塘.明文钞.清乾隆五十三年广郡永邑培元堂杨氏刊《高梅亭读书丛钞》本。

[58](清)方苞.不幸而有疾景丑氏宿焉评语[A].化治文卷五上,孟子钦定四书文.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清)高塘.不幸而有疾景丑氏宿焉评语[A].三编孟子上,明文钞.清乾隆五十三年广郡永邑培元堂杨氏刊《高梅亭读书丛钞》本。

(责任编辑 王伟宜)

美国高校服务导向型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探析

——以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为例

黎 军 张 帆

摘 要: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教师发展中心致力于服务本校教学、促进教师职业发展、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项目管理模式和灵活高效的运转机制,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各国大学建设服务导向型教师发展机构的典范。本文分析了该中心的机构设置、服务内容、中心特点等,着重探讨了中心为促进教学学术发展而开展的特色教师发展项目。我国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建设仍处于探寻期,亟待在中心的活动设计和组织运行等方面借鉴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教师发展中心的成功经验。

关键词: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教师发展中心;服务导向型

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直接影响大学的教育质量。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丹佛斯基金会(the Danforth Foundation)的资助下,美国部分大学就开始创办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部分高校逐步创办了独立建制的教师发展机构,并开展一系列教师发展活动及特色项目^{〔1〕}。因此,美国的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在世界范围内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公认的质量水准,是各国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建设的模板。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UMass Amherst)教师教学发展中心(Center for Teaching & Faculty Development, CTFD)组织健全、运转灵活,被称为北美四大教师发展中心典型之一,中心在保障阿姆斯特分校教育质量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教师发展中心的机构设置:独立建制,组织结构完善

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教师发展中心可以追溯到1986年莉莉教学人员培养计划,在整合教学

中心和教师发展办公室两个机构的人员和资源基础上,成立新的教师发展机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中心以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为宗旨,开展了诸多项目,包括新教师培训会、工作坊、主体研讨会、午餐会等,鼓励教师进行教学研讨。中心人员构成合理,独立建制,既包括教育专家、教师发展专业人员,又包括教育技术人员和研究生助教等:(1) 专职的服务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掌握了教师发展的专业知识,长期致力于教师发展和教学学术的研究。(2) 兼职工作人员。他们除了在中心担任一定的职责之外,同时也是学校某一领域的教师或专家,在中心主要承担教学咨询的工作,为教师提供专业咨询服务。例如,中心的主任Gabriela Weaver女士是化学系的一名教授,除了承担教学科研工作,也负责监管中心运转。(3) 研究生助教。作为中心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生助教负责协助开展中心服务项目和其他本科生研究项目,并直接参与中心的管理工作。

作者简介:黎军,男,甘肃天水人,兰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学和教育技术学理论(兰州 730000);张帆,男,山东济南人,兰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管理(兰州 730000)

中心的机构设置相对简单,没有具体的工作部门,主要设立的职位有主任、主任助理、副主任、行政助理、教育技术主任、项目协调、新教职主任、研究生助教,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明确具体的分工(表1)^[2]:

表1 中心职位设置及职责安排

职位	工作人员数量	职 责
主任	1	监督项目执行,代表中心参与对外活动。
主任助理	1	负责以管理者为导向的培训项目、学术写作和多样化项目。执行中期评价,课堂观察和教学咨询。
行政助理	1	为中心项目提供后勤保障,管理中心网站。
项目协调员,业务经理	1	监管中心财务,负责教学卓越奖的评选。
副主任	1	领导中期评价,负责一系列内部教师奖励项目,提供教师专业咨询和项目实施评价。
新教职主任	1	负责以新教师为导向的项目管理,开展教学评价,课堂观察及个体咨询。
教育技术主任	1	促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提供教育技术咨询。
研究生助教	4	协助项目开展,协助沉思教育实践计划;执行中期教学评价咨询;协助以学生为导向的中心项目开展。

资料来源:UMass Amherst, CTFD Annual Report [EB/OL].[2015-11-12].<http://www.umass.edu/ctfd/about/staff.shtml>.

二、教师发展中心的服务内容

阿姆斯特分校的教师发展中心致力于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创造重视教学学术的组织环境。在组织运行内容方面,中心主要提供支持教学发展、退隐写作工作室计划、培训会、职业发展支持和多样化奖金计划等内容。同时,根据教师的不同需要,中心会不定期举办其它学术活动,例如,2013-2014学年,中心邀请专家开展了有关时间管理的研讨会;2014-2015学年,中心举办了教职焦点小组讨论会,相同职称级别的教师参与讨论教学问题。由表2可以看出,学校教师参与中心项目的累计参与次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这充分说明教师发展中心提高教师教学能力的有效性和受欢迎度^[3]。

(一)教学发展计划

1.教学大纲咨询。每学年开始,中心会举办一对一的咨询会,中心的教学顾问评价教师的教学大纲,帮助教师更新教学内容,协助教师持续的以学生的

表2 2009-2015年教师累计参与中心项目次数汇总

学 年	项目名称	教学发展	学术写作	职业发展	培训会	奖金项目	教师焦点小组	时间管理	研究生项目	总计
2009-2010		—	236	119	183	515	52	120	—	1225
2010-2011		388	181	44	136	104	—	—	242	1095
2011-2012		468	253	56	184	166	—	—	280	1407
2012-2013		316	200	49	521	383	—	—	237	1706
2013-2014		587	254	109	120	568	—	76	514	2228
2014-2015		704	228	12	153	483	99	—	690	2369

资料来源:UMass Amherst, CTFD Annual Report [EB/OL].[2015-11-12].http://www.umass.edu/ctfd/about/annual_report.shtml.

视角充实教学大纲内容。借助于中心教学顾问的评价,教师将新的建议和内容纳入教学大纲,重新审视教学目标、课程策略、教学任务描述及学生特点等。教学大纲的时效性和科学性有利于教师教学目标的实现,促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实现二者的统一和有效结合。

2.中期教学评价。与学期末的终结性课堂教学评价不同,中心在学年的第四周和第九周之间会进行一次教师申请并保密开展的教学中期评价计划。中期教学评价由中心教学顾问和中心专业顾问负责。其中,中心教学顾问通过课堂调查搜集学生对教师教学的评价;中心专业顾问通过整合、解读学生反馈信息,听取教师的教学目标及教学策略。通过个体咨询的方式,专业顾问针对教学目标为教师提供恰当的教学建议和教学资源,协助教师提高教学能力。具体的教学评价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小组讨论,教师在介绍顾问之后离开教室,顾问将学生分为3-5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学生回答两个开放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最喜欢课程或者教师的哪一方面,另一个是提出课程和教师教学的改进建议,考核过程为20分钟。二是以学生个体为单位,学生需要在15-20分钟之内完成包括3部分的调查问卷,共30题,问卷内容包括课程、教师、整体感知三部分,使用5分量表制^[4]。顾问通过分析评价结果,及时向教师反馈学生对课程的评价,协助教师调整课程内容,实现教学目标。

3.教学沙龙和研讨会。为丰富教师的专业知识,

讨论教学问题,中心在每年1到5月的第一个星期四举办创意教学沙龙活动,学校的教学软件中心、图书馆、信息技术部的工作人员和教师参与关于创意教学思维和教学讨论的系列活动。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教师和各参与部门的工作人员讨论教学思想、教学议题和学术问题,中心会根据讨论结果开展不同主题的教学沙龙。沙龙一般由一位引导者提出一个教学问题或引用一个具有煽动性的活动为开端,引导参与者进行课堂教学反思,最终以参与讨论者选择离开为止。在2014-2015学年,5月份的主题沙龙主要讨论探索积极教学方式的应用,例如,记事板制作、拼图等新教学方式^[5]。参与者在教学沙龙中不仅讨论了新教学方式的有效性,同时分析其危险性,趋利避害,探索促进学生学习和扩大学生参与的创意教学方式。

每个学期,中心会举办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例如,2013年秋季,中心邀请乔治亚大学的研究与教学专家彼得·林赛主持了一系列研讨会,主题包括习明纳教学、十大教学错误、积极授课等。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广泛,为学校的教师和研究生助教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加强沟通与相互了解提供机会和平台。

4. 沉思教育学实践 (Contemplative Pedagogy Practice)。“沉思教育学”(Contemplative Pedagogy)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种新教育哲学,在沉思实践应用与教学过程中,促进学生加深对深度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创新力和注意力。为促进沉思实践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中心组建了研究其应用的研究小组,50多位成员分别来自不同的学科,处于不同的职业生涯阶段,这有利于增强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工作组成员参加每个月举办的例会,中心邀请专家参与其研究过程,协助小组成员讨论教学实践和课程内容。在每次例会开始之前,由学生志愿者带领小组成员进行一次沉思教育实践。沉思实践不仅是一种学习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教学方式,旨在培养教师的自我感知和批判性思维。为了深化对沉思教育学的研究和理解,2015年中心委派5名教师参与社会沉思意念中心 (Center for Contemplative Mind in Society, CMind)

举办的为期一周的暑期培训班,探索沉思实践的可行性,发掘沉思教育学相关学术资源。

(二)退隐写作工作室计划(Writing Retreats)

中心重视教师的学术写作,教师可以根据个体需要选择参与中心创办的多种形式的教师写作工作室。中心在学校图书馆的支持下,设立一间设备齐全的公共教师写作工作室,对学校的所有教师开放,教师可以在工作室进行学术研究、学术写作与备课。此外,中心在图书馆设置了为教师个体服务的小型写作工作室,有利于教师专心学术写作,避免外界干扰。除了设置特定的教师写作工作室,中心每年举办三次关于促进教师学术写作的活动,第一次在春季学期末,中心提供舒适的写作工作室及专业的写作教练指导;第二次和第三次是在每年的1月和8月,目的是鼓励更多的教师参与写作,三次活动都为教师免费提供早餐和午餐。中心创办的退隐写作工作室计划是非常受教师欢迎的,表3显示的教师参与人数也反映了教师写作工作室计划的有效性^[6]。

此外,中心在网站上列出当地的专业编辑和有经验的写作教练,协助学校教师寻求专业意见。通过对写作教练专业、工作经历、研究领域的公示,帮助教师选择适合自己研究领域的写作教练,从而提升教师自身的写作水平。

表3 2010-2014年教职参与学术写作工作室计划人数汇总

学年	教职	助理教授	副教授	正教授	非终身制教职	其他	总计
2010-2011		61	68	20	17	15	181
2011-2012		109	81	29	24	10	253
2012-2013		94	53	36	11	6	200
2013-2014		117	82	29	25	1	254

资料来源:UMass Amherst, CTFD Annual Report [EB/OL]. (2015-11-12). http://www.umass.edu/ctfd/about/annual_report.shtml.

(三)定向培训会

1. 新教师培训会。每年的秋季学期开始,为帮助新教师尽快适应大学教师角色,了解学校基本信息,中心会主办一次全校层面针对新教师的培训项目。在培训会上,中心首先介绍学校基本信息、主要的学

术部门等。为营造轻松的气氛,培训会一般以学校和周围社区为主题的知识竞赛为开端。然后,教师座谈小组会讨论如何开始成为一名教师、研究者和阿姆斯特公民。中心邀请有经验的老教师在培训会上分享自身经历,传授有关教学、职业辅导、学术研究等策略和经验。在午餐会上,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代表、信息技术部代表、图书馆代表等采用“反向渐进”(Reverse Progressive)的模式表达对教师职业发展与学术研究的支持。最后,学生代表带领新教师参观学校,了解学生的居住和生活信息。

2.助教培训会。研究生助教作为大学教师的后备人才^[7],也是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所服务的重要对象。在阿姆斯特分校,助教培训会是唯一的一项针对全校研究生助教发展的项目。中心每年会联合学校研究生院举办一系列针对研究生助教职业发展的培训会,并邀请教育学专家参与助教的培训会。通过培训会,研究生助教掌握基本的教学技巧,提高教学技能,获得在学校团体的归属感。比如2015年,中心邀请一位社会学博士参与研究生助教的培训,通过参与一系列的工作坊和一对一咨询促进研究生助教的职业发展。

(四)职业发展项目

中心支持没有获得终身任职制的教师建立强大的职业网络,在阿姆斯特分校内外寻找不同的职业辅导伙伴,相互进行职业指导,从而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中心将这种教学专业网络的建立称之为“双向职业辅导”(Mutual Mentoring)。针对职业辅导,中心创办了两个支持项目,为教师创建职业发展网提供资金和专业指导。此外,中心支持学术部门新领导的领导力培养,帮助新领导接受新的领导理念。同时,针对没有获得终身教职资格的教师,中心通过提供网络资源和举办培训会帮助教师明确自身职业发展方向。

1.职业辅导项目。中心创办的两个支持教师职业辅导的项目,分别是梅隆双向职业辅导团队奖金计划和梅隆双向职业辅导个体奖金计划,两个项目为教师职业辅导的团体和个体项目提供为期一年的资助。前者为在学院、系别、跨学科、跨机构层面设计的教师双向职业辅导项目提供经费;后者为有利

于扩大教师个体职业网络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在学年末,针对两个奖金项目的接受者,中心执行一次包括14个检验题目的综合性网上评价。在2013-2014年的评价结果中,针对梅隆双向职业辅导团队奖金计划,86%的反馈者称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项目,而98%的团体项目参与者回应他们的专业辅导网将会在一年的项目结束后继续发挥作用^[8]。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在咨询会、访谈中分享关于职业辅导项目的成功经验。

2.领导力提升计划。为提升学校的领导力水平,每年中心会召集学校院系的主任、教务长等新领导参与为期一年的实践共同体计划,旨在提高学术部门的管理有效性。在项目实施之前,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与新领导会谈,了解个体的发展需求,明确不同情形下个体发展的所需资源。根据会谈结果,中心会安排一系列不同主题的研讨会,邀请有经验的领导或专家主持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一般包括:有经验领导的建议、实际预算、时间管理、经费筹集、冲突管理、晋职、组织评估和研究资源供给。新领导参与计划内不同主题的系列研讨会,有利于加深对领导力内涵的理解,提升自身领导水平,从而提高学校决策的科学性。

3.终身教职筹备工作坊。在大学教师发展过程中,获得终身教职资格对于大学教师来讲是至高的荣誉。因此,和其它美国大学一样,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教师也注重了解获得终身教职资格的过程和要求。在阿姆斯特分校,不同院校对获得终身教职的资格规定不同,中心联合院系设计不同主题的工作坊,为年轻教师如何获取终身教职资格提供指导。同时,中心也为教师提供针对如何获取终身教职资格的网络资源,例如,中心工作人员整理学校教务长关于此主题的经验和建议,并将其公布在中心网站,供有需要者查阅。基于此,不同学科的教师可以明确自身获取终身教职资格的过程和进度。

(五)学术奖金项目

为支持学校教师的教学和职业发展,中心提供了一系列的学术奖金项目,主要包括卓越教学奖和莉莉卓越教学奖金项目,另外还包括由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资助的团体和个人“双向职业辅导”奖金

项目、夏季写作奖金项目、由马萨诸塞教授团体支持的小额度弹性教学奖金项目等。

1.卓越教学奖。为鼓励教学学术,营造重视教学的大学环境,中心每年会联合教务长办公室主办卓越教学奖评选项目。教职和研究生都可以参与该奖项的竞争,由全校学生和校友提名候选人,通过中心专家和教务长办公室的审核,最终确定获奖人员,一般每年有4名教师,2名研究生获得此奖项。卓越教学奖也是学校评价教学的最高奖项,获奖人员除了会得到奖金奖励,还会在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学典礼上接受颁奖。

2.莉莉优秀教学奖金项目。莉莉优秀教学奖金项目支持有前途的青年教师在为期一年的特殊合作项目中培养卓越教学的能力,每年80%的教师会通过创新和重新设计课程参与该项目。该项目的工作人员会通过课堂参与、教学材料审查、学生反馈等渠道评价教师教学和学生过程。参与教师会参加项目的年度会议和每个月以大学教学为主题的研讨会。在成功完成项目活动并支持课程发展实践之后,中心会支付参与教师所在院系7000美元的奖金作为时间成本的补偿,教师也会获得部分研究成果奖金。

三、教师发展中心的特点

(一)服务性

美国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充分体现服务理念^[9]。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运行内容和机构设置充分体现出中心是以服务为导向的教师发展机构。中心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内容,以期改进教师的教学,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在满足大部分教师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注重提供个性化的服务。首先,中心针对新入职的教师和返职教师,中心在网站上公布一系列相关问题,解答教师疑惑,促进其尽快适应教师角色,提高教师的组织归属感。其次,中心会根据教师个体教学问题,提供一对一辅导,并对辅导内容进行保密。最后,中心所提供的项目服务内容都是指向服务教师教学和生活,促进教师职业发展。

(二)专业性

中心的专业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心提倡教学学术研究,促进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过程,

提高大学教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基于对教师教学的反思,中心每年发表相应的教学学术研究成果,以期促进教学学术发展。2012-2013学年,中心发表7篇期刊文章,2篇图书章节(Book Chapter)及1篇书评。2013-2014学年,中心发表4篇期刊文章,3篇图书章节及2篇书评。其次,中心开展多样化的教学评价,持续为教师教学过程提出建设性意见,协助教师改进教学。最后,针对教师的个体需要,中心专业人员为教师发展提供专业性的解答,从学科特点的视角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

(三)创新性

作为服务教师发展的机构,中心不仅关注教学学术的研究,同时注重教学方式的探索和教学理念的更新。中心鼓励创新,以期为教师发展提供持续支持,为教学研究领域注入新的源泉。例如,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中心支持13名教师参与创新性教学奖金项目,鼓励教师在教学中应用新的理论,探索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其次,中心设置学术奖金项目,支持教师研究沉思实践在教与学过程中的应用。这充分体现了中心注重革新,积极探索新的教学资源。

(四)广泛性

中心的广泛性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心的服务对象具有广泛性,中心服务于处于不同职业生涯的广大教师、研究生助教、学校行政管理人员等。这充分体现中心致力于满足学校成员的个体及组织学术性发展需求。二是中心服务内容的广泛性,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中心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服务内容,形式多样。例如,教学沙龙、研讨会、教学大纲咨询、新入职教师培训会、设立教学奖金等灵活多样的服务方式,以期促进教师的职业与专业发展。

四、启示与建议

2012年11月,教育部决定批准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等30个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为“十二五”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优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10]。我国高校教师发展中心仍处于探寻期,起步较晚。阿姆斯特分校教师发展中心的成功创办对我国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建设和运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完善组织机构,独立建制

机构的独立性越强,越有利于组织职能的发挥,为确保中心的独立地位,应建设学校层面的教师发展机构。阿姆斯特分校教师发展中心是在整合先前教师发展办公室和教学发展中心的基础上成立的独立机构,为教师发展提供专业服务,免受学校决策层的影响。完善的组织机构是中心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阿姆斯特分校教师发展中心机构设置相对平坦,只设置不同职位,各个职位人员精简,互相配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确保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人员构成的多样化也有利于中心为教师发展提供更专业的服务,教学发展专家、兼职教师、助教等工作人员互相配合,科学决策,为教师提供系统的教学咨询、教学评价、研讨会和专业发展咨询等服务。

我国的教师发展中心独立性不足,多附属于学校的人事处、教务处,倾向于将其等同于我国其他的行政管理部门。因此,中心的运行易受行政干预,不利于中心职能的有效发挥。同时,中心的人员构成主要是其他部门教师的平行调动,教学专家参与较少,教学专业人员匮乏。为促进我国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的有效运转,可以整合学校机构关于教师发展的职能,创建独立的教师发展中心,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保障,维护中心的独立性。

(二)明确中心定位,重视教学学术

阿姆斯特分校教师发展中心的定位是以促进教师发展为核心使命。作为教学资源库和专家智囊团,中心积极开展教学评估,举办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研讨会、工作坊、培训会等,并评估项目价值。此外,中心支持教学学术的发展,科学设置多项学术奖项和评价体系,鼓励教师进行教学探索。开展教学研究成果发表的培训会,将教师的教学研究成果纳入教师奖评体系。例如,设置支持教师探索“沉思教育学”的学术奖项,促进沉思实践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教师发展活动设计应以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及促进学术发展为指向^[11]。我国教师发展中心的定位多以服务教师为发展目标,较少关注教学学术研究,对中心项目的价值评价不足。我国大学应将教师发展中心打造成教师发展服务机构,同时也是学校的教学学术研究机构。中心应重视构建完善的教学评价

体系,组建教学学术研究的专家团队,将教学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师教学实践,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和教学学术的发展。

(三)突出服务功能,提供多元化服务

阿姆斯特分校教师发展中心的发展核心目标是提供一系列有关教学、职业辅导、学术写作、领导力、终身教职筹备和工作生活平衡的项目和资源,促进各个职业生涯阶段和各个学科的教师与助教的专业发展^[12]。根据中心的发展目标,中心突出服务职能,为全校教师提供多样化的服务。首先,针对新入职教师,中心整理汇总新教师在职业生涯初始阶段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促进新教师尽快适应教师角色。同时,中心通过网站发布多元的服务信息,例如,学校的家庭友好政策、教职福利、高质量的日托、优待的病假政策等信息。其次,中心注重研究生助教的培养,帮助其获取基本的教学技巧,在研究生取得博士学位进入大学任教时,可以尽快进入教师角色,对后备教师资源的培养也是中心的服务内容之一。最后,提供广泛的教学服务,邀请专家主持系列研讨会和工作坊,主体广泛,包括:教学评价与反馈、教师职业发展、教学方法探索、同行辅导等。

我国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服务内容相对比较单一,主要包括例行性的新教师培训,邀请专家主持讲座等。因此,我国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应优化服务机制,通过调查研究,明确教师需求,扩大服务范围。既要提供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学资源,又要满足教学管理人员、学生、领导者职业发展的需要。

(四)健全保障机制,保证高效运转

中心积极开展教师教学评估,创新教师发展项目,鼓励开拓教师发展的新领域,为教师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中心运转灵活,其职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健全的保障机制。中心的保障机制主要包括三方面,经费支持、智力支持和激励制度。首先,充足的后备资金是中心开展项目活动的重要保障。中心的经费来源广泛,学校除了设立专项经费之外,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社会沉思意念中心等机构也为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资金支持。其次,智力支持也是中心高效运转的重要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及兼职教师都为教师的职业发展提供专业服务。同

时,中心会邀请教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主持系列研讨会、午餐会等活动,保证学校教师教学发展的研究更具逻辑性和科学性。最后,中心开创了系列奖金项目,以期鼓励教师参与中心活动,进行教学学术研究。例如:卓越教学奖、“双向职业辅导”奖金项目和莉莉优秀教学奖金项目等,完善的激励机制保证了中心应有职能的发挥。

我国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应健全保障机制,保证中心活动的正常开展。国家教育部联合财政部为30个国家级教师发展示范中心提供500万建设经费,除此之外,我国高校还应为中心发展设置独立的资金支持项目。其次,中心应引进专业人才,确保工作人员的专业性,鼓励教学研究专家参与教师发展过程。最后,中心的发展应重视制度保障,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激励机制,提高教师参与中心活动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 [1]John A. Centra. Types of Faculty Development Programs[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1978,49(2):151-162.
- [2]UMass Amherst, About CTFD [EB/OL]. [2015-11-12].<http://www.umass.edu/ctfd/about/staff.shtml>.
- [3]UMass Amherst, CTFD Annual Report [EB/OL]. [2015-11-12].http://www.umass.edu/ctfd/about/annual_report.shtml.
- [4]UMass Amherst, Center for Teaching &Faculty Development, About Teaching [EB/OL]. [2015-11-12].<http://www.umass.edu/ctfd/teaching/maps.shtml>.
- [5]UMass Amherst,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Faculty Development, 2014-2015Annual Report [EB/OL]. [2015-11-12].http://www.umass.edu/ctfd/about/CTFD_AR_15.pdf.
- [6]UMass Amherst, CTFD Annual Report [EB/OL]. [2015-11-12]. http://www.umass.edu/ctfd/about/annual_report.shtml.
- [7]Jerry G. Gaff, Ronald D. Simpson. Faculty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J].Innovative Higher Education. 1994,18(3):167-172.
- [8]UMass Amherst,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Faculty Development,2013-2014Annual Report [EB/OL]. [2015-11-12].http://www.umass.edu/ctfd/about/Annual%20Report%202013_2014.pdf.
- [9]刘济良,王振存. 美国大学教师发展的经验及启示[J]. 教育研究,2011(11):105.
- [10]教育部批准建立30个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EB/OL]. [2015-11-12].<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11/271769.shtml>.
- [11]Rosemary B Duda. Faculty Development programs Promote the Academic Advancement of the Faculty [J].Current Surgery.2004,61(1):93-95.
- [12]UMass Amherst, About CTFD, Overview. [EB/OL]. [2015-11-12].<http://www.umass.edu/ctfd/about/index.shtml>.

(责任编辑 郑芳)

高等教育的“英”“德”模式博弈*

——住宿学院制在哈佛大学的发展与变迁

何毅

摘要:美国高等教育具有两个鲜明传统:一是去中心化的英国住宿学院制模式,二是中心化的德国大学模式。文章以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英国模式”和“德国模式”博弈为线对哈佛大学住宿学院制先后经历的模仿起步、中道废弛、改造重振和稳步发展等阶段进行了分析描述,以引发我们对住宿学院制模式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复兴”态势及本科教育未来发展的思考。

关键词:住宿学院制;哈佛大学;模式

一、哈佛大学的住宿学院制“血统”

美国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同时高等教育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在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具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背后,有两个鲜明传统:一是去中心化的英国住宿学院制模式,二是中心化的德国大学模式。去中心化的英国住宿学院制模式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代表,重视本科生的培养,重视自由教育,重视人格和个性的完善,保存了师徒式的师生关系,比较好地继承了中世纪社团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中心化的德国大学模式以柏林大学为代表,强调科学研究、注重教学和学习自由,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播的机构,更是知识生产的重要单位。“英”“德”两种大学模式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社区观念,而且在过去的200多年时间里,两种观念之间的交锋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博弈过程。

从历史发展看,早期美国的高等教育主要受到英国学院制传统的深刻影响,强调学生智力和性格的综合培养,而19世纪后期引入的德国大学传统,则将大学的关注点逐渐从对学生的培养关注转移到技术性的学术研究。德国大学模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美国高校具有支配地位。但是,目前有一股广泛的复兴势头,使人们开始对更古老的去中心化的英国学院制模式感兴趣。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顶尖大学之一的哈佛大学,同样经历了“英国模式”和“德国模式”的发展道路博弈。

哈佛大学具有英国住宿学院制“血统”。当英国殖民者在17世纪早期来到北美大陆探险,在那里建立具有英格兰风格的殖民地大学时,英国大学模式的输出的唯一样本便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1636年10月,马赛诸塞殖民地议会通过创办一所学院的

作者简介:何毅,男,湖北房县人,温州大学高教所副研究员、博士,温州大学党委(校长)办公室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温州 325035)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我国内地高校住宿学院制改革的本土化实践研究:以五所高校为例”(项目编号:13YJC880026)和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课题“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视阈下的高校住宿学院制研究”(项目编号:2013N0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议案,学院校名便定为剑桥学院。1640年,剑桥学院接受约翰·哈佛的慷慨捐赠并改名为哈佛学院(哈佛大学的前身)。哈佛学院的创办,其目标是为新英格兰地区的年轻人提供博雅教育,同时提供严格的宗教训练。因此,哈佛大学从创办伊始就带有深深的英国古典大学的烙印。

由于哈佛大学的英国“血统”,早期的哈佛大学非常重视本科生教育。住宿式生活是哈佛大学除本科生必修课程、选修课程之外的重要学习体验,是“第三课程”的重要体现形式,曾被哈佛第二十三任校长洛威尔誉为“孕育珍珠的河蚌”。^[1]学院式生活也被认为是哈佛大学的崇高目标。哈佛大学倡导的住宿制和导师制旨在为学生创造一个“小社会”,体现一种“大教育”,让学生沉浸在教育的海洋里遨游而不是向学生身上“泼几瓢知识的水”。这是去中心化的英国住宿学院制大学的重要理念。

二、哈佛大学住宿学院制的发展历程

哈佛大学本科生住宿制与牛津、剑桥大学的住宿制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但是,哈佛大学的住宿制与牛津、剑桥大学又有不同,它们是哈佛大学针对特殊历史事件不断做出调整和适应并长期演化的产物,其蕴含的理念与思想几乎与哈佛学院的年代一样久远。^[2]从历史发展而言,哈佛大学的住宿制经历了模仿起步、中道废弛、再度兴起等几个阶段。

(一)模仿英国古典大学住宿学院的起步时期

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和教师,哈佛大学(早期的哈佛学院)早期的住宿制和导师制并不像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那样完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哈佛学院的规模都很小,校长和教师是学生最早的学生事务官或导师。他们就课外活动、道德生活、适当的认知习惯等为学生提供咨询,辅导和咨询是校长和教师工作的组成部分。家长不仅期待校长和教师为学生提供学术性教学,也期待他们提供家长般的劝告和指导。

剑桥大学是哈佛大学的原型。除学习生活和建筑形式上,哈佛大学高度模仿剑桥大学外,在课程体系上也和剑桥大学保持一致。哈佛大学初创时期仿照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甚至直接照搬了该学院伊丽莎白时代的章程。哈佛学院设置的四个年级

及其名称都是使用伊曼纽尔学院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学院生活、毕业典礼、管理条例和学位标准等也和英国模式一致。但是,文化传播具有迁移性,英国的观念、习俗、传统和规矩一传播到新大陆,马上就为适应新大陆独特的社会和外界情况而发生变化。如比较邓斯特编制的课程和同时代剑桥大学马内以学院院长霍德斯沃斯制定的学习计划表,我们就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具有一些区别。如哈佛大学的课程显得比较单薄,学生有更多的自修时间。

整个17-18世纪,哈佛学院的师资、经费、生源等长期得不到保证,发展比较艰辛。然而,在哈佛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哈佛大学的教育质量很快得到认可。1650年哈佛学院颁发的学位证书得到了剑桥大学的承认。1780年,在马萨诸塞的宪法中,哈佛学院首次被称为“大学”,并在1781年的哈佛大学新校长就职典礼上被州长称赞为“让马萨诸塞州感到自豪的大学”。^[3]

哈佛大学在短短百来年时间就赢得了崇高荣誉,住宿学院制功不可没。1798年华盛顿总统考虑把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的养子转学到哈佛大学时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解。他说,“哈佛大学的规模比其他大学大,我相信年轻人在那里,不管是学校的陶冶,或道德情操的关注,或过一种较规律的生活,都比位于南方的学府更不会放荡及沉溺。”^[4]在华盛顿总统看来,哈佛大学相比普林斯顿大学,在“学校的陶冶”、“道德情操的关注”、“较规律的生活”等方面做的更好,而这几项正是实行住宿制大学最为突出的特色和优势。

(二)住宿学院制在哈佛大学的沉寂与德国模式传播时期

1.美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及德国大学模式兴起的背景。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是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美国大学住宿制衰弱的时期,这一时期是美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并开始多样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19世纪的两次工业革命,使自然科学研究空前活跃并取得重大突破,推动了欧洲乃至世界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增长。在两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对高校的

课程设置、教学组织乃至教育观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在:

一是美国社会对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需求增加,专门技术院校开始出现。工业革命使人们普遍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大力量,专门技术院校的出现适应了 this 趋势。这类院校以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为主,课程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为主,古典学科被排除之外。这个时期,除新成立了一批专门技术教育院校外,殖民地时期创办的几所老学院也开始陆续增设工程技术院系。如1847年耶鲁大学创设了哲学与艺术系,后来发展成为谢菲尔德理学院。1847年,哈佛大学设立劳伦斯理学院。理工科专业和专业学院开始蓬勃发展。

二是重视实用教育的美国州立大学开始广泛创办。1818年,托马斯·杰弗逊获得州议会颁发的特许状,成功创办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州立大学——弗吉尼亚大学(1825年正式开学)。该校的成立对哈佛大学、布朗大学等老大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州立大学的共性特点是由州政府举办,注重实用知识,偏好应用技术和知识教育,学术水平相对较低。到南北战争前夕,美国27个州中已经有25个州建立了州立大学。

三是赠地学院为美国教育带来全新活力。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莫里尔法案》(Morrill Land Grant Act)。法案规定:联邦政府依据各州国会议员人数,每位议员拨给3万英亩土地,联邦政府共计赠地1743万英亩,折合2900万美金的资金。各州用出卖土地的收入至少要资助建立一所从事农业和机械工艺教育的学院,即“赠地学院”。赠地学院的出现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大事件。《莫里尔法案》的颁布意味着博雅教育开始转向实用技术课程,尽管其目的不是排斥其他古典学科和科学课程,但是它更偏重教授实用的知识,在事实上削弱了博雅教育的意义。

四是研究生教育的蓬勃发展。南北战争之后,随着美国南北统一的推进,经济社会得到极大发展,社会工业化、城市化、专业化和世俗化步伐不断加快,社会对创办现代大学和发展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不断上升。1867年,模仿德国研究型大学的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正式开学,它是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标志着美国大学时代的开始,也使得学者们首次可以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但是,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本科生教育。

2.德国大学模式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哈佛大学的坚守。在19世纪美国高等教育迎来全面转型并逐步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高等教育系统的过程中,德国大学模式的影响不可忽视。1810年,威廉·洪堡(William Von Humboldt)创办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奉行教学自由、学习自由、教学和科研统一等原则,在教学组织体系上弹性极大,无固定班级,无僵化教材,学生自由选课,实行讲座教授制。这些举措不仅形成了今天我们引以为傲的现代大学的基本理念,而且被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移植到本国,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亦不例外。

19世纪,大约有九千美国人到德国大学留学。^[5]20世纪初,到德国大学留学的美国学生更多,其中半数以上在柏林大学学习。除开柏林大学提倡的学习自由、教学自由等这些先进教育理念外,习明纳、实验室操作和学术讲演等教学方法也被美国大学引进。美国学者沃尔滋(John A. Walz)曾评价说“今日美国学术所拥有的较高地位,以及它在某些分支领域所拥有的主导地位,直接和间接归于许多在德国大学接受先进训练和吸取灵感的美国人。”^[6]

在美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19世纪上半叶,作为美国最悠久、最著名的哈佛大学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仍然坚守英国古典大学的理念,致力于让学生成人(making men of boys)。校长和导师负责执行家长式管理规则和固定僵化的教学计划,从早晨强制性祷告直到全天的学习。哈佛大学1857届毕业生戴维斯·隆(John Davis Long)回忆其哈佛大学的生活时说道,四年枯燥乏味、循规蹈矩的大学生活谈不上任何激励和鼓励。^[7]哈佛大学已经开始落后于同时代的其他大学。

3.哈佛大学对德国大学模式的模仿及反思。在哈佛大学面临的竞争环境日益激烈的形势下,1869-1909年,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在学分制的基础上推行课程选修制并取得显著成效,从而成就了

哈佛大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是,艾略特校长的自由选修制也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即他的课程选修制改革和对专业学院及研究生院的鼓励,使得哈佛学院(哈佛大学本科生院)的教育日益朝着为年轻人的职业训练做准备的方向转变。

与此同时,在美国大学普遍效仿德国式大学成功经验之时,德国式大学的弊端也开始被一些敏锐的大学教育领导者逐渐意识到。主张德国大学模式的人对本科生教育不屑一顾,他们认为大学教育应该首先关注高级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学者应该把服务学术自身及国家的学术成就作为自己的追求。他们注重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把本科生教学交给职称较低的教师、兼职教师或研究生助手负责,降低了本科生教育的质量。他们认为学生宿舍毫无价值,不去考虑社区生活本身就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要素。1909年,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对主张德国式大学的教授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这些教授自己并不认为自己“和他的学生们的生活、在课余间的所思所为有任何责任关系,上完课后,理所应当认为自己已经尽职尽责”。伍德罗·威尔逊的看法得到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一批知名教授的认同。他们主张反思德国式大学模式的弊端,重新审视英国式学院制模式的价值,并希望看到英国式学院制模式在现代大型大学中的重塑。这为住宿学院制的振兴带来了希望。

(三)住宿学院制在哈佛大学的再度兴起时期

哈佛大学现行的住宿学院制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第二十三任校长洛威尔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针对艾略特校长时代推行课程选修制带来的问题,早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之前,洛威尔就曾提出过不同意见。他督促前任艾略特校长在校园内修筑宿舍楼,改变因财富把学生分层的现象。洛威尔认为,“大学教育有1/3来自教室之外的生活,因此最为紧要的是营造新生到校就能沉浸其中的氛围和传统”。^[8]他相信是学生而不是选修课程是哈佛大学的核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9]他在竞选校长讲演中说,“在大学里,我相信他们的品格不是仅仅取决于受到的教育,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处在良好友谊氛围中的共同生活。”^[10]

洛威尔在谈到为什么要重视学生住宿制度时说,“人是社会性动物,美国大学应该发展人的这种能力,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性公民。……不同班级、不同类型和不同协会的本科生和导师在同一个社区里生活,在同一个餐厅就餐,全新的接触、惬意的交谈、深厚的友谊就会兴盛起来……简短地说,二至四年级学生同住在一幢宿舍楼里,提供了不同年龄本科生之间以及学生与导师之间文化交流的机会,因而增强了对学术问题的兴趣,补充并强化了正式教育。”^[11]洛威尔校长的这些理念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学生是大学的核心要素”、“课外生活对学生具有重要意义”、“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等这些思想在今天已经成为大学书院制探索的指导思想,实行大学书院制的高校也正在按照这个理念进行实践。

洛威尔校长为实现他的以上想法,上任以后努力在哈佛大学推行住宿制,把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完美结合起来,要求所有的新生都必须住在校园里。在他的任期,先后新建了4座学生宿舍,为学生提供校内住宿服务。在他的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慈善家哈里克斯捐赠1300万美元为哈佛大学新建了7幢学生宿舍楼。当1933年洛威尔校长离任时,哈佛大学所有的本科生都已经住在学校学生宿舍里。

宿舍楼是哈佛大学本科生生活和学习的中心。哈佛学院的宿舍楼拥有包括食堂、公共休息室、图书馆、学术和文娱活动设施在内的学习、生活、服务设施,每幢楼入住330—450名左右的学生,生活服务条件十分方便。宿舍楼为师生开设辅导、小班课程和习明纳课程等,举办社会服务、表演、音乐会、讲演、特殊宴会和晚会、各种运动队的校内比赛等,学生有大量的机会参与同学和老师之间的交流,宿舍楼发挥了重要的非正式教育的功能。当然,学生宿舍楼除学生这个主体之外,还包括参与学生指导与服务的舍监、导师、其他大学的教授、管理者、剑桥社区成员以及舍监批准的访问学者等。^[12]这些非本科生成员住在宿舍的高级公共寓所。

哈佛学院宿舍楼的这种教育生态格局,很像生物学中的“共生”现象,它是哈佛大学人才培养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哈佛大学

正在进行全面的本科生教育改革,文理学院院长科比(Willam C.Kirby)在2001/2002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审查本科生校园生活(住校和课外活动)与本科生教育之间的关系”。的确如此,学生校园生活已经成为制度化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形式和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春季哈佛大学又专门出台了关于改革住宿学院的报告,旨在进一步探索住宿学院对学生教育经验上的独特目的和作用。哈佛大学对住宿学院的理解值得我们学习。

三、住宿学院制面临的危机及省思

住宿学院制模式在哈佛大学及耶鲁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这种去中心化的大学组织模式也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一是进入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的高等教育竞争日趋激烈,大学生存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及追求也逐渐偏离了住宿学院制度设计者的初衷。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科学研究的需求急剧增加,政府为赢得战争的领先优势,不惜重金开展各式先进武器和作战技术的研究,资金大量流入实验室和军工研究项目,对人才培养的投入和重视程度明显下降。三是战后为解决退役士兵的安置问题,政府教育基金大量资助退伍老兵,大学校园的招生规模显著膨胀,教育资源的承载能力超出了预期,大学校园的学术环境有所下降。以上这些因素的作用导致以学生培养为中心的住宿学院制模式不得不接受校园生存环境的变化并适应这种变化。

到了20世纪90年代,忽略传统住宿学院价值带来的问题日益增多,许多大学又开始考虑并尝试进行英国式住宿学院制模式的探索。这些大学包括普林斯顿大学、莱斯大学、莫瑞州立大学、杜伦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杜鲁门州立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范德堡大学、密西西比大学、贝勒大学等众多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学校。即使是在纽约州的康乃尔大学这样大型的以研究为取向的德国式州立大学里,英

国式学院制模式的吸引力也在增强。康乃尔大学引入英国式大学理念,通过对其西校园的重新设计,建立了五个由学院制“住所”构成的住宿学院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以学生培养为中心的住宿学院制模式在生存危机中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当前,无论是从美国高校正在兴起的住宿学院制模式还是美国流行的新闻杂志对住宿学院制大学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式住宿学院制模式具有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复兴”的态势。如何看待这个“复兴”之势?这里不得不回到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理念论争。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直存在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之间的交锋:高等教育的存在是为了高深的学问还是为了社会的需要?是以培养专才为目标还是培养通才?科学研究是以纯理论为主还是以应用研究为主?大学本科教育到底是教育学生学会做人还是学会做事?对这些问题论争的回答就是我们对当今美国高校住宿学院制系统回归正确认识的答案。

参考文献:

- [1][10][11]Richard Norton Smith,The Harvard Century-The Making of a University to a Nation [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6.95,63,69.
- [2][3][8][9][12] 张家勇.哈佛大学本科生课程改革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290,52,258,258,268.
- [4]林玉体.哈佛大学史[M].台北:高等教育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86.
- [5]Clifton F.Conrad,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A Guide to Innovation and Reform,Colorado [M].Westview Press Boulder,1978.50.
- [6]贺国庆.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117.
- [7]Bailyn Bernard and others,Glimpses of the Harvard Pas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53.

(责任编辑 郑芳)

● 研究评论

传统与变革的统一:大学的生存之道

——研读《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

陈 丽

摘 要:《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是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之一。阿什比认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并指出大学需要在坚守自身固有传统的基础上,由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采取主动变革,向多元化、终身化的方向发展,满足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才能实现永葆发展生机和构建美好社会的目标。该著作的基本观点至今仍对分析和研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大学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传统;变革;多样化;终身性

大学“保存、传播和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它像动物和植物一样地向前进化。所以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①英国著名学者阿什比在其《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一书中对大学自身发展规律所做的深刻剖析,成为我们分析大学组织运行颠扑不破的科学论断,向我们揭示了大学作为世界上存续时间最久的组织的历史缘由。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高等教育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抉择。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境遇中,大学既要“坚持自我”又要“与时俱进”,应当如何取舍,堪称世界高等教育经典之作的《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将为我们启思,并提供借鉴,分析该书蕴涵的要义对我国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一、困境与危机:大学的生存境遇

阿什比是英国著名的高等教育管理者 and 高等教育学专家,曾历任英国皇后大学、剑桥大学副校长、大学教育经费评议会主席等职务。他十分了解英国

高等教育的现实状况,对大学有着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其高等教育代表作《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于1974年正式出版,中文译本于1983年出版。该书是由阿什比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在英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学术研讨会中公开发表的10篇学术报告和讲演稿集结而成,具体阐述了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如何变革自身以应对社会环境变化的问题,其论述颇具深度和指向性。

阿什比认为,二十世纪的“西方工业国家正处于一场史无前例的危机的开端。”^②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不断提升到新的高度,在为西方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改善和丰富人类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工业文明。然而,科学技术在前所未有地推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也招致了工业文明的恶果,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科学技术的滥用使人类破坏了自然界和生态系统的平衡,使环

作者简介:陈丽,女,新疆石河子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新疆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厦门 361005)

境污染不断加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日益加大。阿什比深深地意识到这种危机,他认为人们以往对“怎样使这样高的生活水平,普及到富裕国家穷苦的少数民族身上,普及到占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身上去”⁽³⁾ 的问题的态度过于乐观,“可是到今天,这种乐观的设想似乎不那么合理了。原来那种只要经济无止境地增长就能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普遍利益的前景,变成了海市蜃楼,而且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加宽了。”⁽⁴⁾ 社会“进步中最主要的经济增长和技术革命并未促使人类状况的改善,而是导致了衰退。”⁽⁵⁾ 科学技术“双刃剑”的作用在掣肘人类社会的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英国的高等教育。一方面,科学技术催生了英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由两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新格局,使英国政府深刻地意识到科技教育与高等教育对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作用。面对广大适龄青年入学需求的日益增长和工业界对职业型人才的强烈诉求,1963年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提交的《罗宾斯报告》中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建议毫无质疑地被政府所采纳,这标志着英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期间,英国大学数量不断增加,一批“新大学”和“开放大学”以及“多科技术学院”应运而生,专业设置、教学体制和课程设置进行重大改革,高等教育类型和层次得到不断完善,确立了英国“双轨制”高等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进入七十年代,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引发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剧烈振荡,经济危机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使高等教育进入调整和收缩时期,1973年成为英国高等教育的转折点。尤其是经济危机对高等教育造成的巨大冲击,使人们开始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产生疑问,乐观主义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开始受到质疑,政府随即通过缩减高校数量,消减招生人数,减少对大学经费支持等措施来放缓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甚至有学者认为“70年代是英国高等教育倒霉的十年”。⁽⁶⁾ 英国大学正处在这样一种剧烈变动的时期,处于危机和灾难的困境当中。而此时“富裕国家开始认识到,人类正在从‘发展无止境论’转向‘发展稳定论’过渡,因而对于世界的未来必须作出选择。”⁽⁷⁾ 阿什比则认为,大学作为这个世界上唯一能事先改造

人们价值观的机构,能够改变由科学技术所引发的不良社会境况。为此,“大学必须为此尽它新的职责”,首先必须要为适应新的环境而进行变革,才能为世界的平衡和稳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传统与变革:大学的生存法则

“社会上的很多机构不能迅速地发展变化,来跟上科学技术发展所造成的形势,而一切落后于形势的事物是必将被淘汰的”,⁽⁸⁾ 阿什比将大学比喻成生物体,认为当一种基因进入环境时,大学的形态就会发生变化,每一种新形态的出现都是一种变革过程,但这种变革并非是对传统的简单颠覆,而是传统与变革的有机统一。只有这样,“既不使传统在适应上成为无定见的顺风倒,也不顽固保守而偏执不化”,⁽⁹⁾ 各种制衡大学的力量才能保持平衡,大学才能获得良性发展。

(一) 大学变革必须以固有传统为基础

阿什比认为大学在适应新的时代和环境时必然发生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对原有样态的直接摒弃和全盘否定,而是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革新。十九世纪初,在洪堡和费希特等人的努力下,以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为首的注重科学探究的德国大学成为世界大学的典范,为英国、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大学所效仿。美英两国学生为德国大学的魅力所折服,大批留学德国。这些人员回国后纷纷以德国大学为原型改造本国大学,如英国伦敦大学院、曼彻斯特欧文学院、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德国大学重视科学探究育人的做法被美英等西方国家所采纳,但这种吸纳并不是全盘移植和照搬照抄,而是建立在持守本国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改革。英国高等教育受牛津和剑桥两大学的影响,具有深厚的绅士教育传统,大学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有教养的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大学实施的是通才教育而非专业教育,教学方法、课程设置都紧紧围绕道德养成而展开。因此,德国大学的思想精髓并未被英国大学所全部吸收,绅士教育的传统仍扎根于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当中。而美国大学对德国大学模式的借鉴也是建立在其实用主义理念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修正与改造,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相结合的高等教育体系。从英美两国

大学的演变历史来看,“在英美大学的血液中,都有德国大学的宝贵传统,只是各国为适应本国的叙述传统和社会风尚而有所取舍罢了。”^[10]任何类型的大学在适应社会发展进行变革的同时都不可能脱离自身原有的文化传统。

(二)大学需主动变革以实现各方力量的平衡

当科学知识与社会生产的结合日益紧密之时,大学已经不再是纽曼时代与世无争的“象牙塔”,而成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生存的绝对不可缺少的事物”。从宏观层面来看,阿什比认为从“遗传”和“环境”两个方面主要有三种力量决定着一个国家大学体系的规模与形式。“遗传”主要指大学自身的内在逻辑,具体表现为大学对人类文化精华、客观无私、发展理性、尊重知识等固有价值理念的秉持。“环境”则主要指资助和支持大学的社会系统和政治体系,具体表现为求学者入学需求和市场对人才类型的诉求。这三种力量同时作用于大学,当三种力量达到动态平衡时,大学体系才能获得良性发展。否则,“如果这三种力量之间失去平衡,高等教育体系必将垮台”。^[11]当然,这三种力量在大学体系中并不是平均分配的,并且在各个国家对大学作用的强弱程度也有所不同。在美国大学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力量是求学者入学需求的压力。拥有不同学习需求的学生群体使大学形成了由不同质量标准 and 学位标准,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并存的多样化的美国高等教育体系。而在英国和德国的大学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则是大学本身的内在逻辑。德国大学注重学术研究和英国大学强调绅士教育的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两国高等教育体系的规模和样态,两国都对大学入学标准、质量标准和学位标准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与限制,始终保持一种精英型的高等教育模式。三种力量都是基于各国大学传统而进行博弈,实现契合本国文化诉求的动态平衡。

从微观层面来看,阿什比运用动力学“0”点原理来分析大学个体的动态平衡。他认为主导大学个体发展主要有政府(内阁、国会、国务大臣)、大学教育经费评议会和大学专业研究会、大学自身内在逻辑三种力量,每一种力量都是一个“力的矢量”,作用力大的“矢量”直接决定着“0”点的运动方向。在英国,

决定大学发展方向的主导力量是大学自身的内在逻辑,即大学教师群体意志决定着大学的运动方向,大学经费评议会和政府并不能直接干预大学发展,对大学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支配力量作用于大学时都必须在坚持大学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革新来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需求。事实上,倘若大学不能形成主动变革的机制和能力,依然固守对自身传统的运行惯性和路径依赖,将会极大地阻碍大学变革。这种阻力将有可能导致大学被动地接受剧烈变革,“受外力推动的变革往往是非常激烈的,以致会危害大学的传统”,“大规模的突变往往会导致毁灭”。^[12]因此,大学应以固有传统为基础,采取自下而上的渐进的方式来主动变革,形成主动变革的机制和能力。只有这样,大学对“一切其他改革都可迎刃而解”,才能在困境和危机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三)大学变革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在现代社会,“科学进步的根是扎在教育中的”^[13],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甚至认为,“最有价值的资本是投于人力方面的资本”^[14],大学作为实施人力投资的社会工具,成为多元主体利益博弈的场所。阿什比认为大学变革应由大学教育经费评议会、大学校长、教师、学生组成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但各主体对大学变革的作用并不是均衡的。大学教育经费评议会是调节国家与高等教育之间相互作用和关系的重要方式。它是由著名学者组成的团体,通过决定大宗拨款来参与大学变革,这种参与不侵犯大学的自主权,对大学变革发挥不了决定性作用。大学是由校长、教师和学生三位一体构成的组合,三者之间“彼此没有高下之分”,是相互平等的。校长是帮助大学产生决策的人,在大学变革中扮演着沟通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桥梁的角色,他必须运用智慧来使群众满意,实现大学的发展目标。阿什比也非常强调教师在大学变革中的作用,他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要彻底实现大学的目的,大学政策就必须由全体教师来决定。”^[15]可见,教师是大学变革的主导力量,“大学的前途,就其协调传统与革新的职能而言,应多取决于成千上万个别教师的价值观,而很少取决于大学的理事或校长。”^[16]学生对大学变革也发挥着积极有益的影响,“应当鼓励学生发挥更多的影响

而且应该通过这种影响,显示他们在大学这三位一体的组合中占有平等的地位。”^[17]对一些学习被动的学生,大学应当“消除他们缺乏学习动机的消极因素”,这同样对大学变革具有重要作用。倘若能够参与大学变革,学生将会从由校长、教师和学生组成的相互平等的集体中得到自信心,将能够“在史无前例的情形下进行革新、改造和解决问题”,成为“模范人物”,这也正是大学教育目的所在。

三、多样化与终身性:大学变革的方向

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大学始终处在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变革已经成为大学的一种运行方式,那么大学变革的具体指向在哪里呢?阿什比指出,多样化和终身性是大学变革的方向。在十九世纪,知识与社会的联结并不紧密,英国的古典教育可以使学生受用终身、一劳永逸。进入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等知识更新的频率高、周期短,大学教育已经无法交给学生适应社会变革的全部知识,“只有少部分能成为革新者的学生才能免于被淘汰”,大部分学生将由于社会变革而面临被社会淘汰的现实境遇,这时大学对人力资源投资不可避免地将贬值,“因此,采取克服落后的措施,便成为首要问题”,“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防止落后”。^[18]

在终身化取向方面,首先,阿什比主张,大学应成为人接受终身教育的场所。对在职人员而言,大学应当积极利用校外推广部,主动与工业界合作,建立职工定期带薪学习的终身教育制度,为职工提供连续的、系统的全日制的终身教育,使高等教育成为一种提供“其本身能够不断产生改革、更新和再生的结构”的系统。对学生而言,大学应当建立“奖学金临时银行”、“学位证书再生效制度”,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在任何时间能够自由进入大学进行终身学习,“使毕业生不致因落后而被淘汰”,“促使每个在大学读书的人都感到有上大学的必要”,使“大学像博物馆或图书馆一样,人民在一生中只要愿意进去就可以随时进去,而且达到目的就可以离开,却没有不光彩或困难。这种工作与学习互相夹杂的教育形式,可以使人持续一生地享受它。”^[19]其次,大学作为终身教育的场所应重视和加强大学教师的职

后教育。他认为,“如今,还没有见到任何教育机构为防止教师普遍落后而计划举办大量充分的长期进修班。”^[20]大学尤其缺乏对教师教学能力的培训和提升,应当为教师搭建连续的、系统的终身学习平台。

在多样化取向方面,阿什比认为,大学教育向群众性教育的变革是一种必然趋势,应当建立“多而不同”的职业教育与非职业教育体系相结合的高等教育体系。在英国,“大学固有的传统势力要保持大学以非职业教育为宗旨,而社会力量却在迫使高等教育向职业教育方面发展”。^[21]大学作为“专业人才的供应场所和学术研究的神经中枢”,“群众性高等教育体系在职业教育和非职业教育两方面都能显示出优越性。”^[22]阿什比指出,应当排除读书高人一等、有天赋的人高人一等的思想,取消天才教育和双轨制教育体系,建立多种不同质量标准的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使“天才和中才”能在同一条件下接受大学教育,使“社会成为多元的、合于人性的、兼容并包的、自由信仰的并能分清错误与偏见的社会。”

四、借鉴与启示:构建中国特色大学模式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应然之举

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变革已经成为大学适应社会变化的必然选择。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知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建设一流大学已经被世界各国视为增强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和必然路径,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主题和现实议题。

毋庸置疑,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被世界各国奉为一流大学的圭臬,美国大学模式成为世界各国大学顶礼膜拜和争相模仿的对象。美国大学模式即为一流大学的建设模式已经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而深入人心。我国一流大学建设亦难脱窠臼,向美国一流大学看齐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场域中一种不争的社会事实。然而,阿什比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中对“任何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的重要论断为我们提供了建设一流大学的分析框架和逻辑思路。一流大学并非是直接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组织构成和建设经验全盘移植到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当中而构成的产物,而是在继承中国文

化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变革而生成的结果,更是具有中国文化适应性的大学;并不是资金、校舍、设备等物质资料的简单堆砌和拼盘,而是物质性资源与精神性资源的有机协调与融合,更是在大学自身的精神性资源的涵养中孕育而生的。因此,我国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必定是“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定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和文化特征的一流大学。中国的一流大学必定是在构建中国特色大学模式的基础上变革而生成的。这是我们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必须明确和坚守的。

参考文献:

[1][2][3][4][5][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英)阿什比著.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7,12,2,13,24,1,7,13,12,20,22,22,92,37,150,65,35,121,35,137,137.

[6]Peter Gordon,Richard Aldrich,Dennis Dean,Education and Policy in Eng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244.

(责任编辑 郑芳)

(上接第 47 页)

觉“吾信”“吾故曰”之类叙事心态、知觉和言语的句子特别多;作为“吾”的振奋举动反而是鲜而少见的。

②场屋的围墙之外,先看匿名文章,评价做好才发现作者是谁的情况一般成为文字游戏的一种;请见刘大魁的《曹氏诗序》,《海峰文集》4.61-62.

③明清两代考官们为什么不顾皇帝和礼部尚书的禁止,而不断地继续利用“小题”,就是因为“小题”把考生们的卷子分别得更有效。

参考文献:

[1]李贽.童心说.

[2][9]龚笃清.明代八股文史探[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435-

444,390.

[3]董其昌.画禅室随笔,高塘(编)《论文集钞》.

[4]方苞.子使漆雕开仕.

[5]易余龠录.卷一七.

[6]华亭九字诀.

[7]王运熙,顾易生主编.清代文论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687.

[8]田启霖(编).八股文观止[M].海南出版社,1994,382;清代文论选,268.

(责任编辑 王伟宜)